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07 年

高尚全：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

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

目 录

一家言

- 1 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高尚全
3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李靖炎
10 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电信市场.....何 伟

往事录

- 13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忆.....高智勇

亲历记

- 18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苏 飞
22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于 彬
24 1992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雷仲予
27 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杨克现

求实篇

- 29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郑 群 刘子健

人物志

- 34 杨尚昆五次回四川.....杨汝岱
36 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夏俊生

春秋笔

- 40 平型关大捷参加者高成贵.....余春水
43 李宗仁在老河口.....朱 芒

沉思录

- 46 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沉浮.....薛攀泉

怀人篇

- 52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孙维熙
58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顾迈南
62 媒体老将赵超构.....张 循

古今谈

- 68 拿破仑的失败与专制之痛
——法兰西的悲情时代.....施京吾

海外事

- 73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金 雁

本期执行主编 杨继绳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杜导正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执 行 主 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 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

● 高尚全

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以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渐丰富，人们不断要求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我体会，可以从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等多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一、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邓小平同志讲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发达和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扩大之间的矛盾，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

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的合理判断。因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发展不平衡，大家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富起来，总是有先有后，先富帮后富，最终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为此，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时，就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二、社会和谐

共同富裕抓住了生产——分配这一主线，对生产力发展提出了要求，也对社会财富分配提出了要求。但这主要是就经济范畴的规定，而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做出深入的规定和论述，这与发展生产力是当时最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人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而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失衡，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作为一个问题重新被提出来。这些都需要从新的角度特别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些判断丰富和发展了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理论，不仅包含了发展生产力的内容，而且强调了社会发展，并明确指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的。

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全面分析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应该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并且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是根据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的重要论断,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这一理论创新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重要性在于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认识不能局限在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上,也要重视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三、公平正义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几千年的美好梦想。我国古代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说法。共同富裕本质也隐含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把公平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上来。

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形成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六中全会《决定》强调: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温家宝总理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两大任务之一。只有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才能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可以说,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仅是解决现实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且是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本质的要求。

四、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深化

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的三个基本属性,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务和现实课题。但是也要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产生新矛盾的过程。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社会和谐,以至社会公正,都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当前,我国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内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明显增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对我们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实践决定认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也是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实践日益丰富,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

五、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强调指出,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用和谐社会贯彻于和谐社会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

把人民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首先表现是把人民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改革发展为了人民,必须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社会主义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是把人民利益、快乐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准则的社会主义。离开了人民的福祉,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人民社会主义。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七千人大会的功绩及其局限性

• 李靖炎

张素华同志耗时十年写成并出版了专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时间洛阳纸贵。这是大好事。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能以史为鉴，不善于从自己的历史性错误中学习的族类。我现在还无缘拜读这本大著，但是《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上李彦春同志的评介文章是看到了的。

我们这一代人探索知识和认识真理的路是非常艰难曲折的。我们在解放前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主要学习的是斯大林主义。在解放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大家都忙于各自的专业工作，在政治上只是跟着党走。虽然一次又一次“左”的政治运动在我们的头脑中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疑问，但是夺取政权前中国党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认为这个党干什么总是好的。受这种影响，加上历来所受到的“左”的教育却使我们失去了应有的自信，不去不敢独立地深入地去思考这些问题。往往只是在倒了大霉以后，方才去向马、恩、列宁的著作请教。

“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闹剧和在农村中见到的悲惨的实际，却不能不使人对党的最高领导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1959年的庐山会议更令人怀疑他是不是明知有错，但偏偏就是不改。七千人大会及其后所采取的纠正措施使人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是迟迟不为彭德怀同志他们平反，却始终令人心存疑虑。

“大跃进”夺去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生命。我们这一代几乎人人都亲身尝过长期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的滋味，人人都讲得出许多亲身的经历、亲眼所见和亲耳听到的第一手材料。如今有关的报道和著作国内外都已经有了一些，但是对于造成如此巨大灾难的内在原因的分析，却由于诸多忌讳而难于深入。毛泽东同志所主导的七千人大会自然很难完成这种任务。何况为了深入地认识任何一个复杂的事件，相当长的时间总是必需的。认识总会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我们亲身经历了几乎是接踵而来的十年“文革”浩劫。又经过多年的深思，自信在有关的问题上，我们一些看法大的方面应该是不会看错的。

（一）不应该孤立地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必须把它放到更大的历史过程中去加以考察，还应该联系当时整个国家和世界的实际形势。

为了较深入地认识“大跃进”，不仅要联系此前的农业合作化，毛泽东同志对邓子恢同志的显然不实事求是的“小脚女人”的呵斥，他对周总理和国务院所领导的“反冒进”的错误批判，还应该联系“反右”斗争和此前的一系列“左”的政治运动，当然还必须联系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和“穷过渡共产主义”。还应该把中国改革开放前农村的凋敝状况跟改革开放以后的蓬勃繁荣发展相对比。当然还应该联系世界上的科技革命和与“大跃进”约略同时发生的一些外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济大起飞。

为了正确评价七千人大会，不仅要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相比较，还应该跟后来的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对比。不仅要看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还要联系到后来的文革，看他的自我批

评到底兑现了多少,哪些兑现了,哪些并未兑现。不仅要看到七千人大会上的民主气氛,还要看到经过庐山会议的残酷教训,人们毕竟学聪明了,会上还是有人写匿名信来揭发问题。很明显,他若不匿名,会后很快就会遭殃。不仅要看到七千名代表精神焕发,还要想到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文革中惨遭迫害,有多少人甚至死于非命。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悲剧命运是尽人皆知的。

(二) 谎报浮夸在“大跃进”中所起的作用

“大跃进”从一开始就带有大闹剧的性质。对于这一点,我们这一代,人人都讲得出一大堆极其可笑又可气的故事。“大跃进”是跟谎报浮夸相始终的。若没有谎报浮夸,也就根本不会有那些放“卫星”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大跃进”也就根本掀不起来了;否则至少也会像“文革”末期的“批邓”运动那样,受到广大群众自发但是有力的抵制。

把各级干部的谎报浮夸视为“大跃进”失败和大量饿死人的根本原因或主要原因,究竟是不是合理呢?

谎报浮夸并非“大跃进”所特有的现象。它是一切缺乏充分的民主监督的政治体制所不可避免的孪生祸患,古今中外皆然。日本人在二战中就因此出过极大的洋相(美国舰队在进攻菲律宾前先佯攻台湾,消灭了日本第一航空方面军全部800架战机,然后突然转向。驻台日军司令为掩饰其惨败,竟谎报消灭了美军舰队。于是日本人连夜举行提灯庆祝游行,贻误了援菲战机。见《太平洋战争史》)。在我们,谎报浮夸,“大跃进”以前就有,现在有,而且可以断言,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前,仍然还会有。不能指望干部都像圣人,不能指望所有的干部全都合格。即使所有的干部全都合格,也不能指望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谎报浮夸来解释“大跃进”的失败和大量饿坏饿死人的现象。

“大跃进”中一个特殊点是众多上级强迫下级哄骗自己。上级心里也知道下级的汇报靠不住,但是他们自己也得向更高的上级汇报,因此也就管不了那许多了。党的干部队伍,就整体而言,在“大跃进”的严峻考验下败得很惨,虽则这种考验是根

本不合理的。

我在“四清”工作中的直接上级是一位基层法院的副院长。他是一位文化不高,但是智商甚高的农民出身的干部。他告诉过我“大跃进”时他们区的既可笑又可气的事。区里的干部到市里去汇报,被指责少报粮食产量的所谓瞒产,在会上受到了拳脚的批判。他一肚子气没处发,回到区里招来公社干部,也照此办理。挨了揍的公社干部回去又去揍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当然也如法炮制。

如此这般强制性的谎报浮夸当然大大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但仍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会饿坏饿死那么多的农民。造成农民被大量饿坏饿死的直接凶手是严重的谎报浮夸的精神与统购统销制度的结合。对此梁志远同志的两篇回忆性文章(《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与第7期)对安徽亳县在“大跃进”中的遭遇有很具体的叙述。

统购统销是我国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按照它的“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需多销,少需少销”的政策,本来不会有什么问题,顶多是对大粮户的生产积极性有抑制。但是“大跃进”开始以后,粮食连年大减产,1959年比1958年减产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减产15.6%;反之,工业用粮和城市人口却有所增加。因此全国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在此情况下,那些谎报超高产的地方自然要被高征购。完不成卖粮任务的地方就被指责为瞒产私分。干部在强力的威逼下实在无法,只好卖掉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于是农民大批饿坏饿死。

这是当时七千人大会所能找到的原因,但是显然还存在着另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三) 农民大量饿坏饿死的深层原因

如果“大跃进”时农民们仍然是土改后那样单家独户地搞生产,粮食掌握在农民的手中,他们便不会有谎报浮夸的兴趣,也不会轻易地向粮食收购机构低头。就是拼老命,他们也决不会让人夺走他们维持生命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大跃进”中大量饿坏饿死农民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如果农业合作化以后掌握粮食的权力仍然在农民自己手中(如列宁的合作化计划所设想的那样),干部真的只是他们的公仆,只有农民大会才

能决定粮食的处置和去留,那么,农民也同样决不会卖掉他们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他们甚至会比单家独户时更坚强有力。

根本的问题是,在当时那样的人民公社中农民被剥夺了一切,掌握粮食的权力全都集中在公社干部的手中。甚至连让每个农民吃多少斤粮食,都由公社一级的干部决定。而公社干部既可能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而谎报浮夸,在受到上级的威逼利诱时也就会卖掉农民们的口粮、种子等等。这些公社干部本来就是由上级委派才当了干部的。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都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实行农奴制。我至今也不知道当时中央是怎样反驳他们的。也许是无言以对。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实际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还失去了迁徙的自由。他们想进城要饭,是要被公安部门当作“盲流”而押回原籍的。

农民的无权状态正是他们会大量饿坏饿死的深层原因。这是七千人大会总结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能想的问题。但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简单而残酷。

我们的这种剥夺农民的“合作化”是从斯大林那里搬来的,也跟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一样,有民粹主义的性质,也同样是违背列宁的合作化计划的精神的。

(四)“大跃进”中粮食产量连年大减的根本原因

1959年与1960年的粮食连年大减产,不仅是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种全国规模的连年大减产,恐怕也是少有的。

若非这种全国性的粮食连年大减产,即使是严重的谎报浮夸与统购统销相结合,也不可能造成那种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大饥荒。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粮食的连年大减产呢?

大量饿坏饿死农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造成农业连年大减产的根本原因也同样在此。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失去了一切,他们也就失去了仅有的生产积极性。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确怀有一种民粹主义

性质的特殊迷信,深信中国农民有一种极大的拥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他一再地废弃他原先预订的合作化进程表,一再要求加速再加速,痛斥邓子恢同志为“小脚女人”。他深信只要建立起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农民们就会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力量,即所谓的“精神原子弹”,从而创造出各种人间的奇迹。正是由于这种大得几近无法想象的信心,他这位农村出生,半生战斗在农村地区的伟大革命家,才会被1958年的那些荒谬无稽的农业“卫星”哄得晕头转向,以至于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那些农业“卫星”要骗住城里人或者不难,但是骗住了农村出身的伟大革命家,却实在是个“奇迹”。

实际上我国的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强使农民“自愿”的性质。只是由于邓子恢等一批同志处事稳妥,才没有出现大乱子。但经毛泽东同志的一再催逼,到了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终于酿成了大祸。

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化,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的“没有货币的社会主义”,搞的都是剥夺农民,结果也都同样是人为地造成了大饥荒。它们同样都不符合列宁提出的合作社计划的精神。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1930冒着杀身之危在一个地区党代会上指出,斯大林的“集体化”根本不符合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列宁是希望通过农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怀,自愿地结合成为合作社,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现今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类似的农民合作组织也是很发达的。它们在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困难,发展农业生产力,特别是在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上,起着重大的作用。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合作组织就办得很有成效,令人羡慕(见《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李昌平同志文)。

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首先在于他这时已不能真正了解农民与农村的实情,却又有太多的民粹主义情绪,生怕在农村中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他看不到在经济极其落后的国度,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其实是意味着社会的巨大进步。他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现状更是太缺乏了解。在他的晚年,他也不愿意知道不符合他的心意的实情,否则经常向他反映实情的田家英同志也就不会在文革中有那样悲惨的下场了。

我以为毛泽东同志晚年有些跟斯大林一样，都犯了迷信政权万能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总以为利用强权就可以任意创建理想的社会关系。他们的这种唯心史观是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正好相反。马克思指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证明了正确的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斯大林幻想他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会使苏联变成世界性的产粮大国，毛泽东同志晚年幻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可以使中国在“1965年或1972年以前”进入共产主义。实现他们这些幻想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严重的饥荒。这是历史对于政权万能的历史唯心错误者的惩罚。不幸的是，巨额的罚款却要由人民群众来付出。

所有这些当然都不是七千人大会当时条件下所能正确总结得出来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以后继续坚持他的“左”的农业路线，至死也没有改正，只是形式变成了“农业学大寨”而已。

对于“农业学大寨”带给农民的苦难，万里同志有几句极其沉痛的话。他受命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亲自在安徽农村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他说：“四人帮在安徽的爪牙抓学大寨特别积极，弄得安徽农民的‘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国务院负责抓农业的前副总理田纪云同志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总结性的大文章《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在引言部分，关于农村改革（主要指包产到户）他用极精炼的文字作了这样一个总括：“虽然开始时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实事求是的几句话其实也正好从反面为晚年毛泽东同志至死坚持不改的错误的

农业路线作了一个总结。

（五）“大跃进”的目标必然要落空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大跃进”，是想让生产力的发展大大加速，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的本意是想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创造出各种人间的奇迹。但是由于相应的错误做法这个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祸。

今天回顾起来，不难看出，即使当年全无谎报浮夸，粮食没有连年大减产，毛泽东同志晚年理想的这个目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真能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生产当然可以有所发展，但是我们当时那种完全脱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只想单纯依靠劳动群众笨重劳动的积极性，就以为可以创造奇迹的意图，也是决不可能实现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在“大跃进”中所搞的，正是这种完全脱离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最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大炼钢铁”。大量一点也不懂炼铁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被召集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炼铁，以便完成国家钢铁产量一下子翻一番的艰难任务。他们到底炼出了些什么，早已尽人皆知了。“后院炼钢”至今还是国际上的一个笑话。当时为此不仅破坏了大量林木与环境，甚至还破坏了一些历史文物。云南大学主楼“会泽院”前的一个石头座子上原来放着一尊造型很优美的铜大炮。它是在清末的援越抗法的战争中立了功的，一炮打死了侵略军的一位将军。不料此时竟也给火化掉了，以便去凑炼钢的数。

为了“大炼钢铁”1958年全国许多粮食烂在田地里。当时我在劳动工地上亲耳听到高音喇叭的广播，一位区委书记就因为同意让一些农民回去收割，而被立即开除出党！

为什么党的最高领导竟会如此企图依靠完全脱离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生产的大跃进呢？这可能是由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使他晚年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既然359旅靠锄头扁担开发南泥湾能取得很大成功，那么全国当然也可以。他没有想到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主要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靠加强简单

劳动量来增加生产,而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想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家的实力,通常是很难做到或做不到的。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现代人的普通常识,但也是七千人大会那时候很难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也提倡科学实验,但是他的“科学实验”往往是跟现代科学脱节,不受现代科学的指导。“大跃进”中各级领导的“实验田”遍及全国,但是最后什么有科学意义或生产意义的结果也没有。

(六) 极左势力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在改革开放前的处境

党在解放前长期战斗在极其落后的地区的农村中,这难免会使党有脱离世界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危险。全国解放时,党的干部队伍就整体而言,文化素质较低,远远不能适应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作为很不发达的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政党,其成员的文化素质偏低些是不可避免的。相对于代表剥削阶级的政党,这是一个不必讳言的劣势。但是如果能够正视它,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采取各种具体措施来帮助和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也就可以了。当时在长期的艰难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通常都是智商超群的。关键的问题是讳疾忌医,死不承认这是个严重的缺陷。

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年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不是鼓励和严格要求各级干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却鼓吹什么“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等等,致令许多人不仅不以自己的文化偏低为耻,不去努力学习,反而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似乎文化越低,政治品质就越好似!这种“越穷越革命”的意识,正是19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为敌的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也同样是20世纪各不发达国家党内各种极左思想的基础。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在党内的大量存在,正是极左势力能够在党内长期占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素养的干部们,在“大跃进”中大搞不要现代科技的群众运动,其实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党内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和

一些知识分子化了的工农干部,保证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之不至于在解放前变成农村贫民的党,也在解放后保证了党没有变成彻底极左化的党。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在党内的处境往往也很困难。糟糕的是,他们自己也往往这样认为,而不知道自己正是工人阶级的最先进部分——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在党内的代表,因而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常常缺乏应有的自信,难以充分地发挥作用,致令极左势力得以长期稳居优势。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需要通过诸多的磨砺和与极左势力的复杂斗争,逐步摆脱自身思想意识上所受到的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真正地掌握住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

党内的极左势力由于代表着非工人阶级的城乡贫民,不仅掌握不了现代科技,反而鄙视科学技术,歧视和迫害科技知识分子。他们主观上是极其革命的,但是客观上,实际上,却是一种阻碍国家建设,甚至是开历史倒车的力量。这对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种悲剧。他们在党内的强大,是有其阶级的根源和社会历史的原因的。归根到底,是由于解放前的旧中国实在太落后,致令非工人阶级的城乡贫民成分对党的领导层起了太大的影响。他们的负面作用在解放前不易表现出来,但是在解放后,中共已经由革命党变成了执政党,需要党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建设时,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大跃进”正是他们的一次大表演。

所有这些当然都很难在七千人大会那种时代背景下所能总结出来。中国人民幸运的,中国共产党幸运的是在邓小平、陈云、叶帅、胡耀邦等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率领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建新型社会等战略和战略目标的确立,党已经彻底否定了过去在对待科学技术与科技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愚昧错误。如今中共正努力把科学的发展观贯彻到自己工作的一切方面。这正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七)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

如果不算十年浩劫,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疑是党的历史上最暗淡的一页。显然,若没有毛泽东同志在那次会议上的非理性的狂怒,“大跃进”中饿坏饿死的农民也就不至于数以千万计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党员也就不会在“反右倾”中遭劫。需知早在1959年初,有些地方就已经有上百人饿死并已上报了中央。1959夏季全国粮食已经告急,一些城市已经只有几天的存粮。在这种情况下又发动“反右倾”,狠整反映真实情况,狠整怀疑大跃进的好干部,就不只是发疯了!

但是对党来说,真正严重的并不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责任问题,而是党中央竟无力对最高领导人的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加以制止。任何人都不是圣人,任何人在个人认识上、品质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在于党的集体要能管得住他,不让他任意作为

我个人认为,作为我们一个共产党来说,党在庐山会议上打了大败仗。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心里都清楚谁是谁非,但是只有张闻天等几个敢于维护真理。党竟无力保护自己最优秀最卓越的领导成员!个人专权的领导人既然可以这样对待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当然也就可以如法对待刘少奇或任何其他的人。最高领导人能在庐山上这样干,自然也就可以在日后掀起十年浩劫。

既然连党的政治局委员都没有写信表述自己的看法的权利,哪里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随着“反右派”的“胜利”,全国的民主气氛已经荡然无存(许多党员也都成了“右派”),只是有在党的高层内还残存着一点。庐山会议后,连这最后的一点民主也化为乌有了。

党都成了这种样子,还怎么能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民主、法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些当然也都不是七千人大会所能涉及的问题。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丑恶、最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丢脸的现象,莫过于“个人崇拜”了。它本身就意味着人民的愚昧和无权,民主与法治的缺乏,个人驾凌于党之上,把革命同志间的战友关系变成了“圣上”与臣下的君臣关系。这哪还有什么先进性可言?彭德怀同志一贯地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他的同志们最初却大都认识不到有这种必要。彭总在庐山上的遭遇使他们认识到

了这一点,但是已经太迟了。

马克思对篡夺了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君主专制主义——波那巴主义是深恶痛绝的。他在《路易·波那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了其十大特征(参见尹振环先生历时30多年的力作《马克思与秦家店》,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不幸的是,这十大特征竟把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和我们的极左时代(特别是庐山会议和文革时)形容得惟妙惟肖,致令引起了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不悦,1972年出版的马恩选集中不仅没有此书的任何章节,连恩格斯对此书的几篇评价也都没有编进去。

那些在庐山上不敢坚持原则,昧着良心批斗彭德怀等的人,很快就遭到了历史的“报应”,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反右倾”尤其是几年后的“文革”中倒了大霉,甚至更惨。

历史是无情而公正的,历史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也做出了客观的结论。他给彭德怀等同志下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很快就因为农民的大量饿坏饿死而弄得自己焦虑不堪。虽则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天才的谋略家,很快就用七千人大会化解了这个严重的危局,但饿坏饿死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毕竟不是一件小事。斯大林死后的命运也自然影响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的心态。虽然文革之初,狂热的红卫兵把最高领导人看得犹如某种新兴宗教的教主,但是到了垂暮之年,领导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们对“文革”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对于像最高领导人这样极其心高气傲、功勋盖世的伟大的历史性大人物来说,这种承认其实是非常凄凉的。而政治道路上的分水岭正是1959年庐山上他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所下的政治死刑判决书。对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只要没有勇气认识和纠正,那就只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越走越远,直到掀起十年浩劫。

与这种凄凉正相对照,从彭德怀同志在得知林彪事件后,对看押他的极左的走卒们的挖苦嘲笑态度来看,彭德怀对于历史是充满了信心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重说一遍,中国党、中国人民是比较幸运的,虽则人民和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但是,1、“大跃进”与“文革”所导致的恶果严重削弱了极左势力的威望;2、极左的群众运动不仅严重地伤害了党的最优秀的好干部,

也伤及整个干部队伍,包括其中最迷信个人的那部分干部,也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思考,致令极左势力陷于空前的孤立;3、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再严重下降,长期没有好转,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极左的领导完全丧失了信心;4、邓小平同志在“文革”(1973年)中复出后所采取的让群众和干部通过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来判别是非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思想觉悟;5、中外之间,大陆与香港之间,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水平上差距的急剧扩大,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思;6、党内、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痛苦的磨砺,空前地成熟起来,党中央领导的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更大大地促进了这一过程。

所有这些都保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开辟了中共和新中国的光辉的新时代。

(八) 历史的评判

毛泽东同志期望在“大跃进”中,通过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在生产的快速发展上创造奇迹。但是事与愿违,反而给国家和人民招致了严重的灾难。

造成这种预期与实际如此截然相反的结果的诸多内在原因,都不是那种时候毛泽东同志所主导的七千人大会就能科学地总结出来的。它们所涉及的深层问题更不是七千人大会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会涉及的。结果是当时那种极左思想并未受到应有的批判,以至极左思想从1966年开始,再一次给国家、人民和党造成了更为深重的“文革”十年浩劫。经过“大跃进”,尤其经过“文革”的惨痛经历,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终于有所觉醒了,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终于开始了对极左思想的艰难的清算。

任何人不顾实际情况,违背历史的规律办事,都会事与愿违,受到历史的惩罚。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以后,把“毛泽东思想”一词界定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而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贡献也包括在其中。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许多人都做出了贡献。

事实上毛选四卷中所有最重要的文章都是党的高层领导集体反复讨论修改的结果,并不是毛一个人的创作。

另一方面,这样也就把它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晚年思想区隔开来。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想法中,固然有着真理,也含有天才的火花,但是确实也有某些不科学的东西。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充满动乱、遭受帝国主义欺凌迫害的落后国家。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度,左翼知识分子怀有某种民粹主义思想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只能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才能加以克服。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听说了马克思主义,但是真正学到的却几乎全是斯大林主义,后者本身就含有民粹主义的成分(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除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能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外文著作外,其他的人大都只能阅读为数极少的几种翻译著作。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其实是不大可能的。何况他们又都投身在紧张的革命战争、革命斗争中,极少有机会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水平低些是难免的。因此也更容易全盘照搬斯大林的那一套,何况党在很长时间内又必须服从为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竟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论,实在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值得所有的中国人为之感到自豪。

解放后国家有系统地翻译出版了马、恩、列宁的全集,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此时若能在学术上有充分的自由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必可有极大的提高。但遗憾的是我们基本上只学习照搬了《苏共党史》为版本的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一套;后者又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相结合,在某个时期又形成了个人集权。这些后来反过来严重地阻碍了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这给我们国家的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

(作者曾任云南省政协常委)

(责任编辑 杜晋)

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

·
何
伟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信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举改变了中国电信事业的落后局面,走在世界的前列,使中国近一半人口享受到信息时代的实惠。这对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信息交流,拓宽交流的空间,推进人们智力的开发,跟上时代的步伐,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可谓贡献巨大,功不可没。这应归功于电信部门的管理和电信企业职工的努力。

在我们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不足之处,社会上对电信行业怨气还不小,我用人们又吃肉又骂娘来形容。现在的问题一方面如何使人们肉吃的更好,另一方面要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骂娘。我认为人们骂娘的主要原因是电信市场缺乏监管。一是行政工商管理进不来,二是物价部门不能过问,三是质检部门无责任,四是信息产业部门无任务,其本身又没有一个监管会,不像电力部门有电监会、银行部门有银监会,电信市场监管属于真空。因此霸王条款、套餐忽悠、价格混乱,市场无序,信息不透明,付费和服务不对称,双方权利不平等,等等,人们有受制之感,有上当受骗之感,有怨无处诉,只能骂娘,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第一、霸王条款。电信企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强制客户接受不合理的收费。

一是开放初期收取座机的初装费。记得当时装一部电话要收 5000 元,如果不想排号等待,想提前装机再交 2000 元。谁也不知道这些收费是根据什么服务和什么成本计算出来的。只知道电信部门利用人们想获取官本位才能享用的电话权,就借机捞一把。其数量之大已占到当时电信企业资产的 1/3,对当时电信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虽说这一收费是愿打愿挨,但其资产就无偿的归电信企业所有,既不付息也不还本。这严格说来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侵犯他人的物权,是一种无偿索取,从良心上讲电信企业是有“原罪”的,有负于全国人民。所不同的是这些集资没有归私人所有,被电信企业占有,只能用中国特色来自慰。

二是目前座机的月租费,不论用机时间多少必须交纳同额费用,否则就停机,如不按期交纳,还要罚滞纳金。人们问这样收费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不按用机时间来收费。业内人士说这是国际惯例,而不是为了钱。可是月租费也不少,全国一年至少 600 多个亿。既然强调按着国际惯例办事,请问:收这么多的初装费也是国际惯例吗?

三是手机双向收费。我国手机双向收费,起因于手机初步进入中国市场,当时作为奢侈品。因手机数量少,价格贵,一般人用不起,就采取了双向收费。这在当时来讲无所谓合理不合理。但问题在于 2001 年,手机已普及化,成为人们的生活必备品,国务院总理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由于消息外泄,使香港的电信股市大跌,不得已派当时的电信部长到香港去稳定股市,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使电信股价得到回升。可见当时不取消双向收费是权宜之计,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取消。可是从 2001 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个两年,股市也比较稳定,而双向收费照收不误。人们不免要问:电信企业这种霸王条款还要坚持多久,消费者还要继续纳贡到何时?

仅举以上三项,足以说明电信企业利用垄断力,违背市场经济原则,进行不公平的交易,使社会向电信企业交纳垄断费用,数量有多少,局外人不得而知,只有电信行业清楚。仅电信企业的利润率高达 20%,这在世界上同行业是罕见的。有了高额垄断利润,就能享受高额的垄断工资和垄断福利。这就成为电信霸王条款横行无阻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利用套餐套钱,忽悠消费者。电信企业出台了套餐,业内人士也说不清,有人估计至少 1 万种。出台正当的套餐,方便消费者的使用,应当受到欢迎。但由于套餐太复杂,又不透明,连推行者也说不清楚,这样,人们就感到电信企业忽悠消费者,进行套钱。

一是手机买卡费的套餐。其一、手机买卡设计时间限制,到时没有用完,有存钱也停机,必须去续卡,否则余额被没收。其理由是电信企业给你准备的设施和服务你没有充分利用,没收余额作为电信企业为其准备服务费的补偿。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的话,公交车上的月卡也可以效仿,因为给你准备的公交车没有足月使用,而所准备的服务和成本照常付出,因此余额要没收。同时各超市商店也可效仿,凡进超市不买商品的都应交费,因为超市为你准备的服务和设施的费用都需要补偿。以此类推,作为消费者还有活命吗?

其二、手机超时余额不续卡就被没收,逼着去买卡。顾客为了手机中的余额不被没收,就想买一个小额卡来补救。谁知所有零售网点一律规定,买 10 元的卡加 3 元,买 30 元的卡加一元,买 50、100 元的卡不加价。消费者为了不被明目张胆的宰,就被迫买大额卡,可是到用时不完又有被停机被没收的危险,再续大额卡,这样消费者就被永远套牢。

其三、零售商的小额卡加价出因何在,没有人解释,是批发商没有给零售商让利,还是批发商让零售商这样做,逼着消费者买大额卡,还是零售商私自加价,批发商对其没有约束,总之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认为是电信企业套餐行为,是忽悠消费者来套钱,把账都记在电信企业的头上,败坏电信企业的声誉。

电信业的预售卡本来属于先付款后消费,全国持卡人有几亿,仅预付款数额就非常可观,只

这一项电信企业就获得非常丰厚的利益。他们不仅不回报消费者,反而设计套餐来圈消费者的钱。先设定手机持卡使用时间,如果到期未用完,先停机,后要没收预付款的余额,逼着消费者去买卡;如要买小额卡要加价,最高加价 30%;为了不被宰,只能买大额卡,买大额卡到用时不完又面临停机和没收余额的威胁。

以上仅是套餐的一例,其他套餐花样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步步为营套消费者钱。本来电信消费者对电信企业有依赖性,双方交易在权益上就不对等,消费者是弱势群体,受制于人。现在又用套餐来圈钱。谁来主持公道,维持市场秩序,使消费者不再被愚弄。

二是目前一些体育比赛和文娱活动,电视台主持人号召人们来参与,猜中者经过抽签,可得什么、或什么奖。同时告诉观众,联通是什么号码、移动是什么号码、小灵通是什么号码,还说一次收费 1 元。不知这些收费电视台和电信企业怎样分成的,其中有哪些猫腻,局外人就不知情了,只知道这是通过手机来骗钱,大人嘱咐小孩千万不要参与,避免受骗上当。

第三、电信是一个无序市场。目前我国电信行业市场非常混乱,无人监管,统一市场还没有形成。

一是手机收费各自定价,全国没有一个统一价格。北京每分钟是 0.6 元,上海每分钟是 0.3 元,西部地区以及西藏才一二角钱。西部收费低可以理解,为了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可喜的是西藏地区电信企业已盈利,不应作为北京的客户高收费的借口。北京和上海都是国际大都市,而价格相差一倍,就令人费解。一说因为总部在北京,办公大楼、职工宿舍都在北京,用地多、房价高,北京就应收费高,这个道理讲不通。总部在北京其费用应由全国的电信收入来负担,而不应由北京人负担。二说北京的房价高,就应高收费,这个理由也说不通,上海的房价比北京还高,为什么收费反而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一商品应当同一价格,没有听说因房价不同,收费标准就不同;可是房价大致相同的北京和上海,收费标准反而相差一倍,使人不可理喻。三说来北京出差人多,往回打手机占了北京的线路,就增加了开支,要对北京人高收费,这是谬论。北京外地人

多,用话率高,不应北京人负担,如同公交车,外地出差人多,增加北京公交车的支出,是否北京坐公交车的人要加价。占用北京线路增加工作量,要加价,有背市场原则。因为在现有设备利用率越高,表明需求增加,其成本会越低,为什么反而高收费。

二是有线电视的收费。开始每月收6元,没过两年就涨到12元,涨了一倍,近几年又收18元,又涨了两倍,这种三级跳的涨价依据何在,有线公司自己说了算,到时不交费就断线。根据电信业的情况,一般是设备安装初期收费高,在现有设备不变的情况下,用户越多,费用支出越低,为什么有线电视老涨价,对这些事情谁来管。另外有线电视收费和服务不对应,断路收不到也不减费,播什么内容也没承诺,利用客户的电视机,占用客户的时间,耗用客户的电,播放大量收费的广告,还强迫客户看,这个市场谁来管。

三是国际电话的收费为什么这么高。要论我国的电信设备不见得比发达国家先进,职工的工资在国内比其他行业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论持机人数之多、市场之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按道理讲我国的国际电话投资成本比较低,为什么收费比国外高,逼得人们不用国

内长途,而用国外长途,使肥水流向外人田。不知这一问题何时才能解决。

总之,以上所举电信市场的混乱,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某负责人在一次媒体通报会上,就直接指出:通信运营商提供套餐、短信、手机上网等服务存在一定价格欺诈行为。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又通报,2006年全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同比上升65.59%。这就表明我国电信市场的混乱。电信行业是一个高科技的新产业,人们对它比较陌生,涉及人数众多,很容易受骗上当。而我国市场经济也属初建,在法制和秩序方面还不健全和成熟,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电信企业就利用手中握有的垄断权和新科技,一会儿用国际惯例、一会儿用中国特色、一会儿出台霸王条款、一会儿用套餐来愚弄群众,要从一条牛身上谋四张皮,群众能不骂娘吗?美国的市场经过几百年,市场秩序和法规比较完善,而他们的监管部门对微软的垄断还起诉,说明政府对电信市场监管的重要性。目前在我国对电信市场进行监管,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应赶快来整顿这一混乱市场,使人们少骂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关注听力,情满北京”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由西门子听力集团在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发起的“关注听力,情满北京”系列公益活动,7月7日在北京门头沟区进行了首场捐助活动。

声望全国连锁助听器专业验配机构作为助听器专业服务网络,本着“服务聋人,造福社会”、“亦商亦善”的宗旨,向国人宣传并推广防聋治聋、科学验配的理念,在“关注听力,情满北京”系列公益活动中,声望公司将陆续在北京进行义务测听普查,并向特困弱听人士提供捐助。

6月23日,声望公司首先与门头沟区政府、区残联合作,拉开了“关注听力,情满北京”系列公益活动的序幕。当日,该公司为门头沟弱听人士进行义务测听服务、听力科普知识宣传。在对门头沟区

的弱听人士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后,7月7日,声望公司开始了“关注听力,情满北京”系列活动的第二项义举,为门头沟区特困弱听人士提供捐助。

捐助仪式由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李焕主持,门头沟区副区长贾文勤、残联理事长李彩霞代表门头沟弱听人士致辞,为声望公司的义举首先在门头沟举行致谢;声望公司总经理李琼在发言中表示,将与门头沟区政府、区残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为贫困聋人提供帮助,并为广大弱听人士提供方便的专业验配服务。同时,将“关注听力,情满北京”系列公益活动向北京其他区县延展。西门子(中国)听力集团代表舒马赫、中国致公党西城工委、海淀工委的代表罗秋菊等向受捐助者发放了助听器。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 高智勇

(一) 缘起

1958年的“大跃进”，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泛滥成灾，造成国民经济失衡。伴随而来的是“大跃进”后期发生在全国（大陆地区）的空前大饥荒。

这场灾难同样波及“首善之区”的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很少遇到过的商品匮乏，食物短缺，市场紧张。

然而，幸运的是，北京作为首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全国各地区、各兄弟省市皆以“政治大局”为重，用行政手段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支援北京。居住在京城的首平百姓也沾了光，——最低生活水平得到维持，且远远高于外省市居民生活水平，而此时神州大地饿殍遍野。

(二) 民以食为天

京城用粮全靠外地调入，自1959年以后，调入发生困难，越来越少。曾一度出现库存用粮不够维持六天需求的紧急状态。当时全市人口不足400万，享用商品粮待遇的“非农业人口”，遵照党中央指示：居民口粮低标准供应，把自1954年“统购统销”后实行的居民“凭证”供粮改为“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所谓“吃商品粮的”）每人按月发放粮票。粮票分为：粗粮票，面粉票，大米票……粮食定量依年龄大小，因人而异，从婴儿降生的3斤、少儿6斤、儿童8斤……至成人21斤不等。此外还依身份不同，指标各异，如在校大中学生、机关干部、特殊工种……略有所增加。其中面粉供应占总定量20%，大米占10%，其余供应粗粮——玉米面、白薯干、有时即高粱面儿、鲜

白薯等杂粮。

婴儿发给奶证，每日两瓶，每瓶半磅。满周岁的，供应1瓶，再掺兑“代乳粉”。代乳粉票和婴儿糖票，每月各发一张。凭票到指定商店可购代乳粉1市斤（由黄豆粉、大米粉及少许奶粉掺兑而成）和黄砂糖2两（古巴产的）。

由于口粮标准低，副食品短缺，人们饥饿，加之受社会影响，粮管部门在定量变更及旧粮票销毁的管理上时有漏洞出现，一时间贪污、偷盗、倒卖粮票以及印制假粮票的案件屡有发生，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当年，作为多数居民的“骨干”副食品猪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月三张票（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张）每票供应鲜肉1——3两，依货源状况而定，肉少时供应1两，肉多时不得超过3两。但自同年5月起，把每人每月的三张票削减为两张（上半月、下半月各一张）。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牛、羊肉自1959年元月起凭票供应。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居民，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位每月发给“清真肉票”三张，票面标明：上旬、中旬、下旬，每张票一次性使用，可购鲜肉1——3两（牛、羊肉二者选一）。货源不足时，曾从西北调入骆驼肉顶替牛肉供应。同时规定：下货（内脏）顶



购货证及粮票、蔬菜票

替鲜肉分量。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它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强化“产销统管”体制。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冬贮大白菜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数斤,十余斤不等,这要根据货源状况而定。

鸡蛋自1958年元月起就实行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但超过十口人的“大户”,每户每月增加1斤。

1960年至1961年,鸡蛋对普通居民停供。仅按中央有关规定,对“特需”人员提供,如在京的领导干部,全国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驻京外交人员等。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

(熟)。花生与瓜子属油料作物,早在1953年即被列为“统购统销”物资。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掌控很紧。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这是后话。

食糖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人每月供应2两。水果块糖或黄砂糖二者选一。黄砂糖是从古巴进口的。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

油(芝麻油)1两。

食盐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大粒粗盐或精盐,任择其一。超过十口人的“大户”可增加半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芝麻酱供应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1两(50克),无包装,自带器皿。

此外,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按户供应。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为“限量不限次”。

糕点食品自1958年下半年起,供应趋紧张,毕竟是粮油制成,为弥补日常饮食热量不足,许多居民抢购充饥,出现排队“景观”;市场经常脱销。自1959年春节起,正式实行凭证限量供应。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可购1市斤,但品种任选,主要是三大类,蛋糕、桃酥、江米条,其它花样儿品种不多。后来由于糕点原料短缺,自当年9月起,由凭证供应改为“凭票”。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

不行)。

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鉴于当年基本国策“以粮为纲”，茶田大幅压缩，改种农作物，产量锐减，市场罕见。

1960年中秋、国庆两节，居民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每户供应茶叶1两（低档）。

1961年春节，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茶叶1两（低档）。1962年，货源更紧张，市场脱销。考虑到“政治影响”，不得不从中央各大机关、部队招待所、宾馆等单位库存茶叶中回收一小部分填补首都市场“空白”。据官方统计：当年回收茶叶达484公担，缓解了市场紧张。同年国庆，每户居民凭证供应1两（中档）。郊区农户供应半两（低档）。在企、事业单位有正式“集体户口”的单身汉凭《个人购货证》每人供应2钱。

北京的餐饮业（各类餐馆、饭庄）奉市委之命于1960年7月30日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自古以来，北京餐饮业闻名遐迩，名菜佳肴，应时迭出，烹制精细、选料考究，滋味各异。然而，这一历史形成的特色，自1953年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后，发生根本性转变。原料采购受到严格限制，其经营品种、饭菜质量大打折扣。继而是1956年的“公私合营”，管理体制变更，许多老字号餐馆、饭庄被“合并”，撤点，有相当一部分关门歇业，剩下的勉强维持，但要隶属于新成立的国营“饮食公司”管理。此时仍基本能敞开供应，主要提供些大众化的主食馒头、烙饼之类。可是到1959年底，又发生变化，当时由于粮油茶肉蛋短缺，北京附近周边城镇（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地）的大小饭馆率先实行就餐收粮票制度，加之当地居民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奇缺，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入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早餐），清晨早餐过后又排起午餐队，午饭后又开始排晚餐队，晚餐过后又开始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往往一家多人轮番上阵，同时又有大批本市居民也加入队列……毕竟此时主食尚不收粮票！此状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不仅粮油消耗量大，且局面混乱，“政治影响”太坏。对此，经中共北京市委提议，并报请党中央批准，自1960年7月30

日零时起，北京市辖区内的饭馆，餐厅一律凭票供应。仅保留少数高档饭馆，不收粮票，但价格昂贵，高价菜肴，非普通居民所能享用。计有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王府井大街路东的萃花楼饭庄、西单北大街的曲园酒楼、王府井大街北口路东华侨大厦内的大同酒家约18处。欲到这些高级饭馆用餐者须提前一日在饭庄门前预约，领取“号牌”，次日凭“号牌”入座用餐。每日“号牌”数额有限。

1960年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党中央根据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人民推荐了若干种代用食品。例如玉米秆粉、小麦秆粉、橡子面粉、小球藻等。党中央要求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土法为主，自做自吃。为了做好这件事，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并要求各地区也要设立相应机构，负责对这一运动的具体指导。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道：“疗效还行”。

（三）确保“特需”万无一失

北京作为首都，集中了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解放军、公安等首脑机关的一大批领导干



困难时期发行的票证



侨汇券、工业券

部。为了保障这一特殊群体的日常消费,坚持‘为党中央服务’的主旨,北京在物资和商品供应工作中坚持确保重点、照顾特需、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又称“特供”。机构正式名曰:“北京市食品供应站”。坐落在东安门大街34号,对外通称:34号。从不叫全名。它的前身是原公安部八局五处——食品保卫处。早在我党建政之初,为了保卫伟大领袖及其战友们的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公安部曾设食品专供站,即:中南海特需供应站。这个“特需供应站”对外称:北京饭店招待所,起初是处级单位,下设四科一室,并管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者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菜蔬、水果、肉、鸡鸭、蛋、奶……等副食品。基地建有专用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糖果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专门设施。这些设施当时皆属最先进的,甚至连猪舍、养牛场……皆聘请苏联专家设计与建筑。

此后,随着政权稳固,特需供应工作越来越完善,不断充实。到1956年,这项长期“政治任务”由公安部正式移交北京市负责。移交时隶属北京市第三商业局,后又划归二商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充实,不断完善,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效机制,沿袭至今。

“特需”主要“特”在三个方面:第一安全(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其二高质量、高水准,第三方便。为了做到这些,食物从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

库、专车……进行。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特需”商品包括:粮油食品、猪牛羊肉、禽类、各类蛋品、各类海鲜、乳品、生猛野味、糕点、糖果、小食品、调味品、罐头、烟酒茶、熟食、鲜菜、干果、硬果、蔬菜、杂货……及日用

品、招待品等等,丰富多彩,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特需供应无小事。为了做到绝对安全,其业务干部和职工皆由市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和化验人员则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工作人员不仅是“政治可靠”思想过硬,而且其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皆经严格审查。他们不仅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和“组织纪律”,还能把服务对象“需求什么?喜好何物?”深入研究、探索,认真落实。由于工作成绩优异,服务对象满意,受到中央多次表彰,曾有9位同志先后荣获毛主席接见。

享有“特需”待遇的干部的特供标准依每人的权位高低、官职大小、级别不同,有所差异,除享有“一级勤务”的首长之外,二级首长、三级首长……逐级逊色。如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简称四副双高)中央明确规定: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正副司局长一级的,每位每月再供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1斤,甲、乙级香烟各一条。

除在中央、人大、政协、国务院之外,而在北京市、地方上的国营大企业、大单位任职的,凡是行政七级以上的,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

斤、白糖 2 斤, 甲级香烟 2 条。

行政七级以下、十三级以上的(当时干部划分为 25 个行政层级, 十三级以上属“高干”)每位每月再供给鲜肉 2 斤、鸡蛋 2 斤、白糖 2 斤, 甲级香烟一条。

行政十三级以下、十七级以上的, 除享受普通居民的低标准供应之外, 每位每月仅能得到 2 斤黄豆、1 斤白糖的额外“关照”。群众诙谐地称呼这个档次的是“糖豆儿干部”。

除此之外, 还有“军特需”、“国宴特需”、“两会特需”、“外国专家特需”……不一而足。虽皆属“特供”范围, 但规格不一, 标准各异。这里仅以体育运动员为例(与外国不一样, 我们是“举国体制”, 体育经费皆由国家拨), 对即将参加国际比赛(注: 困难时期在京仅举办一次国际赛事即 26 届乒乓球赛)在京集训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 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2 两半。

凡是达到国家“运动健将”一级水平的, 在京比赛期间, 每位每天供应鲜肉 4 两(据考: 当时享有这一待遇者仅两位: 陈镜开(举重)、穆祥雄(游泳))。

对即将参加全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领队, 在京集训和比赛期间, 每人每天供给鲜肉 1 两半。

“侨汇供应”: 困难时期为尽可能多赚外汇, 充实国库, 党中央决定“对在大陆的侨眷实行商品供应优惠政策”。凡是从境外汇入的外币, 折合成人民币超过 100 元的, 可凭“侨汇券”增加供应粮食 6 公斤(大米、面粉和豆类各占 1/3)、食油 1 公斤(花生油、豆油二者选一)、白糖 2 斤, 鲜肉 2 斤(猪牛羊肉任择其一), 此外还有棉布 10 尺。

(四) 艰辛的时尚

大饥荒引发出连锁反应——物资匮乏。1960 年党中央决定: 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 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四尺五寸, 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 做上。打一块补丁, 除了收钱, 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 年后, 情况稍缓, 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

外, 还发行过: 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 买缝衣线也收布票, 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娃的妇女, 发给“油布票”一张, 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 还发放过: 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 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 北京市 1961 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 69 种, 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 年底又发行“工业券”。从此, 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 平均每 20 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 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 人造棉制品, 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 京郊大地的农村更困难。由于办“人民公社”, 社员被迫吃“集体食堂”, 淳朴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 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伙无偿捐献出来, 投入高炉熔炼, 大炼钢铁。1961 年“公共食堂”办不下去了, 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灶, 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 纷纷涌入城里寻购。然而, 市区的商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 农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因此, 农民不得不忍饥挨饿, 把省下的点滴口粮和小土特产与城市居民进行调剂、私下交换, 换一点生存必须物品。针对这种现象, 中央发指示: 任何人不得私下进行物品交换、买卖、贩运。1961 年 10 月 9 日, 北京市工商、公安部门全面出击, 仅一天之内就取缔、查获私下交换物品案件 13977 起(罪名黑市交易), 抓获 69913 人。公检法机关“从重从速”审查处理 1 万余名, “依法”逮捕 100 余名, 管制 34 名, “劳动教养”100 余名, 拘留 700 余名, “劳动教育审查”1000 余名, 其余的强制遣送原籍或由所在单位领回去处理。

(作者系北京市二商局干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

· 苏 飞

我进入了东方大学

天空上阴云密布、风雪激荡，这预示着一场暴风雪的来临。1935年冬，我尚在东北一个大学读书，时值学校放寒假，我是因事来校的。就在这一瞬间，一辆日本宪兵队的小汽车戛然停在门前，从上面跳下来两个穷凶恶极的宪兵，他们立即将我逮捕。

我虽然口中喊冤叫屈，但是心里明白，我是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白区工作时间长了，不管你地下工作经验有多丰富，如何小心警惕，不可能一点也没有破绽，一点也不留蛛丝马迹。我也是一样，我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就这样开始了。

世界上若论对待自己的牺牲品、猎物的残忍性、狠毒性和刽子手的坚决性，除了德国法西斯盖世太保外，恐怕没有人可以和日本宪兵队相媲美了。由于日本鬼子张冠李戴、证据不足，我又咬紧了牙关，死不承认，加上校方的营救，我算是死里逃生、幸免于难，获得假释。

出狱后，形势并不乐观，日寇紧紧跟踪盯梢，毫不放松，后来又第二次逮捕我幸而脱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决定，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雷鸣，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千秋万代的帝制王朝。时隔六年，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洪流冲垮了根深蒂固的沙皇统治。这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东半球。

列宁和孙中山结下了伟大的友谊，192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领导骨干的大学，这就是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大批的党内领导骨干，都来这所大学学习，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伯承、叶剑英、傅书堂、杨尚昆、甘泗淇、周保中、伍修权、唐有章、陆定一、王明等。连蒋介石也亲来莫斯科观摩，至于他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维国，据说，都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后来东方大学又改名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莫斯科决定将东方大学化整为零，改成几个分校，设在莫斯科郊区。然而从中国不远千山万水，历经险阻、越过敌人的道道防线、边境哨卡，能进入东方大学则更不容易。

1936年，我终于和在东北抗联的一个大队长，安全地抵达了莫斯科。

幽静校园外肃反扩大化

早在列宁生前，斯大林就当上了联共中央总书记。他是一个苏联少数民族格鲁吉亚人，初露头角，锋芒毕露。列宁辞世后，他日益专横，大权独揽，践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及至1930年代中期，党内的个人迷信，已经发展到顶峰时期。全党人人自危，包括党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人士，老布尔什维克，功勋卓著的将军元帅，被陷害者不计其数。这就是所谓肃反扩大化时期。

这个时候入境苏联求学,实际上是飞蛾投火。然而我们这些盲目的马列主义信徒,毫无所知,全然不觉。

我们头脑里充满了革命意识,来到莫斯科以后,发现一派革命大好形势,我们兴高采烈,其实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

白云飘忽,疏影朦胧,悠悠天际,望断红尘。1937年暮春,莫斯科郊区东方大学分校。

学校的环境非常幽静,周围一片苍翠,草细风微,云淡风轻,翠杉苍桧,十分宜人。而学校院内更是凝青绽翠,柳绿花红,树荫深处掩映着一栋栋的小木楼,校舍就在这里。这里生活条件优越,设备完美,在这里潜心学习,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原来这里是过去沙皇贵族的一座庄园。

我们的教员都是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的专门人才,他们精通马列,具有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渊博知识,而且都是关心中国革命的联共党员。

和我们同聚一室学习的有,来自国民党白区和东北敌占区的同志,有来自抗联游击区的战士,有来自朝鲜本土的地下党同志,其中中朝各有几名女同志。有的满目风尘,两鬓飞霜;有的一身征尘,满脸豪气;有的风华正茂,气质非凡。大家一见如故,意气相投。

正因此,我们对校外风云一无所知,我们与世隔绝,对笼罩社会的气氛并无觉察。

我亲历了公审布哈林

布哈林是1920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马列主义有相当的修养,列宁很器重他,曾经称他为“我们党内的理论家”。他曾写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知识的通俗读物,后来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传播。他还曾提出过,要想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让一部分人,在农村先富起来等



布哈林

等。

列宁谢世过早,党内斗争激烈,斯大林把布哈林当作异己,视为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头两天国际上(即共产国际)来人通知,说明天叫我们组织听广播,公审布哈林。听后,组织讨论,会议记录国际上派人来取。组织上叫我负责组织听广播,开会讨论,作记录等等。

第二天苏维埃法庭公审布哈林及其团伙的广播开始了,我们全体学员都集中在一楼大厅里,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

莫斯科没有派人来,由我担任翻译,同声传译,这对我来讲,是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我在苏联初来乍到,俄文水平有限,还是个蹩脚半通的翻译,只得勉为

其难地承担这一任务。

公审开始后,从一般程序逐渐转到实质性问题上来。对公诉人提出的布氏如何进行反党、反列宁、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等问题时,布哈林一一予以承认,对于他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提供有关苏联国家机密的情报,甚至准备刺杀列宁等罪状时,他也全部予以承认,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答复问题神态自如,若无其事,而听众席上倒有时哗然。

整个公审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公审过程中,也未出现任何意外,假如被告布哈林在法庭上,对他的指控一一予以否认,予以推翻,那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公审宣告结束了,一段时间里大厅里一片沉寂。有人锁眉沉思,有人沉默不语,也有人表示不能理解,当然也有人表示愤慨,仇恨满腔。我宣布稍事休息后开始讨论。

讨论会开始了,在厅里静悄悄,人们面面相觑。入党不久,涉世不深的同志,对布氏的生平经历不甚了解,对国际和苏联的情况所知甚微,不敢妄加评论。而有斗争经验,比较资深的同志,若有所思,若有所忆,脑子里可能还翻腾着不少问号,还未得到解答。最后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的空气,

他似问非问地说：“布哈林何以堕落到这种令人震惊的地步，他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我表示愤慨！既然他已经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应该严加惩处！”

当时与会的人，无不认为无产阶级法庭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有人颇有感慨地说：“看起来，一个共产党员，不管你领导地位有多高，理论知识有多深，如果不彻底进行思想改造，蜕化变质，腐化堕落，就有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布哈林就是一例。他完全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还有人情绪激昂，声色俱厉喊道：“打倒布哈林，布哈林罪该万死！”

最后大家提出处理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对布哈林应该处以极刑，我也赞成并举手通过了。

我神秘失踪，到了反革命成堆的地方

1937年4月末，我突然神秘地失踪。苏联内务部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摸摸将我逮捕，校内无一人发现。当时众说纷纭。有人猜测：“要是他奉命回国，也不应该不辞而别啊！”有人寻思：“他一个人去莫斯科，也不至于走失，他能讲俄语啊！”也有人想得更远：“他是不是被国民党、日本大使馆绑架去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苏联国土上能发生的事情。

学校的课程和一切活动都停下来了，因为我既是班长，又是翻译，还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这种状态不能持续太久，过了一段时间，其他学员也开始步我的后尘，陆续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儿，她还是一个孤儿，她算幸免于难（此人现在还健在）。

1940年代后期，我在苏联北方见到了一个朝鲜女同学，她是在学校最后被捕者之一，我们一见面，她不禁失声痛哭，我被捕后学校里的情况，是她提供的。

原来我们的分校早已被列为怀疑、监视的对象，周围布满了克格勃工作人员。这是当时一个特工人员、专门负责我们学校的人，后来他也身陷囹圄，一次偶然机会相遇，他亲自对我说的。学生的名字他都知道，我问他为什么入狱，他指指自己的舌头，意思是祸从口出。他们长期跟踪，一无所获，

这时中共驻莫斯科副代表康生，不止一次地向苏方建议，将我们隔离起来。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拿我开了刀，我们全校学生都被逮捕，全部是反革命、日本特务等等。天下竟有这样事，党代表告发、出卖自己的同志。

我们这些人都是来自斗争前线，在刀光剑影中和敌人周旋的地方，平时嗅觉灵敏，警惕性都很高，可是为什么在莫斯科我们却这样麻痹、毫无觉察而束手就擒呢？

我们这些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来到莫斯科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如同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什么嗅觉、警惕性都已消磨殆尽。如果我们中间真有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来的奸细，日伪特务，我想，他们倒一定会有所觉察的。

在莫斯科“布特卡”监狱，经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痛苦的思想斗争，我们这些人含冤莫诉，有口难分，经过拘留、审讯，都被打成了奸细、特务、反革命、人民公敌。刑期有长有短，流放地方各异。这时我，可能不仅我一人，想起了公审布哈林的情景，这是否同出一辙，是否大同小异，是否是一个翻版，缩影？

后来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来到了劳改场所，服苦役的北极圈地带。这里寒风凛冽，六月里还飘着雪花，是一个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极限世界。这固然惊人，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到了反革命分子成堆的地方，周围大大小小都是反革命！我们一尘未染、纯洁的心灵在想，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什么是我们的处世哲学的原则？

和我们同样罹难的人，是真反革命，抑或是假反革命，和我们同样的反革命，还是和布哈林同样的反革命？开始我们还有戒心，洁身自好。后来发现这里有原边疆党委书记库兹涅科，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著名学者、地质学家克列姆斯，天才女高音歌唱家鲁斯兰诺娃，苏联足坛名将斯塔罗斯钦兄弟等等。与之相比，我们相形见绌、微不足道。

这就引起了我们一连串的思索，有时彻夜难以交睫。这个地方自然、生活、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们学校除个别人从那里生还外，其余全部殉难，葬身于北极川冰雪之中。

看起来，对敌斗争并不最可怕，可怕的是出现

这种局面,即几个人,更可怕的是一个人,他的权力无限大,唯我独尊,独断专行,为了自身的需要,他有权力给别人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叫你有口难分,沉冤难诉,这种局面未免太可怕了。这里我想起了大仲马的一句话,他说:“最可怕的枪子,不是敌人的枪子,而是自己人的枪子。”

斯大林执政三十余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遭受迫害者,无辜惨遭杀戮,集中营劳改犯遍布全国,人们动辄得咎,恐怖气氛笼罩全苏联,这样惊心动魄、令人心寒胆战的迫害、政治斗争,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和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是背道而驰的。

布哈林遗孀不辱夫命

关于布哈林的轶事,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早在1930年代,布氏已有预感,他在劫难逃。一次他突然跪倒在他夫人的石榴裙下,他说:“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否则我就长跪不起。”

夫人满口应允,并请他起来。

他说:“党内的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看起来,我已难以幸免,我现在口述一遍我的申诉,你不能笔记,只能背诵下来。等有一天党内出现了真正的民主,你才能向中央申诉,为我申冤。”

等他的夫人背下来诉词之后,布氏才放了心。过了不久,布氏去参加苏共的一次会议,就再也没有回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布哈林的遗孀认为时机已到,才向中央提出这次申诉。

布氏平反以后,他的遗孀还写了一本有关布氏生平的书《布哈林》。这本书问世以后,风靡一时,畅销全国,很难买到。我虽不惜重金,希望一观而后快,但可惜未能买到。

《布哈林》一书发行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对布氏在公审法庭上的表态的评价热潮。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是,布氏在法庭上根本不应该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也有一些饱经世故,比较资深的人士则认为:“布氏当时的处境,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一死,别无他求。什么罪状他都可以承认,但求速死是他唯一的解脱。”也有人认为,在公审的法庭上,根本不是布氏本人,而是替身。

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党员,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沙皇的监狱、西伯利亚流放、充军发配,什么滋味都尝过了,而斯大林的迫害他却不能忍受,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到何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苏联解体前后我重访旧地

1991年苏联解体。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72年铁打的江山,固若金汤,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竟然毁于一旦。

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辉煌胜利,是上一个世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伟大事件。它的失败和消亡,也是上一个世纪人类社会最突出和重要的事件。十月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给人类的思维输入了新鲜的活力,丰富了人类文化。毫无疑问,它的消亡,不复存在也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1980年代后期,我有幸重访苏联、旧地重游,我心情无比激动。我登上了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往事哪堪记省?1935年隆冬,在夜色掩映中,我们三人,老交通,王队长和我从边境小镇半截河出发,呈三角形,冒雪沐风向苏联行进。突然暴风雪来临,在膝盖深的雪中匍匐前进,边境哨所日本军的犬吠声,一阵传来,我们心胆俱裂。入了苏境,边防军官迎接我们,他说:“大瓦里什,你们辛苦了!”

我们身上的汗水,已经湿透了棉衣。

火车进入了苏联境内,远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我站在窗前眺望,参天古树,烟云迷漫,岳林相接,湖光山影。一会儿出现了遥望无际的白桦林,像婷婷玉立的少女,婉约多姿,一尘不染。我神思遐想,心醉。及至到了贝加尔湖,水光激荡,水天一色,山光云影,烟雾微茫。一路上风光无限,景物依稀,岁月易变,幽赏难期。

两幅图画,两种情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无限憧憬在困扰着我。

到了苏联,我惊奇地发现,苏联还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这些年来,苏联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历史停滞时期,他因循守旧,无所作为,时光虚度。后来上台的契尔年科,未能显示自己的才能就病危逝世了。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当上了苏共(下转第23页)

苏飞冤案平反何其难

• 于 彬

我和苏飞在《人民画报》社同事多年，他一生坎坷多难，曾三次被捕入狱，流放和服刑前后达十五年之久。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苏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苏修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1981年8月刑满释放后，他这个罪名至2006年没有得到改正和平反！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一直希望能揭开的谜团。

苏飞1933年春在哈尔滨入党，在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下，为东北抗日联军做过大量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1935年12月因遭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队抓捕，后经组织营救而暂时获释。但日本宪兵队仍对他暗中盯梢，准备随时再次逮捕他。黑龙江省委鉴于苏飞当时处境很危险，遂于1936年1月派他去苏联学习。

可是苏飞万万没有想到，他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一年多之后，于1937年4月22日突然被克格勃的秘密警察逮捕，硬说他是“日本特务”，并把他流放到北极圈地区，服刑达五年之久。这件事使苏飞百思不得其解，他是为抗日救国才被日本宪兵队抓捕的，而到了苏联之后他这个抗日战士竟变成了“日本特务”，这完全是黑白颠倒。直到2002年此事才真相大白。有人于1997年在苏联克格勃的解密档案中，找到了王明和康生给克格勃提供的一份“绝密”存档文件即“35个有问题的中国人名单”，这份名单中就有苏飞的名字。这份文件的落款是“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王明、康生”，有两人的亲笔签名。王、康二人竟不分青红皂白，不经审查甄别就建议克格勃将这35人“隔离（流放）”或者“驱逐出境”。苏飞阅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陷害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十分敬重和信任的中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正是在他刚到莫斯科不久就找他谈话的康生！这使苏飞回忆起那次谈话的情况，康生挖空心思地追问当初日本宪兵队抓捕他的每一个细节；紧接着他又追问苏飞的入党动机，整个谈话持续了七个

小时之久。苏飞感到康生那次谈话根本不像同志之间的谈话，而是在审问犯人。

苏飞于1942年刑满释放，并于1943年应征入伍，但由于他的“日本特务”罪嫌没有得到平反而只能当苏军的后勤兵；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也是由于同样原因，他找不到工作，只能再回北极圈去干地质勘探队工作。苏飞于1947年同苏联姑娘苏玛丽结婚。他被流放，和后来当后勤兵以及在地质队工作期间都是在北极圈地区，前后共18年，那里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生活极其艰苦。直到1954年苏飞才在我驻苏大使馆的帮助下，携妻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苏飞回到祖国后，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他们的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1956年组织上给苏飞恢复了党籍，定为行政级十三级，分配在外文局工作，继后被任命为《人民画报》社编委、总编室主任和外文局出版部副主任等职务。

在60年代初，中央成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苏飞被借调去任翻译工作。这个《毛选》小组的组长是康生，有一次他召集全体组员会面，当编译局领导向康生介绍苏飞时，说“苏飞同志俄文水平很高，在苏联又是坐牢，又是劳改。”康生听到此神情一愣眼睛盯着苏飞好一阵子，似已认出了苏飞。从此他的厄运又开始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苏飞就被外文局的造反派揪出去批斗，戴高帽游街，并被打得遍体鳞伤。苏飞的妻子苏玛丽也于1970年5月7日被当作“苏修特务”遣返回苏联。到1971年8月苏飞被北京市公安局以“苏修特务”罪名逮捕，被关押五年之后，才于1976年由北京市中级法院宣判他犯的是“反革命罪”，判刑十年。苏飞被关押期间，专案组人员对他施用种种手段进行逼供信。当时负责苏飞案件的不是外文局，而是中央专案组，谁都知道中央专案组是康生负责的。真是无独有偶，这一次陷害苏飞的又是康生！现在康生的狰狞面目已尽人皆知。当

时他为了掩盖其在莫斯科期间同王明勾结的阴谋和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对于凡是了解他的情况的革命同志都挖空心思加以陷害，甚至连在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的那批中国学生都不放过，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扣上了“苏修特务”、“叛国”和“通敌”等帽子关进牛棚或监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现在这些同志早已得到了平反，而苏飞的问题至 2006 年仍然被挂在那里。虽然苏飞曾多次提出过申诉，要求对他的不白之冤平反。可是，这些投诉如石沉大海，迄今无下文。苏飞还能有多少时间等待呢？北京市中级法院给苏飞定罪的唯一证据是在 1970 年 5 月至 1971 年 8 月苏玛丽被遣返回国这个期间苏飞给她写的四封信，专案组硬说那四封信是向“敌国”提供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情报。苏飞给他妻子那四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呢？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内政治异常混乱，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揪斗，并冠以叛徒、内奸和工贼三大罪状；开国元勋彭德怀元帅以及许多其他元帅和副总理等重要干部被靠边站，游斗、毒打，甚至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李立三和陈昌浩等被逼自杀……苏飞对这一切很不理解，就在

信中告诉了他的妻子。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他“通敌”的罪状。在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对此都不理解，街头巷尾议论这些事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各大专院校的大字报所透露的情况远多于此。

苏飞于1981年8月刑满释放，出狱后生活十分悲惨。他没有公职，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近30年来他每月只能领到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养家糊口。苏飞妻子苏玛丽于1988年再次来到中国同老伴苏飞相聚，心中一直期盼着苏飞的冤枉能得到平反，到2000年，她因身体不适又回到俄国，于2002年怀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终年79岁。现在苏飞已是91岁高龄的孤寡老人，一旦生了病，身边无人照料不说，连就医的钱都没有。

年复一年的等待,年复一年的期盼。在苏飞的反复申诉下,在一些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下,苏飞的冤案终于平反了。2007年2月1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正式通知他:经法院调查,北京市中级法院1976年对苏飞“反革命案”的判决是错误的,现宣布苏飞“无罪”。苏飞的苦难总算走到了尽头。

(责任编辑 杜明明)

(上接第 21 页) 中央第一书记。

在寒风萧瑟中，我重访和我在一起度过北极圈白夜的老难友，孰知这些风雨患难中的朋友，几乎凋零殆尽。我终于找到了一位还活着的鬓发披霜的老难友，他见着我哽咽不语，泣不成声，满腔幽怨，一言难尽。他说：“老朋友，咱们是怎么活下来的，简直是天方夜谭！我们失掉的太多了，太多了……”

我思忖，这个无限委屈的闸门要是打开，不，不能打开，打开，一泻千里，我们的感情是受不了的。我说：“咱们不是还活着嘛，你看，你是俄罗斯人，我是中国人，感情是没有界限的，来，咱们共饮一杯酒。”

我的朋友，眼中饱含着泪水，笑了。

苏联解体后,我再次重游故地,这次是来到了俄罗斯。一如既往,先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陵墓。从远处就看见那里排着长队,人们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涌向克里姆林广场中心。我也排队,拥进人流。进入陵墓后,人们肃然起敬,围绕列宁的遗体环行一周,只见这位世纪伟人,神态自如,态度

安详,像睡熟了似的躺在红毯上。

人死无知，列宁岂知十月革命已经被葬送了。从陵墓出来，阳光无限，天霁晴朗，微风轻拂，心清似水。很多人还依依不舍，久久不肯离开这里。

苏联解体后,据说,当局曾数次计划拆除列宁陵墓,把列宁的遗体迁出莫斯科红场,移往他的故乡乌里扬诺夫公墓。但是莫斯科市民和全国广大群众,反对此举,数百人声明,我们将静卧在列宁墓周围,要想移动他的遗体,除非先越过我们的尸体……

在暮色苍茫中，我离开了红场，列宁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公审布哈林事件，已经是 60 多年前的往事了，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湮没。新世纪展开了新的人生画卷，那次收听公审广播，参加讨论，后来神秘失踪的人，可能一个也没有了，我还活着，白发惊回首，当时的情景，风云变幻的人生，都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永远难以忘怀的记忆，我不应该忘记，也无权忘记！

（2003 年 5 月）

(2003 年 5 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1992 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 雷仲予



邓小平和杨尚昆参观珠海市江海电子有限公司

牛正午摄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并发表重要谈话 15 周年，也是这位伟人逝世 10 周年。广东的传媒从 1 月下旬开始，连续发表纪念文章，回顾和评论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读报之余，15 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采写国家主席杨尚昆考察广东而又目睹邓小平南行风采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脑际。这是我几十年记者生涯中一次不寻常的采写经历，历久而不忘。

邓、杨在深珠的活动多在一起

1992 年之初，已经无官在身的邓小平离京开始南方之行前，通过工作人员给中共广东省委打招呼：他此次到广东来是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报。按照这“四不”口径，中央新闻单位没有一个记者随行，广东省委开始时也只安排广东电视台、深圳电视台 4 人跟随拍摄，留下一些资料而已。

1 月 19 日，邓小平一行乘专列抵达深圳，当天就游览市容，参观皇岗口岸。车队进进出出，引起敏感的香港传媒的注意。已经前往深圳陪同邓小平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考虑到邓小平此次到

广东来，虽说是休息，但也有特别的意义，日后有可能见报，要有所准备，所以交代身边的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立即通知新华社广东分社派人来，跟随采访，把握情况。当时，我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的岗位上，分管新闻报道业务。陈开枝从深圳打来的电话是我接听的。他说，中央领导同志到深圳，请通知牛正武同志（另一位副社长）火速赶来。当时，我以为“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因为在这前几天，广东省委已经正式通知我们

新华社广东分社，国家主席杨尚昆即将来广东考察，要求安排记者随行采访，这项任务由我承担。所以，我在电话中对陈开枝说：“我们已经做出安排了。”但他急切地说：“不是，另一位。”我问他是谁？他不便在电话中告诉我，只说了三个字：“掌舵的！”我一听也就明白了。

牛正武于 19 日傍晚赶到深圳。《深圳特区报》也派出文字记者陈锡添跟随邓小平采访。

1 月 21 日，即邓小平已到达深圳的第三天，杨尚昆一行飞抵深圳，我也就开始跟随杨尚昆采访。

邓小平下榻深圳迎宾馆桂园，杨尚昆则住在蛇口一处宾馆。两位老人家在深圳会合后，连续两天的考察活动都是一起进行的。1 月 21 日参观中国民俗文化村和锦绣中华微缩景区；22 日参观仙湖植物园，两人在一处缓坡草地毗邻的地方，共同挥锹栽上了两棵高山榕。在这一天参观植物园的过程中，邓小平、杨尚昆还谈到了他们从 1932 年到 1992 年长达 60 年的交往，情真意切。

1 月 23 日，邓小平一行离开深圳，在蛇口港乘船去珠海，杨尚昆则继续在深圳考察。1 月 26 日，杨尚昆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也从蛇口港乘船

去珠海。先期到达珠海的邓小平参观了珠海生物化学制药厂、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公司。1月27日,邓小平与杨尚昆一起,考察了珠海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月29日下午,邓小平一行离开珠海,前往顺德市(现佛山市顺德区),参观珠江冰箱厂(现海信科龙公司),当天傍晚从广州东站乘专列前往上海,结束了在广东11天的行程。杨尚昆结束在珠海的考察后,继续前往中山市考察,2月1日从佛山乘专机回北京。

从1月21日到2月1日,我跟随杨尚昆采访,向他送审稿子,他对我已经认识了。杨尚昆结束了在广东的考察以后前往机场,我随省委的陪同人员一起到了机场送行。在停机坪上,送行人员靠前——同杨尚昆握手告别。我是一名记者,任务是采访,与送行人员保持了一点距离,也没有趋前同杨尚昆握手告别。可是,杨尚昆却向我走来,一边说着“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一边同我握手。这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在邓小平、杨尚昆在广东考察期间,我的任务是采写杨尚昆的考察活动,而邓小平的考察活动则由牛正武掌握。但是,这两位老人家由于在多个场合同时出现,我也有幸近距离目睹邓小平南行的风采,并聆听到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南行之中一些重要谈话。

在稿子中透露一点邓小平谈话精神

邓小平、杨尚昆一前一后来到深圳,一直没有向外宣布。但是,两位老人家在深圳的参观、考察活动,基本上是公开的。他们接触了很多干部、群众。邓小平在参观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时,许多群众见到他出现的那一刻,热情欢呼“小平,你好!”抢着要同他握手。杨尚昆在考察中也接触了不少群众。他漫步沙头角镇中英街时,街道两边的群众纷纷涌上前来,热烈鼓掌欢迎。所以,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的消息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烈话题。香港和海外的传媒,凭着其锐敏的触角,很快就有了行动。三五成群的境外记者,天天蹲在邓小平下榻的深圳迎宾馆门口,观察进进出出的车辆,窥探车上坐了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做出各种猜测性

报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通过传媒“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和其他渠道,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纷纷投向深圳,关注邓小平的活动。

可是,我们新华社只能按兵不动。邓小平南行已经打过招呼不见报,就是我当时采写杨尚昆考察深圳、珠海的稿子,尽管不少场合有邓小平、杨尚昆同时出现,我也只能报道杨尚昆而回避邓小平。在发稿时间上,我按照过去的“惯例”,准备等到杨尚昆结束在广东的整个考察活动以后才发一个综合稿子,没有急着做发稿的准备。谁知1月25日中午,杨尚昆在深圳的考察活动即将结束,明天就要前往珠海,陪同考察的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考虑到邓小平、杨尚昆在深圳的消息,在外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所以要求我当天就要发一个消息,报道杨尚昆在深圳的考察活动。这下我就急了,匆匆吃了几口饭,立马躲进房间写稿。

提起笔来写稿,要突出什么主题思想呢?杨尚昆在深圳考察了几天,有时还是与邓小平在一起考察的,也讲了不少话。在深圳期间,我直接听到邓小平的谈话不多,但间接听到的倒不少。各种信息和迹象表明,邓小平在深圳各个场合的谈话,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开放,把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的谈话精神对杨尚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我就抓住杨尚昆在深圳考察期间的讲话中能够体现邓小平谈话精神的话重点突出来,把它写进这条消息的导语中:“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要更放宽些,更大胆些,比现在还要放开。”

稿子写完后,已经接近吃晚饭的时间,我速将稿子送到杨尚昆的住处,当时他的秘书也在。我将稿子交到这位秘书的手中以后,就坐在客厅等着。不一会儿,这位秘书就把稿子退给我。他对稿子的个别字句做了一点修改,签上“已经审阅,同意发稿”八个字,落款“尚昆同志处”。

我拿到稿子以后,飞快出门,以最快速度把稿子发往新华社总社,总社也于当晚向外播发,次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纸采用。

从1月26日到2月1日,杨尚昆在珠海、中山考察。在这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听到邓小平南行谈话的内容就多了起来,杨尚昆向当地的干部、群

众的讲话,体现邓小平南行谈话精神也更明显了。我在2月1日从中山市发往新华社总社的第二条稿子《国家主席杨尚昆考察珠海、中山》的导语中,就特别写上“杨尚昆在考察中强调,过去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我们要更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步子更大一些,发展更快一些。”从后来看到的邓小平南行谈话的文字记录稿来看,杨尚昆在讲话中强调的这“三个一些”,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南行谈话的精神。

杨尚昆到广东的深圳、珠海、中山考察,我分段发了两个稿子,打破了过去新华社对中央领导人到一个省考察要等全部行程结束后才发稿的“固定模式”。这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稿子,写作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可言,但因为它透露了一点邓小平南行谈话精神,所以格外受到受众的关注。在完成文字发稿的同时,我也给新华社总社发去了几张用“傻瓜”相机拍摄的照片,也被选发了。

值得历史回味的东西很多

1984年1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王震南下广东深圳、珠海考察,提出“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全国的改革开放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我国历史发展重要关头的1992年之初,邓小平以一位革命老人之身,不顾高龄又与身为国家主席的杨尚昆一前一后南下广东,在深圳、珠海共同度过了几天。这绝不是一种偶然和巧合,值得后人解读。

邓小平在这次南行中,发表了关系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谈话,又一次促进了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神州大地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为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留给后人这份珍贵的政治遗产,具有开启时代的非凡意义。

然而,邓小平如此重要的南行谈话,见报过程却相当曲折,耐人寻味。由于邓小平坚持自己不开见报的口子,尽管当时香港和海外的传媒对邓小平在深圳的活动已竞相做出许多揣测性的报道,我们新华社虽有记者随行也不敢轻举妄动。跟随邓小平采访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 却有备而

来,他不管开不开口见报,抓住一切机会,详细地记录了邓小平在深圳每天的活动和谈话内容,悄悄地写成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伺机见报。在邓小平离开深圳两个月后的3月25日,终于以大篇幅推出了这篇通讯。3月30日经新华社全文转发了这篇通讯后,《人民日报》等全国众多报纸刊登,海外不少传媒也摘要发表,引起了轰动效应。邓小平在珠海的活动,《珠海特区报》记者后来也写成通讯发表。他们也热切希望新华社转发,但为时已晚,只好由《瞭望》周刊予以刊登。至此,我国大众才从正式渠道对邓小平南行和谈话内容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当然,在这前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报纸,也连续发表评论文章,从侧面披露和阐发邓小平南行谈话的重要思想。2月28日,党中央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把邓小平南行谈话的内容发至全党,在全党和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邓小平南行谈话精神的热潮。

邓小平南行和谈话的见报问题,由开始不开口子到后来开了口子,而且口子开得越来越大,报纸通讯、评论,个人署名文章,还有电视,铺天盖地,刮起了一股“邓旋风”,吹遍大江南北,传遍全世界。当然,这个口子不是邓小平本人开的。应当是说话算数的相关权威人士点头支持才开的。但是,到底每一个口子是怎样开的?多年来无论是口头流传,还是见诸文字,对这个问题的解读都有不同的版本。看来,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说话,或由历史学家去考证,才能有个准确的答案。

当年,全程陪同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考察的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2004年曾经写过一本《邓小平南方之行》的书,他对见报问题自有一番见解:“一个退休老人‘休息’,兴师动众,见于报章,不是他的心愿,不是他的作风。”但是,随后11天的“休息”,却并没有完全按照老人家的初衷而进行下去。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爱戴,对他的企盼,以及他这次“休息”所造成的影响,都使这次“休息”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关于邓小平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的新闻大战就这样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陈开枝的这段话,也是对邓小平南行和谈话见报问题的一种解读吧。(责任编辑 杜 晋)

一篇“内参”引出的悲剧

● 杨克现

1965年秋，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30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奉新华社总社之命，到陕北子长县采写瓦窑堡市新貌一稿。这是总社预约的“长征路上新气象”系列中的排在最后一幕的稿件。

瓦窑堡，是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后走向抗日战争的历史名城。1935年12月，党在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任务与策略。

一进入瓦窑堡市，我发现这个坐落在黄土高原狭谷地带的历史名城有着鲜明的特色。在这里，它的窑洞房舍高高低低、重重叠叠，全都半依山坡而建造。道路四通八达，市井还算繁荣。然而，这座标志着红军长征历史转折的名城一切有关党中央、中央红军、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活动遗址，全都尘封闭锁在茫然的历史之中。问街道行人、居家市民，皆全然不知不晓。我踌躇街头，感到茫然。

找子长县县委、县政府，干部都是中青年一代。他们对我关心的问题一无所知。向他们索要历史档案，他们连一纸历史资料也找不到。几经交涉，县委才抽出办公室一位青年干部，说是先帮我做一些寻找历史线索的工作。他好容易打听到昔日的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的所在地——县城关小学。可我们进校之后，找不到任何标记。又说城外马路边黄土坡下有毛泽东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的土窑洞，说有一棵杏树作标记，我们二人亲临其境，无不感到诧异。一则，那窑洞太小，只能蹲进三两个人；二，窑洞外是有一棵杏树，但枝干过细。估计不过十来年的树龄，而要作为红军时代的杏树，树龄起码应当在三十年以上。

大半天都过去了，我要瞻仰的党中央、红军总

部、毛泽东主席故居等遗址，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这才想到，莫非这些当年核心秘密的遗址至今仍未解密。要解密，就非得有当年熟悉情况的红军老人指点才行。试想：现在三十年都过去了，接班人是青年一代。三十年前的老红军，随着革命的发展全都走空了，谁还会留在这小小的县城呢？

那天，已到了深夜睡觉前。办公室那位青年同志来找我，说是已经打听到一位退职在家的老干部，是当年的陕北红军，听说还担任过瓦窑堡市什么“长”呢！这人名叫赵通儒。也就剩他一个人了。

“这样的人，只要有一位我就不虚此行。”我兴奋，只等待第二天去拜访他，连晚上睡觉，也梦见一位头戴八角帽的老红军……

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老人的窑洞，见到了赵通儒。他头发花白，风度儒雅。临窗桌案上摆着一幅尚未完成的花鸟画，由此联想到，他退职多年，赋闲在家，已经过上了一种与世无争、潇洒清闲的生活。我报告了身份，说明了来意。他赶快为我们让座，沏茶，也就毫不推辞地以长者的神态，讲起当年亲自参加陕北红军接待中央红军的故事来。

他兴高采烈，侃侃而谈。他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大多数人都是衣不蔽体、破烂不堪。陕北红军想到中央红军一路征战的种种艰苦，眼看冬天快要到来，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安排驻地，解决住宿问题。同时，也抓紧时间落实赶制棉衣棉被的工作。十天半月，一番忙碌之后，总算在隆冬到来之前，完成了一种大家认为是非常艰难却又光荣的任务。二是，为欢迎中央红军，陕北红军还尽其所能筹办过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互相联欢。为筹备这个欢迎宴会，杀猪宰羊自不必说，还多少动用了海参、鱿鱼、虾仁之类的海味。宴会本来进行得颇

为欢快,不料有人节外生枝,无端地指责说,这场宴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对中央红军的腐蚀。陕北红军中接待工作人员,拒不接受这种指责。官司打到毛主席那里,倒是毛主席为陕北红军解了围,说两军庆祝会师,略备酒肴,也是人之常情,才结束了这场小小的风波。

老人对于节外生枝的指责似乎还有点意见。他说,要不是陕北红军有这块根据地,还不知道中央红军此时在什么地方怎样过冬呢?意见中也带有陕北红军的自豪。这情况使我有点惶惑。因为我来瓦窑堡前,曾读过毛选,似乎毛选上有个注解说到中央红军来到陕北,挽救了陕北红军事情。怎么注解没有提到陕北红军这些功劳呢?

最使我感动的是,老人介绍完毕,竟不辞劳苦,热情地领我们去瞻仰党中央、毛主席当年的革命遗址的情况,他直把我们领到一处一排全是青砖砌成的窑洞的巷子里,如数家珍一般点出中央最高层住过的窑洞来,还分得出:哪面窑洞是毛主席与贺子珍住过的,哪面是周恩来与邓颖超住过的,朱德与康克清住过的,还有洛甫即张闻天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以及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的窑洞,等等。所有这些昔日的革命领袖住过的窑洞遗址,此时此刻全都锁着窑门,不为外人所知,除非像他这样亲历的人才能说得如此清楚。我们走近一个一个窗户向窑内看去,里面还放着各种紫红色的古旧式的家具,只是窑洞墙壁四角挂满了蜘蛛网,冷冷清清,实在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凄凉感觉。

回西安后,便将瓦窑堡遗址的观感整理成一份“内参”稿,交给了分社领导包小白,这份内参直发北京新华总社,同时抄一份上送中央西北局。我原本的期望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重视一下瓦窑堡革命遗址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并对这些革命遗址给以权威的说明,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很快有了批件。这批件下发到西北地区所有地委一级领导。

陕西分社社长包小白接到了这个文件,立即兴冲冲地向分社职工传达了批示的内容:说批语高度评价了撰写内参的新华社记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又说,记者的水平当在许多地委书记以上云云。包小白补充说,这既是记者的荣耀,也是新华分社当然也包括社长自己的荣耀。我级别为17

级,尚无资格看这个批件。但听传达也使我这个采访时处境难堪的记者意外地受宠若惊起来。

1965年,发生此事的时间已在八届十中全会三年之后。此时,重提阶级斗争一般干部多少都知道一些,却不知道事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也不知道三年前有一本《刘志丹》的小说,被批为“利用小说反党也是一大发明”,株连到不少无辜的人。我这篇内参也被卷入“陕北救红军还是红军救陕北”的争论之中。那位导游老红军的话,被当作“陕北救红军”的言论,这是当时不能容忍的言论。我这份内参很快被中央西北局批示拔高以后,竟然连累到中共子长县委,连累到为我热情作导游的老人。有消息说,中共中央西北局也许还加上中共陕西省委,立即派出了工作组去到瓦窑堡,整顿县委,斗争了为我作导游的陕北红军老人。于是我受宠若惊的心情全然消失,思想反倒格外沉重起来,从为人道德来说,仿佛自己做了一件洗也洗不干净,对不起子长县委,特别是对不起那位退職在家的陕北老红军。他,一位老红军本来在家养老,颐养天年,醉心丹青,久已与世无争,何苦因为给新华社记者作了次导游,为陕北红军说了几句好话,反而无端地遭到批判斗争呢!?再说,党中央、毛主席在瓦窑堡的革命遗址怎么整理,怎么修葺,怎么说明,都应当是党的高层该管的事情,为什么硬要下放给成年累月忙于人民群众生计的子长县委、以及早已作了平民百姓的红军老人来负责呢!?

最惨的事情是那席卷一切的文革风暴。全国上上下下都卷入了颠三倒四的大批大斗之中,一切都难以尽述。瓦窑堡那位为我作导游的老人命运又会怎么样呢!?三年后,我从一位陕北来的干部口中听到,那位瓦窑堡热情为我导游的红军老人,在“横扫一切”中惨遭毒打早已死于非命了。我惊呆了。我苦苦地想,难道新华社记者自认为普普通通的一篇内参,一经人为地拔高,被当作“荣耀”的事情,竟会使得一位红军老人惨遭横祸,早知道这世事阴差阳错到这样的地步,我何苦要写这份内参?后来,粉碎“四人帮”后,虽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力拨乱反正,纠正了那个年代各种荒唐的错误,然而,直到现在,我每回忆起这桩历史,就情不自禁地感到无限的悲哀和不平!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

· 郑 群
刘子健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广东开展了一场土地改革运动。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叶剑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缩小打击面,保护大多数,“团结广大人民”的指导思想,从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发达、民主人士多的特点出发,提出一系列符合广东实际的政策措施。

一、首先提出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以团结广大人民



叶剑英

叶剑英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华侨工作重要性的一位领导人。他出生在侨乡广东梅县,早年曾到南洋当侨工,对华侨的辛酸血泪史有着深切的了解和同情。

1949 年 8 月,叶剑英奉命南下,主政华南。9 月他在江西赣州召开华南分局扩大会议,负责解放广东的二野四兵团、四野十五兵团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研究制定解放广东的方针、政策、作战计划等问题。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关于解放广东的若干问题》的重要报告,他指出:“广东人遭受外族压迫,生活困难,有许多人远涉重洋,到安南、暹罗、缅甸、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以至美洲、澳洲各地去。”这些华侨除了极少数发财致富之外,绝大多数在几重压迫之下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因此,他们对外族的压迫十分仇视,对祖国的解放十分热望,常常不惜将自己血汗所得的微薄工资输献给祖国的革命,孙中山搞革命就得到华侨的很大帮助。”

1950 年初,刚解放的广东各地城乡面临春荒问题。叶剑英为尽快稳定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生活,并为解放海南筹备军需物资,约见泰国华侨领袖蚁美厚,拜托他设法从国外购买和租运 7 万吨大米和其他日用、军需用品等。蚁美厚欣然领命,奔波穗港之间,几经曲折,终于完成任务。这是解放初期叶剑英重视华侨作用的一个范例。接着,叶剑英在华南分局下设立土改小组,研究土改中的华侨土地问题。1950 年 5 月 6 日、7 日召开高干会议;同年 8 月召开华侨工作会议,专门听取华侨问题的汇报并作研究。在此期间,叶剑英主持起草“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先后多次召开华侨座谈会和民主人士座谈会。还派李坚真带工作组深入基层调查。

据土改时调查统计,居住海外的粤籍华侨约为 647 万余人,占全国华侨 1100 万的 60%,占广东总人口 3000 万的 20%,约五个人中有一人

是华侨,加上眷属人数就更多。全国侨汇大部分集中在广东,抗战前,全国每年所得侨汇 3.2 亿元,广东占 2.6 亿元,高达 80%,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这“是广东的特殊情况,这些特殊情况是要估计到的”,“作为解决基本问题的参考”。广东华侨在国内的土地和房屋,大多是其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的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如果征收他们的土地,华侨动的户数相当多,在政治上的损失大,对于今后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国家建设没有好处。因此叶剑英在高干会议中心小组汇报会上说:“最好对华侨土地决定不动,否则土改时会为这个问题花费很多时间,原则不易确定,下面执行时容易有偏向,造成纷乱局面,反而不好。”同年 9 月 12 日,叶剑英在主持制定第三个《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草案)呈报中央的“说明”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广东六百万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他们在国外辛苦工作积剩下来的血汗钱,多在国内农村中购置多少土地,作为家庭生活的保障。他们的少量土地,除用作家属耕种外,往往由于劳动力缺乏,而租给其他农民使用。小量土地出租情形很普遍,他们很担心在土改时其小量土地被分掉。”这里,叶剑英首先提出了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全新观点。这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华侨问题的重要成果,它把华侨绝大多数划在劳动人民的范畴,是团结的对象。这在五十多年前是一勇敢之举。它的意义在于纠正了一些人以为华侨就是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

二、首先提出保护华侨劳动人民小量出租土地的政策思想,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既然华侨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是团结的对象,那么他们的土地就应该受到保护。这样,叶剑英首先提出了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政策思想。在他主持草拟呈报中央第三次修正稿和 1950 年 11 月 2 日经广东省政府第 41 次行政会议通过并予颁布的《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就含有鲜明的保护华侨的特色。

从标题看,是土地处理办法,而没有“财产”两字,这就严格规定了土改处理的范围,限制在

土地方面,而不涉及房屋、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等财产。

从条款看,该办法鲜明地提出保护华侨劳动人民(工人、职员、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的小量出租土地,其每人平均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土地为二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四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亦得酌情予以照顾。条款中还提到华侨中无地或少地的贫苦眷属应分给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计算保留与分给土地时,国外的人口应与国内家庭人口并入计算;严格区别出国前就是地主者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者的界限;保护侨汇;华侨地主的房屋、家具、耕畜、农具、粮食等均保留不动。

该办法符合广东的实际,体现了保护和照顾华侨的精神。如果按照叶剑英提出的办法进行土改,华侨的正当权益就会受到保护。1950 年 11 月 6 日,中央颁布《土地改革中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吸收了叶剑英处理华侨小量出租土地的意见,但在基本内容上有不同。一是不提华侨劳动人民;二是不提保护华侨劳动人民的小量出租土地;三是土改的范围扩大到华侨的财产方面,提出没收地主华侨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房屋原为农民居住的外,其他不动。这就如叶剑英所预料的:“原则不易确定,下面执行时容易有偏向。”但是,叶剑英服从中央。在中央的办法颁布后,他公开宣布以此办法为依据,原广东之办法着即废止。尽管如此,在实际工作中,叶剑英还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为此,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做了许多工作。

(一) 积极稳妥地领导三县土改试点。

1950 年 10 月,华南分局选择兴宁、揭阳、龙川三县作土改试点,由省土委副主任李坚真为团长组成土改工作团。在李坚真率领省土改工作总团去 3 个土改试点县时,叶剑英约李坚真又作了一次谈话。叶帅再三嘱咐:“要不折不扣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团结大多数。广东华侨多,工商业比较发达,要特别注意保护工商业和华侨的利益。”工作团在试点县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贫雇农代表会,使贫雇农成为土改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同时,组织群众诉苦,斗争恶霸。然后划分阶级,没收、征

收和分配土地、财产。即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没收地主放的高利贷。地主其他财产及经营的工商业不动，不追浮财，不挖底财，地主在城市、集镇的房屋以及在农村直接用于工商业的房屋均保留不动。保护了华侨、侨眷的正当权益。三县土改取得重大成绩，废除了



叶剑英(左三)在广州与陶铸(右一)等合影

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民分到土地兴高采烈，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1951年三县粮食比1950年土改前增产，兴宁增产1070万斤，揭阳增产2313万斤，龙川增产20%。《南方日报》1951年3月14日以《揭阳土地改革中侨属得到了保护和照顾》为题，报道了该县在土改中“适当保护和照顾了华侨家属的利益”，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人民政府。该县梅岗区在土改中，3310户侨眷受益或受到照顾的达97.8%。华南分局和叶剑英对三县土改给予了充分肯定。1951年3月，方方代表分局对三县土改进行总结，认为三县土改试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全省土改提供了成功经验。

(二) 严禁追余粮追至海外。

风云骤起，三县土改被批判为“和平土改”，说广东缺乏“农运高潮”，“对农民缺乏感情”，“照顾其他阶级多”。三县土改试点遭到否定。1951年4月，广东全省63个县共1500万人口地区（后增至85个县）铺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一哄而起，进入高潮。叶剑英所忧虑的也是他一直告诫不要重犯的“左”的错误出现了，造成了破坏工商业、伤害华侨、伤害民主人士的严重偏差；在所谓满足群众要求的口号下，无限度的清算，乱捕乱打，追挖底财，追余粮侵犯了侨汇，追至国外，

逼死侨眷，根据侨汇评阶级，等等。中央侨委主任何香凝1952年7月给方方的信说：“不少国外华侨对我土地改革中某些偏差表示不满，对我政策表示怀疑，说农会及村干部过火斗争使用肉刑（据知：台山、开平两县均已发生逼死侨眷现象），罚款和退租押太重，农会管制侨汇，根据侨汇多少来评阶级，划阶级时把小土地出租者划成地主等，……这些偏差现象引起国内侨眷和国外华侨若干的不安和动摇，……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侨眷为了因侨汇而被提升阶级成分，怕斗争，怕征，怕借，因而纷纷写信给国外华侨不要寄钱回来，或少寄，甚至将原款退回，这既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也影响广东几百万侨眷的生活。这些偏差如不及时纠正，对国外华侨的争取、团结、教育工作将有严重影响。”我驻印尼大使馆连发两电报致外交部和中侨委，要求追缴余粮应以国内财产为限。电报称追要侨汇抵偿果实情况颇多，侨情惶惑。恩平一侨眷夫妇怕被追侨汇而一起自缢身亡。全省各地自杀现象严重。

对于追余粮问题，叶剑英、华南分局早已明确禁止追至海外，曾多次发出指示坚决禁止此类行为。但是，1951年下半年，叶剑英、华南分局与中南土委会在追余粮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同年12月，中央侨委党组作出九条指示，不准追至

海外。而中南土委会在复电中,却称除出国前是地主者应严外,有一种出国前虽不是地主,但国内(其)出国后已上升为大地主,国外亦已上升为大资本家者,可依法清算。中南土委会主张对这些人“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中南土委会这一指示与中央侨委党组九条指示不一致,叶剑英和华南分局再次请示中央。中央再次明确表态:“严禁追要海外汇款抵交斗争果实”。华南分局深入贯彻中央指示。

对华侨的另一严重偏差,是大量侵占侨房。全省“动的面积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虽然土改后作了一些处理,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真正重视和认真处理,全省土改错没收华侨房屋,据广东省侨办统计,至1991年底止,全省按政策应清退的农村侨房共1698万平方米,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用于我省落实侨房政策的总拨款已达5.0880亿元,尚未能彻底解决问题。2000年4月全省侨务工作会议称:我省由于过去受“左”的错误影响,侵占侨房现象十分严重。……我省20年来共拨款6亿多元。落实侨房政策面积达2915万平方米。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三) 撰写文章纠正“左”的偏差。

对土改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偏差,叶剑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并不畏风险,竭力纠偏。1951年6月30日,叶剑英在中山纪念堂向省直机关干部作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的报告,他在肯定运动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说:“在重点地区,运动是比较正常而有成绩的。但由于少数领导运动的干部,立场不够正确,政策不易掌握,误以为‘左’就是坚定,打吊就是坚决,要满足群众要求,可以无限度的清算和追究;所谓‘不打不服’。乱捕乱打,单纯追挖底财现象,已有不少地区发生,这是其一;其二,在非重点的面上,由于干部不足,没有干部去领导,以致没有控制。而农民又斗争心急,在少数勇敢分子号召下,闻风而起,三五成群,进行无领导无组织的自发斗争。在这里出现了大村斗小村,大姓斗小姓,强房斗弱房等宗派斗争,乃至违反政策及侵吞果实,贪污浪费;其三,既然斗争可以自发,运动可以不要领导,不要组织,就给反动地主由此找到了可乘之机,起来破坏运动,一面利用我们工作

上的错误,或曲解我们的政策,进行合法破坏;一面利用我们组织上不纯,和管制上的薄弱,进行非法破坏。若将这三方面的情况汇合起来,就在某些地区形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的局面,整个斗争形势表现为复杂化了。领导的困难和工作的缺点,就在这里。”叶剑英接着指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领导者必须善于依靠群众创造力,善于引导群众的自发势力进行正确的斗争。并克服由自发势力所引起的混乱状态,引导自发运动走上土地改革正常的轨道。”要“向干部、群众,交代清楚政策,说明哪些应该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怎样做。把政策界限,加以划清,把工作方法,明白指示。那么,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偏向和错误,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他在讲话中叙述了毛泽东和我党30年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阐明在解放后应该如何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问题,指出:“如果在三十年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斗争中,曾经产生许多缺点,犯过许多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已经被毛主席和党中央纠正过,这对于我们华南来说,就不应该重蹈覆辙。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错误,对领导人,是不能宽恕的。”叶剑英对问题作了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对纠正运动“左”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最大的纠偏,莫过于制止对自己同志和朋友的伤害。时任中央公安部的部长到广州指导“三反”、“五反”工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广东党内有相当一大批坏分子(其中包括贪污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恶霸分子和与敌人始终保持联系的内奸分子)占据着重要工作岗位,“很多反革命分子混入党内”;“广东现有的几万个土改队员,亦有大批的坏分子”。于是大搞“土改整队”、“清理中内层”、“整顿旧基层”、反“地方主义”运动。有人要大开杀戒,以杀人开路,以杀人发动群众。叶剑英、方方再三强调要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反对乱打乱杀。美洲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在家乡开平的侄子司徒程南被指为“地主恶霸”,判处死刑。叶剑英急电“刀下留人!”及时制止了一起错杀事件。叶剑英还保护了蔡廷锴、李章达、莫雄等民主人士免遭伤害。这时,叶剑英已被批判为“土改右倾”,被大会点名对土改“动摇”,被迫多次检讨,他还是竭力保护方方、罗明、曾广等,保护下属。他曾痛心地说:“主帅无能,累

及三军。”主动承担责任,以便让大批干部过关。

三、首先提出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并作了有益的探索

早在1950年3月22日,叶剑英在参加广东省政府召开的广州各工厂厂长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就把华侨资本作为发展工业的一个有利条件。1950年8月11日在华侨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和与会者专门研究了海南种植橡胶与华侨投资问题。会议指出,华侨对投资海南岛种植橡胶树表示很关心,要求到海南实地考察。会议认为,华侨投资,要有明确的条例规定,优待范围与放宽尺度问题,都要解决,华侨才可能投资。叶剑英在会上作了指示,指出:“华侨要归国,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表示欢迎。”有劳动力的华侨回来要介绍职业,有资本的要指导他们投资,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使他们有利可图,安心经营。”这是建国之初最早提出争取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为了做好争取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建设的工
作,团结海内外爱国人士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奋斗,叶剑英选调享有统战工作能手称誉的饶彰风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协助他做好统战工作。同时安排在港澳工商界和海外华侨中有较大影响的邓文钊等民主人士在省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还指示各地专署设立侨务机构,配上编制,专门负责华侨事务。

1950年4月,印度尼西亚有影响的进步华侨、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出过力的巨港橡胶厂的经理薛两清回国观光,到了广州。叶剑英让饶彰风接待他,并亲自请他吃饭,鼓励他说,祖国很需要像他这样的爱国华侨回国投资。给薛两清很大鼓舞。到各地观光后,薛于9月返回印尼。行前,饶彰风对他说,希望他回去组织华侨支援祖国建设。1951年春,薛两清联系王源兴、黄洁、李祝朝、施子卿等华侨朋友各自带着家眷、资产回祖国参加建设。同年2月,在叶剑英重视和支持下,饶彰风推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在广州组织“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工商界人士投资的公私合营企业,由邓文钊任董事长。同年8月,又帮助薛两清、王源兴

等人创办“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华企”和“华建”成立后,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它们与海外的关系,积极参与抗美援朝,为国家抢运物资工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同时为国家争取外汇,稳定物价,开办工厂企业,支援祖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为争取海外华侨投资祖国建设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叶剑英还把华侨看作是垦殖橡胶的重要力量。1951年初,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决定在华南地区建立橡胶生产基地。同年11月,华南垦殖总局在广州成立,叶剑英兼任局长,拉开了规模巨大的垦荒殖胶序幕。叶剑英号召农业大专院校师生和归国华侨加入垦殖队伍。当时回广东定居的华侨中,有不少是从马来亚橡胶生产国归来的,有些原来就是橡胶工人。叶剑英安排有经验的华侨橡胶工人进行技术培训,然后派赴各地橡胶园当技术人员。据统计,南方大学就培训了1200名华侨技术员。叶剑英还多次听取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意见。他向林业工程部的负责人说:“陈嘉庚先生是种橡胶的里手,很有经验,要虚心向他学习。”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海南岛为主的橡胶种植基地基本建立起来,为中国后来的橡胶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华侨政策得到端正和贯彻,使海外华侨重新感觉到党和祖国的温暖,热烈拥护和支援祖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1979年至1998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962亿美元,除了对外借款外,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793.53亿美元,其中华侨、港澳同胞的资金约占80%,建成“三资”企业57665家,还捐资兴办公益事业26615宗,约人民币155亿元,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使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叶剑英的远见卓识。因此,1986年叶剑英逝世时党中央为他致的悼词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郑群: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广东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刘子健:《广东党史》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杨尚昆五次回四川

● 杨汝岱



杨尚昆

编者按：今年8月3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同志诞辰一百周年，谨发此文以兹纪念。

杨尚昆同志是我非常崇敬而又接触较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走上省委领导岗位后，就认识了尚昆同志。除了到北京开会见面外，他先后五次来川视察，我多全程陪同。在接触中我发现这位德高望重、叱咤风云的革命元戎，对人民、对故乡有赤子般的情怀，他思想敏锐、办事果断而又平易近人、豁达幽默。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就像面对自己亲近的长辈和老师，可以畅谈自己的心里话。党的十三大以后，在中央开会的次数多，得到他的鼓励和教诲也比以前多。1993年我到全国政协工作后，同尚昆同志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在纪念尚昆同志百

年诞辰的时候，一些渐行渐远的往事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1986年，是我党我军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与尚昆同志一起战斗的刘伯坚烈士的百年诞辰，烈士纪念碑在刘伯坚同志故乡川北平昌县揭幕，尚昆同志受中央委托出席典礼并讲话。刚过一个多月，又逢朱德同志百年诞辰，尚昆同志不顾道路崎岖，再受中央委托赶到川北仪陇县城，在纪念大会上作了满含深情的讲话，他特别回顾了自己曾长期在朱老总领导下工作，尤其是抗战前期在华北的时候，更是经常同朱德同志见面，亲聆教诲，使自己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接着，我们又陪同杨尚昆和康克清同志，赶到马鞍镇琳琅山麓的朱德旧居和纪念馆，还顺着一架木梯，登上了曾作为朱德卧室的小阁楼，看到总司令少年时用过的条桌、木椅、砚台、桐油灯、竹背篮，见物如见人，尚昆同志的神情庄重而肃穆。今年是朱德同志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我刚去过仪陇琳琅山。朱德旧居和纪念馆已建成红色旅游的4A景区，瞻仰的人群络绎不绝，尚昆同志在朱德旧居园中栽下的桂花树更加枝繁叶茂了。

1987年，是重庆“三·三一”惨案六十周年。杨尚昆同志的四哥、他早年革命的领路人、中共四川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杨闇公同志就是在这次惨案中死于敌人屠刀下的。尚昆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参加了四川省、重庆市隆重举行的纪念大会。革命谊重如山，手足情深似海，凝聚为他在讲话中对烈士、亲人特别深沉的悼念，也饱含着以革命、建设的胜利告慰忠魂的欢欣。会后，我从重庆陪尚昆同志回到他阔别六十年来魂牵梦绕的故乡潼南。他生怕给基层带来接待上的麻烦，回乡时轻车简从，就下榻在县委招待所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普通客房里。杨闇公烈士陵园离城两里，是文革后

迁葬新建的 原来的墓在“文革”中因江青诬蔑“杨尚昆家没有一个好人”而被挖坟砸碑)，小平同志为陵园题额，墓前广场塑立了烈士的雕像。尚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为陵园揭幕，并在园内亲手种植了翠柏。那天晚上，县剧场举办文艺晚会，尚昆同志在傍晚便装徒步穿行街道，走了一里多路来到剧场与民同乐，沿途同乡亲们招手、点头，亲切交谈，体现出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第二天我陪他回到城西 10 公里的双江镇老家。尚昆同志家的旧居当时已相当残破，按照他的意见作为社区“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使用，他对旧居派上了新用场表示欣慰。尚昆同志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满怀深情，故居的每个角落都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见到乡亲们无不问寒问暖，了解家乡的变化和群众的生活，还特别喜欢家乡的饭菜，炒回锅肉、拌侧耳根、泡桂花蒜吃得津津有味。他同基层的同志边吃边聊，听取意见，调查下边的实情。“仰缅先烈，寄望后人。书赠家乡人民”的亲笔题词，表达了尚昆同志此行的万千思绪。

1993 年 9 月，在他响应小平同志关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号召，已经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之后，他再次回到四川，提出要上峨眉山金顶看一看，身边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劝他不要上去，可他壮心不已，坚持要上，我便陪他登上了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顶峰。那天金顶阳光普照，尚昆老人精神焕发，谈笑风生，没有丝毫倦意，还对峨眉山的建设和发展，谈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就在那次回川期间，87 岁的尚昆同志还专门到成都指挥街省人大宿舍，拜望他读成都高师附中时的老师、也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张秀熟同志。尚昆同志一进客厅，就健步上前，握住老人双手，一边大声说：“老师，我看您来啦！”当时张老已 98 岁高龄，耳朵有点背，尚昆同志紧靠他的轮椅坐下，在老人耳边问候起居安康，庆贺老师百岁大寿，祝老师中秋愉快。尚昆同志为张老送上了生日蛋糕、中秋月饼和大幅寿桃国画。两人愉快地谈起成师附中的往事和成都城市的变化。尚昆同志还向张老请教养生诀窍，张老风趣地说，我的窍门就是“抽烟、喝酒、不运动”，心无挂碍，顺其自然。看到这样浓郁温馨的师生情、战友谊，在场的人都深受感染。

尚昆同志非常关心四川的工作，他为四川改革和建设的每一个重大成就而由衷地高兴，也为四川城乡、特别是农村还有许多人没有脱贫而忧心。他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教诲。他说，四川省委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很坚决，纠正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搞活农村经济政策，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四川省委敢于实事求是，在全国第一个取消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对各项改革率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对过去省委工作给予实事求是的充分肯定之后，他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四川是个大省，情况千差万别，领导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四川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注：当时川渝尚未分治），农民是个大头，一定要把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始终作为党政工作的重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稳步地尽快地使全体农民真正脱贫致富。遵循他的教导，在九十年代初有人置疑改革方向的时候，我们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求发展之路，向着富民兴川奔小康的目标不懈地努力。

尚昆同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实践者。当姓社姓资的争论干扰和束缚着人们前进脚步的时候，1992 年初，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尚昆同志陪同视察。我知道这个好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南巡谈话，接着又发了正式文件。尚昆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意义十分重大，针对性很强，你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谈话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要敢于试、敢于闯。要弄清楚小平同志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尚昆同志的点拨，加深了我对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理解，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尚昆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他的远见卓识和赤子情怀令我崇敬和怀念，这种崇敬和怀念将伴随和激励我继续走好今后的人生途程。

（作者为四川省原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杨崇瑞开拓中国妇幼卫生事业

• 夏俊生

几年前，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伟和北京市东四妇产医院的领导在向我介绍东四妇产医院的历史时，送我一本东四妇产医院创办人杨崇瑞的画册。看完画册，杨崇瑞的传奇人生令我感动，总觉得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不应被后人忘记。

如果提起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年龄大一点的中国人都知道。但被林巧稚称为“老师”的杨崇瑞，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杨崇瑞与林巧稚都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都是在北京协和医学堂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高材生，都是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杰出女性，又都是在1983年去世。杨崇瑞比林巧稚大十岁，是我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我国近代妇幼卫生事业的创始人、我国助产教育的开拓者；曾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过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的副组长；是新中国卫生部首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只是由于她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发表了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成了“右派分子”，被打入另册，从此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不为人知。

杨崇瑞墓碑上的几个第一，说明了她在我国乃至世界妇幼卫生事业上的地位：在我国第一位把现代科学的妇幼卫生知识从城市大医院送到农村；第一位提倡新法接生，是全世界率先培训接生婆的人；第一位在我国创办助产教育，办起了示范性的助产学校及附属产院，并把培训的骨干分派到边远落后地区；第一位在30年代即提倡并办起节制生育指导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司司长。

杨崇瑞1891年出生于河北省通县燕郊镇兴都庄（现属河北省三河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就读于北京贝满书院，1917年毕业于协和医学堂，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医学博士。从协和医学堂毕业后，杨崇瑞先到山东德州博士医院任主治医师，1920年进入天津南关下头妇婴医院任主治医师，1921年到协和医院进修后留在医院妇产科。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期间，她在灯市口慈商工厂为女工、孕妇体检和治病，在朝阳门外设立妇产科门诊，还到北京郊区和河北省农村调查妇幼卫生状况，提出了当时产妇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婴儿死亡率为千分之二百的调查数据。

1925年，杨崇瑞获得奖学金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进修，对美国、加拿大和英、法、德等西方许多国家的公共卫生、妇产科及助产教育进行了参观、实习。这使她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业对保障民族健康的重要，特别是西方国家用受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接生与国内由接生婆接生造成的母婴高死亡率形成了鲜明对照，使她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妇幼卫生事业。1927年回国后，她毅然由妇产科转到公共卫生科，任协和医院公共卫生科教授兼国民政府卫生部技术室兼任技正，负责全国的妇婴卫生工作。1928年，她又兼任北平市妇婴保健所所长，建立保婴事务所。保婴事务所的主要任务，是对接生婆和助产士进行监察，对孕妇婴儿进行身体检查，对婴儿保健事业进行宣传，对婴儿的死亡进行统计和对孕妇进行训练，等等。

杨崇瑞认为，要在落后的中国推广新法接生，关键是培养新法接生

人员，最快捷的办法就是对接生婆进行培训。1928年，她在北平办起了我国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培训班），第一批培训30人，平均年龄54岁。她办的接生婆讲习所先后对360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训练，使她们成为新法接生员。据说，其中还有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接生的原皇家接生婆。

为了在中国像西方那样培养经过严格训练的助产士，杨崇瑞到处奔走呼号，终于使当时的国民政府成立了助产教育委员会。1929年1月，正式批准杨崇瑞主持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示范性助产学校——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校附设一所产院，杨崇瑞亲任校长。1929年10月，她租赁灯市口71号民房筹备建校，录取本科生10名，附设招生10名的助产士训练班。12月7日，附设产院设立10张病床，开始收治产妇。1930年8月，杨崇瑞购买了交道口南大街84号被称为“蓉玲公主府”的房产，同时购买了相邻的麒麟碑胡同6号民房，将其改建为三层楼，1931年8月竣工后，这里成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和附属产院的新址，即现在的东四妇产医院。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法接生的妇产医院。

杨崇瑞之所以在麒麟碑胡同旁边开办妇产医院，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这里是当时北京的产婆集中之地，也是“麒麟送子”传说的发源地。

麒麟碑胡同清末称口袋胡同，30年代改为麒麟碑胡同，是个拐了几道弯的200米长的小巷，西口在交道口南大街，南口在今天的平安大街张自忠路，明朝时就已是产婆的聚居之地，居于巷西侧的多为皇家产婆，巷尾则为民间产婆。因明朝大将军仇鸾家住胡同西口，仇府门前立有一个雕着汉白玉麒麟的影壁，麒麟碑胡同由此而来。

传说明朝末年皇帝有个十分疼爱的小女名叫玲儿，16岁时与住在原仇鸾府的恭王相爱，皇帝闻之大怒，将恭王发配统镇边关。玲儿愤而离宫，5年没有音信。后其兄战死边关，玲儿哀其兄回京，但发誓永不回宫。皇帝怜爱女儿，遂将玲儿寝宫迁于麒麟碑胡同恭王府侧，称为蓉玲公主府。玲儿公主独居府中，终身未嫁，但非常喜欢小孩。凡在府前出生之子，必抱其抚爱。久之，京城



杨崇瑞

降子之户，均前往公主府抚典。玲儿遂被民间誉为再世菩萨。麒麟碑胡同的产婆群体不断壮大，麒麟送子之说传遍京城。

东四妇产医院院内立有杨崇瑞的铜像，基座上的“牺牲精神造福人群”八个大字，是杨崇瑞为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题写的校训，也是现在东四妇产医院的院训。杨崇瑞聘请朱章庚、林巧稚、潘光旦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协和医学堂的教授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任教，并对毕业生提出了有独立管理助产学校及产院的工作能力和会骑马、骑自行车以方便下乡、到山区工作等严格的要求。由于第一助产学校教学质量高，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誉，当时被称为北京八大学府之一。在创办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之后，杨崇瑞又创办了南京中央助产学校，并兼任这两个助产学校的校长，1937年她还创建了武汉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分校，抗战后迁至重庆。杨崇瑞为全国各省市选派助产教育人才，对各省市的助产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协助各省市54所公立和私立助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十年间她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教职员中派往各省助产学校任校长、附属产

院院长或教导主任的就有 20 多人,使全国 54 所助产学校都达到了在政府立案的水平,为我国各地培养了第一批妇幼卫生工作者和新法接生人员。据统计,仅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从 1929 年到 1939 年就毕业各种学生 255 人,大多派往各省市公立卫生机关及边远地区服务。

为中国妇婴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杨崇瑞,受到世界同行的尊敬。1937 年初,她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专家,对欧亚各国的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进行考察。11 月,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参加红十字医疗队,组织伤兵医院,从事妇婴保健工作,编写了《妇婴卫生纲要》、《妇婴卫生学》、《简易产科学》等妇婴卫生教材及一套妇婴卫生挂图发行各地。1948 年 10 月,杨崇瑞被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聘为国际妇婴卫生专家,担任了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妇婴卫生组副组长。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和满腔热忱,毅然辞去了她在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有着优厚待遇的职务,于 1949 年 11 月回到祖国,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后改为司长)。在任期间,她主持制订并组织实施了全国妇幼卫生工作的宏伟计划,建立起省有妇幼保健院、地区有妇幼保健所、县有

妇幼保健站的全国妇幼三级保健网,使我国妇幼卫生工作得到全面发展。到 1957 年,全国共培训接生婆、接生员 66 万人,妇幼保健员 9000 多人,助产士由 1949 年的 13000 人增加到 35774 人。新法接生迅速在全国普及,短短几年就基本消灭了严重危害我国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产妇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1955 年和 1949 年相比,北京市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一百一十七下降到千分之四十四点五;产妇死亡率从千分之七下降到千分之零点四。

更令人钦佩的是,早在 30 年代,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的杨崇瑞就预见到我国人口增长的严重性,开始宣传和进行节制生育工作。1933 年,她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达、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雷洁琼 3 人共同发起成立了节制生育咨询部,开展节制生育工作。他们利用《北平晨报》的《人口》副刊,宣传节育,提倡“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她还在东单煤渣胡同 46 号开设了节育咨询门诊。这是北京最早从事计划生育宣传和实行技术指导的实践。1936 年,她和当时同样热心节制生育的林巧稚大夫等邀请美国节制生育的倡导者山额夫人在协和医院礼堂讲学。这一活动,还受到一些国内报纸的攻击,可见当时

提倡节制生育的社会阻力之大。

杨崇瑞创办的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到 1951 年并入北京医学院时,共办本科 33 个班,另有护士特科研究班等许多其他班次。附设产院改为北京医学院附属产院,1957 年由北京市卫生局接管改为东四妇产医院,到 20 世纪末至少有 11 万人在这里降生。

杨崇瑞被打成右派以后,在国内销声匿迹,在世界



杨崇瑞与医务界朋友在一起。左起:严仁英、林巧稚、胡传揆、杨崇瑞、林崧、陈文珍

妇幼卫生界的影响却没有消失，特别是她培训和利用传统接生婆的创举，至今在发展中国家仍有现实意义，得到国际卫生专家的高度评价。1991年9月6日，我国卫生部等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杨崇瑞博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席詹姆斯·格兰特为纪念大会来函说：杨博士“是杰出的初级卫生保健的先驱者之一。她是改造旧接生婆的第一位倡导者。她在二三十年代的工作是后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49年及1950年在中国工作的基础，并为以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改造旧接生婆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詹姆斯·格兰特让人在纪念大会上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肯定杨崇瑞“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和具体行动深深地影响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40多年来的工作。千百万儿童生存下来莫不与此相关，同样重要的是从20年代到30年代，她帮助建立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从50年代到60年代首先在中国群众中使用，又在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会议得到认可。”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每年有一千万婴儿出生，培训现代助产士会需要很多时间。从而在乡村和城镇，应当有效地利用传统的接生婆。她相信，在许多国家被称为接生婆的人是可以培训的，使她们领会接生的关键所在是清洁，处理好脐带，尽早识别难产的征兆，这已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在北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很大的范围内实行了她的想法。194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就包括培训传统的接生员，根据这些成功的经验，她的想法传到其他国家。今年（1991年）6月在墨西哥城第一次培训传统接生员研讨会上，我在致辞的时候就想到：杨博士的这些概念仍然非常重要，甚至在今天，墨西哥30%的接生工作仍然由传统的接生婆承担，但她们没有得到过正规的训练。所以，在墨西哥正在引进一种国家的培训制度，这正是杨博士创立



的。”接生用的产包是杨博士早年创造的，至今仍无很大的改变。”

杨崇瑞这样一个为我国乃至为世界妇幼卫生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世界著名的专家，因为发表了支持马寅初先生节制生育的意见，1958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后，被贬到《中华医学杂志》当编辑，1979年平反后任中央卫生部妇幼司顾问，仍在关心着我国的妇幼卫生事业发展。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恢复助产教育的提案。1983年，杨崇瑞93岁高龄时病逝。

杨崇瑞终生未嫁，生活俭朴，把一生积蓄的6万多元完全献给国家。卫生部妇幼司将她的捐款交给北京医科大学校友会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友分会建立的杨崇瑞基金会，用于奖励妇幼卫生教育、妇幼保健及妇幼保健科学研究等方面有重大成果或突出成绩的人才。

杨崇瑞创立的东四妇产医院，主要业务用房是400多年前明朝木结构的古建筑，目前正在进行整修。北京市东城区卫生局局长王伟说，东四妇产医院所在地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翻建扩建后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旅游参观点，让人民在这里回顾我国妇幼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追思杨崇瑞博士对于我国妇幼卫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正

本刊今年第7期第17页作者介绍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特此更正。

平型关大捷参加者高成贵

• 余春水 •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 80 周年，又是“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 70 周年，也是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取得首战平型关大捷和新四军建军 70 周年纪念日。在这么多重要纪念日到来的前夕，我特地拜访了现已 90 岁高龄的老红军、平型关大捷的参战者、新四军老战士高成贵，倾听高老讲述他征战南北的动人故事。

高成贵，1918 年 6 月生于陕北延川县一户贫苦农家。1935 年 8 月参加刘志丹领导的红军，1936 年 7 月入党。1935 年 9 月，高老所在的陕北红军与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红 25 军胜利会师，9 月 18 日两军合编为红 15 军团。新组建的红 15 军团为粉碎敌军对陕北根据地“围剿”，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来，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指挥下，先后进行了劳山歼灭战、榆林桥战斗。11 月初，红 15 军团与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中央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参加了具有奠基礼意义的直罗镇战役。

东渡黄河 进军山西

1936 年 1 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2 月 17 日发布《东征宣言》，旋即东进，讨伐山西军阀阎锡山。



高成贵 1953 年在朝鲜

高成贵所在的 15 军团 75 师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当时，天气寒冷，还下着小雪，有的战士光脚行军。虽然红军将士缺吃少穿，武器简陋，条件艰苦，但作战勇敢，过了黄河，第一仗就是直捣义牒镇，在缴获敌人的物资中高老还分到了一床棉被。我军打石楼，转战晋西北，一路长驱直进，重创敌军，威逼太原，给土皇帝阎锡山以沉重打击。迫使阎锡山撤回犯陕之师，从而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并使我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补充。而我军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深受高成贵爱戴的著名红军将领、副军团长刘志丹，75 师参

谋长毕士弟等优秀指战员，就是在东征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

5 月上旬，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以实际行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中央军委决定东征军回师陕北。高成贵随部队西渡黄河回到陕北。

西征会宁 三军会师

5 月 19 日，红 15 军团，奉命出师西征，此时，高成贵已调入 73 师交通队当战士。他们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越长城，进抵绥远边境宁条梁。这是沙漠地带，刮风沙子满天飞，高成贵他们头天挖好的工事，第二天就被沙埋上了。

吃饭也弄得满嘴是沙！高老说他们 73 师夜袭小板桥镇，因敌固守，一时难以攻克。军团首长派刘华清等冒险前去与敌谈判，取得了成功：我军撤回，敌人打开城门迎进我军，并送了一些我军急需的大米和布匹。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表扬。

西征中，兄弟师攻城略地，进展顺利。6 月中旬，73 师趁 75 师围攻预旺城之时，继续向西发展，6 月 12 日攻克宁夏同心城，14 日克王家团寨，21 日进驻七营，继之又包围了杨郎镇，威逼固原县城。我军一系列战斗行动，震撼了陕甘边境之敌。

8 月，15 军团，从宁夏固原县黑城镇出发，经海原向甘肃打拉池挺进。15 军团骑兵团奉命奔袭会宁城，经 36 小时长途疾进，歼敌 400 余人，一举攻克会宁城。高老所在的 73 师担任前卫，勇猛前进，歼敌一个团，扫清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道路障碍。10 月 10 日，历经千难险阻，转战万里的红一方面军（含先期到达的红 25 军）、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激动得鼓掌欢呼，握手拥抱，互相交换着自织的毛衣、袜子、毛手套等小礼品，场面热烈、伟大、震撼人心。高成贵参加了在县城孔庙召开的三军会师的联欢大会。会上，来迎接二、四方面军的陈赓师长，代表红一方面军致欢迎词，然后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的贺电。这是高成贵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见到敬爱的总司令，心情非常兴奋。他说：

“那时，朱总司令年已半百了，又经万里征程的艰苦磨难，显得有些消瘦，但却毫无倦容，依然精神矍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赢得了热烈掌声。我们在会宁住了两晚上，又奔向攻

打山城堡的新战场。”

访谈中，我请高老谈谈当红军时，对什么的印象最深？“苦，很苦！”老人脱口而出。他说整天行军打仗，敌强我弱，与敌周旋，整天跑路，敌人严密封锁，使我们缺吃少穿，冷饿交加，真的累得不行！供给极端困难，群众苦，部队也是好苦好苦啊！

出师抗日 首战平型关

集思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国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忆旧事，眺望燕北几度秋。

这是聂荣臻元帅在 86 岁高龄写的一首《忆平型关大捷》诗句。晚年的高老，每每读到聂帅这首感人的诗篇时就非常激动，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亲历平型关战斗的惨烈场面上去了：那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迎来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1937 年 7 月 7 日日寇蓄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7 月 20 日，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红 15 军团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15 师 344 旅，旅长是老军团长徐海东。8 月 24 日部队在师长林彪指挥下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为了配合第二战区国民党军作战阻滞日军攻势，八路军总部于 9 月中旬命令 115 师进至平型关以



高老夫妇近影（中、右）

西一带。高老说,他永远忘不了平型关战斗:“当时,我在344旅687团交通队任班长。(那时的交通队即后来的警卫连,由警卫、通信、电话三个排组成。)平型关,是山西灵丘到太原的必经之地,地形险要。两边高山陡峭,公路在山底下,路窄,有一二十里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大口袋,敌人钻入这个口袋,就是插上翅膀也是难以逃遁的。师首长决定利用有利地形采用‘拦头、斩腰、断尾’的战法痛歼疯狂不可一世的日军。我们早早地埋伏在两边的高地里,25日晨,骄横的鬼子和大批辎重车辆长达一二里,由东向西大摇大摆而来,7时许,全部进入我师设伏地域。我团的主要任务是‘断尾’,在拐弯处将敌退路切断,鬼子的第一辆车掉进了沟里,后面的就一个跟着一个撞上去了,我们在上面迅速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日军一下子给打蒙了。但鬼子很快就清醒了,拼死往上冲。他们装备精良,又都是武士道的死硬分子,很顽强狡猾,枪法也很准,有的躲起来了,拒不缴枪,我们就扔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横尸荒野。我还亲手打死了三个鬼子,激战中,我连也伤亡了十几个人,我的手也被弹片擦伤了,后来,我还领到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残废证,现在还留有疤痕呢!经过反复拼杀,血染山河,我们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之师1000多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车马等军用物资。平型关的巨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沉重打击了鬼子兵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声威。我能参加这次举世闻名的战斗,感到光荣和自豪。”

第二故乡 安度晚年

高成贵,1940年随八路军115师从太行山南下山东,几经辗转来到苏北,编入黄克诚任师长的新四军3师。后因战争形势发展需要,3师指战员开赴东北,高成贵等少数人作为骨干留在新四军,继续坚持抗击日寇的武装斗争。1945年10月4日高成贵与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俊俏安徽姑娘孙素相识、相知、相爱,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患难相随,喜结百年之好。1948年高成贵调入华东野战军第24军,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干部部部长等职,在皮定均等首长指挥

下,历经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渡江和抗美援朝等重大战役的生死考验。1957年高老调来安徽,任省军区干部部部长、省武警总队政委、南京军区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等职,从此,他在第二故乡安徽生活、工作达半个世纪,与安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工作勤勉,把一腔心血倾注到军事发展和支援安徽的地方建设之中。1982年8月从省军区顾问(正军职)岗位离休。

高老人离休了,思想却没有离休。他与风雨同行62个春秋的孙素老人,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注老少边穷地区的进步与发展,向灾区和贫困地区捐助钱物。同时,他还热心公益活动,担任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等多种荣誉职务,并经常应邀参加重要的纪念会、座谈会,接受采访、提供战斗纪实资料……他家订阅了《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作家文摘》、《将帅名录》、《党史博览》等多种报刊和党史、军史资料,每天孜孜不倦地坚持学习,与时俱进,保持着一个老革命者的高风亮节。2002年,为建设川陕红军纪念碑,二老捐款2000多元;2003年回陕北探亲时,他们又给县委捐了2000多元。

采访结束了,我起身告辞,腿脚不便、走路蹒跚的高老拄着拐棍执意要把我送出家门,送出庭院。站在路边,老人拉着我的手,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当红军时,自己还只是一名普通战士,服从命令,不怕牺牲,奋勇冲杀,其它情况了解甚少,加之事隔70多年,许多细节淡忘,所谈虽是亲身经历,但都是粗线条的,很对不住你啊……看到慈祥的老前辈对采访这样的认真负责,使我很为之动容。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作者更正

对《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我写的《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一文若干更正,谨向读者致歉。第73页右栏倒数第4行“1986年”应是1981年;第74页左栏第6行“童鹤”应是“童鸽”;第74页左栏第15行“1月23日”应是“1月25日”(说明:此时间是根据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第711页第4行抄录的);第74页右栏倒数18行“童竹君”应是“董竹君”;第75页左栏倒数第3行“童鹤”应是“童鸽”。

罗国璋

李宗仁在老河口

● 朱 芒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他统率的战区部队，在极为复杂、严峻的局面中，经襄樊抵达老河口。

日军为巩固对武汉的占领，力图以武力与“谋略”分化、瓦解国共抗日力量，“覆灭”敌后新四军和正面战场部队。国民党五中全会作出积极反共的决定，同时对李宗仁、桂军及其它杂牌军监视掣肘吞并；后方贫困，民不聊生，面对十分艰难的处境，李宗仁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基本坚持了他自己提出的“先国难而后私仇”与日寇“焦土抗战”不为瓦全、打败侵略者，收复大好河山的爱国主义思想。

日军占领武汉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力主“西进”，中路经随县、枣阳、襄樊、老河口，由陕入川，直逼重庆。五战区部队（包括新四军五师）是时辖有18个军43个步兵师，部署于武汉外围鄂中、鄂西北大洪山、桐柏山、随、枣、襄樊、老河口和南阳。日军无论是巩固其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还是继续“西进”，五战区部队首当其冲为其严重障碍。而襄东的得失，对全国正面战场战局影响重大。1939年5月，日军纠集第3、13、16师团10万之众，妄图在襄东一举“覆灭”五战区部队主力。李宗仁作了相应部署。战役展开于大洪、桐柏、随、枣数百里的广阔地区，战斗十分激烈。史志记载：“174师在随县与敌激战于襄花公路沿线，日军充分施展机械化优势，坦克开路，轻重机枪排射，中国军队既无平射炮，又无穿甲弹，敌人坦克所过之处，状况惨烈。174师牺牲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74师与敌拼杀急需友军呼应支援，而拥有10万之众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汤恩伯军团却与敌稍一接触，即擅自放弃阵地，从随阳店一带后撤至南阳，致使李宗仁的全面部署敞开大口，日军无所顾忌地长驱直入，形

势急转直下。此时，李宗仁又接到重庆统帅部的“电令”，“一、令孙连仲部以主力推进至新野、邓县，协调汤军掩护汉中；二，汤集团军尔后可以南阳为后方，联系孙连仲部掩护京西公路；三，张自忠尔后准备以南漳附近山地为游击根据地，孙震部担任襄樊方面之游击。”

李宗仁如执行这个命令，将放弃襄东全部地区，不仅部队、群众伤亡惨重，而且因随、枣、襄樊、老河口被日军攻占，敌人可以东保平汉铁路交通，巩固对武汉三镇的占领，北控信阳，与华北日军相呼应，南掩汉宜公路侧翼，西扼川陕咽喉，形成纵横鄂豫、威逼川陕之势。是时，日军主力已对大洪、桐柏五战区主力构成包围。

在此紧要关头，李宗仁果断严令汤恩伯自豫西南下投入战斗，同时命令原部署的39军、13军夹击随枣公路之敌，以纵队变横队对敌形成反包围，向日军发起攻击。1939年5月15日，五战区全线反攻，辽阔的鄂西北战场，狂风怒吼，黄沙蔽日，遍地烽火，敌我尸横沟渠。李宗仁指挥的随枣之战，如襄樊史志所评：“是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敌后作战、人民群众配合作战的一次全面抗战，给嚣张一时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

在此后的枣宜会战、豫南会战、鄂北会战等战役中，李宗仁坚持背水安营，在老河口坐镇指挥。在华北日军骑兵窜至距老河口50华里的孟楼镇、老河口市民惶惶不安之时，李宗仁则悠闲地带着养子李志圣骑在马上逛逛街；他在田埂观察敌机轰炸，参谋刚把他拖向掩体，炸弹在距他所站田埂不足百米的地方爆炸，他镇定自若，还在询问老河口机场扩建问题；1942年五战区军队反攻日军据点随县擂鼓墩，李宗仁由老河口奔



1965年的李宗仁

赴前线，偕 22 集团军总司令孙震、127 师师长陈离，在可以清晰听到枪炮声的一个师的火线指挥所督战。“……战斗在向白热化发展，李宗仁房内电话铃响声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官兵们因为李长官和孙总司令亲临前线，战斗情绪非常高昂，……李宗仁拿起话筒，通讯兵同时接通总部、军、师部电话，李宗仁下达命令，孙震复述：正面进攻打得很好……全力阻击随县城内增援之敌，争取时间，一举而歼灭之……战斗胜利结束，李宗仁舒展了严肃的面孔。在鄂西北老河口 6 个年头中，李宗仁统率五战区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战斗在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的共同对日作战中保卫了大片国土，使人民免遭日寇蹂躏。

1939 年，在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军民共御日寇最关键的时候，蒋介石却数次派代表在香港、澳门与日本政府代表秘密和谈。1939 年 1 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剿共”的符合于日寇诱降和反共的决定，制订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同时向五战区派遣了集“三工”——党工、政工、特工于一身的军统、中统特务张元良和特务机构，多次电令李宗仁“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立即撤走，否则第五战区当以

武力解决”。还下达了“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和“江北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的命令，任命李宗仁为华中剿共最高总司令。同时，蒋介石默许了山东沈鸿烈提出的“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的反共口号，在各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之际，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及后方机关，惨杀工作人员和亲属。一直支持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遭到反共派的多次袭击。蒋介石极力要把李宗仁推向反共最前线，然而，两人当时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蒋是“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李则是“先国难而后私仇”。李宗仁清楚地知道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支援友军的重大意义，在随枣、枣宜及其它战役、战斗中，新四军五师李先念司令员率部横渡汉水，分兵两路，攻大洪山，破北兆山，威震武汉，武汉日军被迫戒严 3 天。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方武装如鄂北抗日游击队等，在不同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从敌后、敌侧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牵制、削弱日军的进攻力量。日军档案资料中评述新四军：“这支出没无常的游击军，是对皇军的极大威胁”，李宗仁的部下 125 师师长陈仕浚记述：“如果不是新四军从敌后牵制，削弱了日军大量兵力，拖住敌人，现在正面战场形势更为严峻。”几次战役中日军不敢深入，正是惧怕新四军从大洪、桐柏、大别群山地区出击，直插日军在华中的指挥中心武汉。诚如李宗仁说“抗战像一道箍，把国共两党紧紧箍在一起。”

1940 年，中共华中友军工作部部长项乃光叛变，向李宗仁一股脑儿把在五战区军队和地方共产党员及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军队将领和地方人士向李密报。其实，此前李宗仁对战区共产党的情况，如他的机要秘书尹冰彦所说已“了如指掌”。李宗仁对在抗战中有赫赫战功的 77 军副军长何基沣、127 师师长陈离、副军长刘汝珍等“不捕不杀”。重庆电李宗仁追查何基沣“通共”，并不顾当时正在枣宜之战前夕，将何押解重庆严厉审讯。战事开始，李宗仁异常焦急，电蒋把何放回。蒋不准。当战役进行激烈，张自忠将军率部与日军奋力拼杀期间，李再电蒋放回何基沣，蒋仍不准，直至张自忠将军牺牲。李宗仁长叹“如果何基沣在，不会有襄河之败，张自忠将军不致于牺牲。”127 师师长陈离与陶铸、李先念“关系密

切”，陈向新四军五师赠送子弹、电台、棉背心等，支援五师抗日。中共鄂西北地下组织交通员邱东泉在老河口一次空袭中，丢失了200多名党员的名单，经战区调查室中校科长庞郁生经办，李宗仁将名单交中共鄂西北党组织负责人王翰。对著名的共产党人钱俊瑞、胡绳、曹荻秋、张佐华等，李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予以安排，将钱俊瑞安排在战区干部训练团任政治总教官，张佐华也被安排到干训团；对进步文化人臧克家等“礼送出境”。李宗仁司令部参议刘仲华是中共党员，李宗仁常与刘促膝交谈；由延安派到老河口的使者面见李宗仁，由当时在老河口作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马识途接应也受到李的礼遇。故而，当李宗仁五战区向蒋介石所作的“剿共报告”中说到“一年间桂军第7、第8、第84军及游击部队，共发动剿共作战124次，伤亡俘获共军6700多人”时，蒋介石不予深信。

据日本陆军省军务科石井秩大佐的记叙，日军大本营一直认为“支那国共合作是抗日的最大力量……”必须瓦解这个联合。“陆军中央部看到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痛感有必要进行‘桐工作’和‘和知工作’，其它谋略可以缓行”。这两项“工作”，是日本离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对蒋介石、李宗仁诱降，分化瓦解的“谋略”计划。其中“和知工作”是日军第十一军特务机关针对第五战区的。其核心内容是“对五战区的敌军，置重点于策动广西、四川军的反叛，借此使战区走向崩溃；其次，如能对该战区的中央军及旁系军加以影响，也要不失时机进行工作……引导其丧失战斗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在日本军国政府的谋略下，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仅在1943年以前，就有20多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个国民党将领投敌。

面对日寇的分化、诱降谋略，李宗仁态度鲜明。1939年1月，“李宗仁、白崇禧电请国民党中央明令通缉汪精卫”。3月，上海《申报》发表了李宗仁亲笔题字：“……日军阙不思悔改其侵略之计，必自掘坟墓，凡我国民，只宜团结一致，有中途徘徊妄想妥协求和者，即是甘心屈辱投敌，中国人皆得而诛之……”

对受中央军排挤并随时有可能被推上“剿共”和对日作战前线而被消灭掉的杂牌军队将

领，李宗仁总是以情，理，晓以民族大义，并给予必要的帮助。对于深受委屈的张自忠，李宗仁更是充满了理解、同情和尊重。张自忠见李宗仁时，李“对张握手让座，温言抚慰，亲如家人”。张更是早闻李为抗日的“热血将军”，当年曾与蒋平起平坐，如今为了抗日而甘作蒋下属一个战区司令，内心甚为敬佩。张说：“像这样的好长官，今后我必矢志矢勇，报国报效知己、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后来张自忠壮烈牺牲，李宗仁“哀痛特甚，为之食不甘味者累日”，挥笔题写了“民族之光”四个大字刊载于战区《阵中日报》上，正如他对川军将领邓锡侯、孙震所谈：“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诸位和我都在中国内战中打了20多年，回想起来，也大无意义，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现在总算时机到了，我们各省军人，停止内战，大家共同杀敌报国。我们都是内战炮火中余生，幸而未死，今后如能死在救国战争里，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从今以后，大家一致和敌人拼命。”

为巩固后方，增强国民抗战意志，李宗仁积极支持在司令部驻地老河口周边地区办工厂、建学校，并严令少将警备司令苏新民（后为梁家齐）严肃军纪，认真治理，禁烟禁赌，“军民人等一律执行”。苏新民坚决执行李的命令，与违令赌博的司令部将领黄建平、地头蛇兰震甲等，都曾直接对面交锋，李宗仁本人也婉言规劝部队中有吸鸦片恶习的将领戒掉烟毒。为筹建“平民医院”，李宗仁带头捐款，又把自己的随身保健医生孙荫坤调到这个医院任职。在战争年月，“平民医院”治愈了无数伤、病军民，仙人渡一位雷姓农民的大腿被日机炸成重伤，曾在这个医院免费住院一个多月，直至伤愈出院。

在老河口，人们至今仍记得另一桩事：美国14航空队P47机队人员，在机场旁调戏光化中学一女学生，该女生吓得掉进一条深沟里，伤势严重，李宗仁闻讯后十分气愤，他召来美国P47机队负责人加以申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后由中美双方联合组织军事法庭，调查审讯，最后裁定：将肇事人员开除军籍，十日内由美方押送回国。P47队负责人向光化中学道歉，送受伤学生进医院治疗。中美“备忘录”四份，副本由中国政府寄送美国军部，一份寄美军在华总部查照。

当时，五战区境内有两股著（下转第51页）

高端权力介入与中国心理学沉浮

• 薛攀皋

权力可以促进科学发展,也可以阻滞科学进步。然而,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却不会听命于权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曲折坎坷,它与遗传学同命运也曾被取消过。不同的是,遗传学被禁止是20世纪50年代初照搬苏联政治干预科学酿就的苦果;而心理学的灭顶,却是在1956年总结教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重蹈遗传学的覆辙。

(一)心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虽然古代中外的哲学著作中都已心理学问题的论述,然而心理学从哲学思辨中独立出来成为科学的心理学,却是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它仅有70年历史。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更短,迟至1917年才有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北京大学)。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心理活动是人脑对客观世界事物的反映,是人脑的高级机能,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因而心理学既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偏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偏于自然科学,又有人认为它是中间科学或中介科学。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动物心理和人类意识,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阶级性、个性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研究方法问题,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方向等等,同样有不同认识。对年轻的心理学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国家高层的主管机构、官员或关心科学的高端政要,能否理性地面对心理学界的实际情况并处理有关问题,对心理学发展影响至巨。

(二)从新中国建立起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发生的事关中国心理学的荣辱、起落、浮沉,都同高端权力的介入有关。

1. 1952年,陆定一和文委科学卫生处全面干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领导并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委)指导。中宣部科学处和文委科学卫生处具体联系中国科学院。这两个处是一套人员对外挂两块牌子。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简称心理所)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所长曹日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9年就自觉运用并倡导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工作。1951年底心理所向文委呈报1952年度的研究工作计划,1952年1月8日,科学卫生处提出了书面意见(简称“意见”);四天后,中宣部长、文委副主任陆定一(主任为郭沫若)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谈话(简称“谈话”)。“意见”和“谈话”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大背景下,给心理学贴上政治标签,认为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心理学是先进的,而西方国家的心理学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都应予以批判。科学卫生处强调:“中国心理学本身没有基础,却又承继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心理学的影响,体系庞杂。”因此,心理所的“基本任务”、“中心任务”应致力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建设工作,为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而斗争,研究苏联心理学的成就应用于中国,反驳各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说。陆定一指示:心理所应该揭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心理学的大旗,明确表示拥护和反对什么心理学

说。陆定一和科学卫生处指责心理所的工作计划看不到有上述的意图,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科学卫生处对该所的研究计划,从内容、目的到方法,一一予以否定。陆定一指出除心理卫生组可以按原计划工作外,其他劳动心理、儿童心理、教育心理、实验心理等研究组的计划,都得重新制订。

心理所召开了全所研究人员会议,讨论“谈话”、“意见”和修订计划问题,并写出了报告。报告出于对高端领导的尊重和礼貌,虽然表示基本上同意“谈话”与“意见”,但坦陈有些意见提得“相当草率”、“有些片面”。报告对研究工作计划,除个别因人力暂停外,都是“继续原来的研究”或“照原计划进行”。对陆定一责成该所到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心理学,报告没有作出承诺,只提出由资料组收集散见各刊物的文章,请所内人员审阅并在所里具体批判。

高端领导对基层单位的科学研究工作管得如此之宽、之细,实属罕见。他们的意见提得并不在理,自然难以令心理所研究人员心服。以曹日昌指导的“小学儿童犯规问题的研究”为例,该课题拟调查统计北京市若干所小学儿童犯规的事实,分析其与儿童年龄、性别、年级、智力、成绩、家庭、学校环境的关系。科学卫生处认为用这些方法“是得不出什么结果、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指责为什么不像苏联马卡连柯那样把集体生活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改造“问题儿童”的基本方法。笔者当年就此请教过首都的教育学家。他们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大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和违法少年儿童出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马卡连柯通过组织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收容这些“问题儿童”过集体生活,让他们接受道德品质教育,使一批批“问题儿童”被教育改造成为有道德有文化的苏联公民。马卡连柯所教育的“问题儿童”同心理所要研究的“问题儿童”毕竟性质不同。要说研究儿童犯规问题只能用马卡连柯的方法与经验,未免失之武断与偏颇。“意见”里有许多这一类的事例。

195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既是文委科学卫生处又是中宣部科学处的副处长赵沅起草的《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斗争》号召全国生物学界发起一个广泛深入的

学习运动,学习苏联米丘林生物科学,彻底批判摩尔根主义,改造中国生物科学的各个部门。从而在我国,首开以党政手段支持一个学派、禁止另一个学派的先河,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在全国被迫停止,中国遗传学遭到浩劫,直到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简称“双百”方针)时才得到纠正。因此,心理所不唯上,以自己的方式抵制陆定一和科学卫生处的欠妥指示,坚持做应该做的工作,陆定一等也未追究,从而使中国心理学当时避免了同遗传学一起被禁止的厄运。

2. 1956年,中宣部提出并经周恩来同意:心理所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党组不必先行对此做出决定。

1956年5月“双百”方针问世,明确公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和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反对用行政手段进行干涉。

195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室(1953年心理所因故改组)同南京大学心理学系(1955年高等教育部决定停办该系)合并组建新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仍简称心理所)向中央报告。报告称:心理所建成后,它的任务是“在我国建立唯物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展开关于心理活动的物质本体、心理的发生与发展、基本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等方面的研究。并与有关业务部门合作开展教育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劳动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的应用研究。”6月19日,中宣部在向邓小平的报告中,除同意中国科学院建立心理学所外,并提出:“心理学对象、任务与研究方法,是世界科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因此,心理学研究所成立后的任务,应该由心理学家来讨论,科学院党组可以不必先对此做出决定。”7月8日,总理周恩来签署:“同意中宣部意见,退中宣部办。”中宣部的正确意见,可以说是“双百”方针在心理学的具体体现。

8月18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所。随后,中央任命心理学家潘菽和曹日昌、丁瓚为该所所长、副所长。扩建后的心理研究所,研究技术队伍壮大了,该所与中国心理学会的领导力量也得到加强。心理学工作者沿着自主编制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十五年规划》和国家十

二年科学规划中的《心理学学科规划》，开展研究工作，中国心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呈现蓬勃生机与繁荣景象。

3. 1958年，历史出现倒退，康生与中宣部负责人发动批判心理学运动。

1958年6、7月间，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借“教育革命”之机，与中宣部负责人策划一场波及全国的心理学批判运动。他们说建国以来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尤其是社会科学教材，基本上都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如果苏联变修了，应从何入手批判？康生提出，苏联的教育学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是不是先批判教育学。中宣部负责人说：我们引进的凯洛夫教育学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如果批判，不就乱了吗？他建议批判心理学。于是康生决定：就批心理学吧！康生还定调说：心理学是党性的阶级分析的社会科学。7月初，中宣部将批判心理学的任务迅速下达给北京师范大学，康生是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意思是这把批判之火先从北师大点燃，再烧遍全国。7月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教研室两条道路斗争运动开始，教授彭飞、朱智贤和全体讲师受到批判围攻。北师大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很快跨越校园扩及北京、天津，乃至全国心理学界。仅8月中，北师大就连续召开了三次千人以上的批判大会，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都成为批判对象。《光明日报》推波助澜，在两个月内刊发了40篇批判文章和批判运动的详细报道。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以惊人速度出版了北师大编的两集《心理学批判文集》。

心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应该批评，如有人用生理现象去解释一切心理现象等等。但是批判运动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盖全，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心理学。用动物实验，斥之为生物学化；研究心理现象与大脑活动的关系，被斥之为生理决定论。他们认为不应该从进化史上研究意识起源问题，不该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他们主张人只有阶级心理，没有共同的心理活动规律；阶级分析方法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方法。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论证康生的论断：心理学完全是一门社会科学；心理学的任务只能是研究“工人阶级的心理”与“共产主义的精神面貌”。

原本是学术性质的问题，被肆意作为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心理学被贴上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伪科学”，而这场批判运动是“心理学领域中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受批判者被指责为“举资产阶级白旗”的“反动资产阶级专家”，被剥夺了反批评反批判的权利；反对批判运动的干部和党员，被说是犯了“立场错误”，或被责令检查，或被罢官，有的被取消党员资格。全国心理学的教学与科研的正常秩序被打乱了，也造成了心理学界主要是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思想混乱。

这场批判运动延续到1959年初全国工作会议召开前才停止。然而，在心理学界以及有些部门全盘否定心理学的思潮并没有及时受到触动，就为“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被取消埋下了祸根。迟至1978年4月13日，教育部应广大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的强烈要求，委托副部长张承先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宣布：1958年的心理学批判运动，把心理学打成“伪科学”，把一些心理学家当作“白旗”拔，由此批判了一些同志，这些做法完全是错误的。那次批判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彻底平反，并为受批判和牵连的同志恢复名誉。

4. 1958年底，周恩来批评在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胡乔木认为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当坚持真理采取攻势。

1958年12月28日，周恩来召集主管意识形态，包括宣传、教育等部门负责人陆定一、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杨秀峰、张子意等到西华厅开会，研究、分析各有关部门在“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批评了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作法，并指出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

1959年1月，中宣部根据周恩来指示，由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多次召开会议，检查党组在1958年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胡乔木认为1958年以来的各种批判运动中，以对心理学的批判最不讲理。1959年3月13日、21日，胡乔木在分别听取中国科学院心理所所长潘菽和副所长曹日昌、尚山羽，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人员汇报心理学工作时说：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心理、意识。意识的形成有生物学的基础，

也有社会的制约，说它只有阶级性是错误的。人是有共同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基础，要靠这些研究成果，彻底战胜唯心主义。动物心理也要研究，把人当作动物和认为人与动物毫不相干，都是错误的。排除实验，心理学怎么进行研究？心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郭沫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酒会，招待出席全国科学规划会议的科学工作者

理学不能解决阶级性的问题，任务要提得恰当，把不是心理学的任务加在心理学上，不是发展心理学而是消灭心理学。所谓共产主义的心理学是空谈，是回避科学研究。表面上对心理学要求很高，实际上是取消心理学。胡乔木认为心理学家在批判中应该坚持正确的意见，采取攻势。学术讨论要说服人，现在应当把复杂的问题一一提出来，大家研究一一答复，多写文章，进行宣传。

康生和中宣部负责人发动批判心理学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还得由被批判的心理学家们出来收拾。1959年3月31日，心理所邀请北京有关单位的心理学工作者80余人座谈；同年5月11日至16日，心理所会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单位举办学术报告讨论会，与会心理学工作者400多人。座谈会和学术报告会针对1958年批判运动给心理学界造成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问题，诸如心理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进行了讨论。会议在有些问题上有了基本一致的看法，如多数人同意心理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分为无产阶级的心理学和资产阶级的心理学等。有些问题还有较大分歧，如心理学的任务等。对依然有分歧意见的问题，中国心理学会副会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曹日昌在总结发言中说，在科学研究中同一的研究对象或问题，常常有观点不同的科学工作者，从不同的角

度或不同的侧重点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心理学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这是可喜的现象。有不同意见的心理学工作者都应该各抒己见，争鸣辩论，坚持真理，虚心学习，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展开友谊竞赛。他呼吁：心理学的任务重，研究的问题复杂，必须多路进军，由有关单位协力进行。各单位可按其业务性质与特点，安排重点工作。与此同时，有关报刊也发表心理学家的文章，对有分歧的问题继续深入讨论和争鸣。心理所与中国心理学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共同主持制订新的研究规划，为心理学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研究领域和技术方法方面，心理学工作者对信息论、控制论、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模拟等给予密切关注。对国外心理学的学习介绍，从以往只注意苏联，扩展到欧、美、日等国先进成果与经验；并从以往单篇论文翻译过渡到综合评价。因为研究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宽松，中国心理学重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5、1965年10月姚文元向心理学发难，“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学遭受灭顶之灾。

姚文元于1965年10月28日在《光明日报》化名“葛铭人”（“革命人”的谐音）发表《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的方向吗》（以下简称姚文）。两周后的11月10日，他在《文汇报》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他左右开弓,前者,成为中国心理学被取消的前奏;后者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早在 1959 年 4 月 20 日在《新闻周报》发表过《外行读报谈“心理”》,批判心理学家谢循初关于人的心理并不都有阶级性的观点。这一次他借批判心理学家陈立关于儿童抽象概括能力发展的实验报告《色、形爱好差异》,老调重谈,武断地认为阶级性是心理学研究的唯一对象,阶级分析是心理学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心理学不研究人的阶级性,而去研究心理发生发展的共同规律,就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心理学”、“伪科学”。姚文元说:“世界上劳动人民热爱红色,而那么一小撮人有一种奇特的心理,见红恐惧,谈红色变,于是对红色深恶痛绝。劳动人民一见红花、红旗,便感觉美丽、激动、愉快。这是否‘涉及阶级利益’,恐怕不能说没有关系。”姚文元大概不知道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国旗中起码三分之二以上都带有红色,而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却是五花八门的。

姚文元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干部,还算不上是高官,因为批判《海瑞罢官》有功,身价百倍飙升,1966 年 5 月 28 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因而,他对心理学的全盘否定更具煽动性。中国心理学界和心理所的造反派都以姚文元文章为标准划线,认为对姚文元文章“是拥护还是反对,反映出心理学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心理研究所的三位副所长曹日昌、丁瓚和尚山羽全都以有病之身受批斗迫害辞世。驻心理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心理所革命委员共同编制的心理所体制改革方案声称:姚文元文章“提出了心理学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击中了要害。在心理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批判已经势不可挡。”《方案》诬蔑说:“资产阶级心理学”从 20 世纪初开始从欧美传播到中国,一直是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的;解放十七年来,“心理所的领导权长期掌握在叛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手中”,“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贯穿在我所的全部工作中”。对心理所首选的处理方案是撤销“这一机构,全所人员下放劳动”。在未获上级批准的情况下,驻中国科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

队和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无视心理所职工的强烈反对,抢先行动于 1969 年 6 月撤销心理所,把该所大部分研究技术人员下放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学校劳动。不久,高等学校的心理学课程停开,不少心理学工作者被迫改行。心理学在中国遭到空前浩劫。由于心理学工作者不断抗争,在上级干预下,1973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革委会承认当年撤销心理所、北京植物园等“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是轻率的、错误的决定”,通知恢复组建心理所。1977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批准重建心理研究所。

6.1975 年,胡耀邦说,心理所的方向任务要你们自己提出意见。

1975 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邓小平复出主持全面整顿。7 月中旬,胡耀邦等奉派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10 月 6 日,胡耀邦到正在恢复组建的心理研究所调查研究。当负责人希望他为研究所指明方向任务时,胡耀邦快人快语说:你们应该自己提出意见,自己坚持意见,这个方向不对走不通,走另一条路。心理学的高峰,我不晓得有多高,是从南坡爬还是从北坡爬?我不知道,总要攀上去。在你们面前有心理学的珠(穆朗玛)峰,你们现在爬了多少?跌了多少跤?走了多少弯路?跌了跤没有关系,人不摔跤成长不起来。你们登不上去,下代再攀。胡耀邦反复强调:方向问题我讲不明白,希望你们能具体化,在具体化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偏差,困难是有的。关于心理学研究工作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问题,胡耀邦说:不要把百把年来的(心理学)都说成是唯心论的。唯物论的有没有?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有没有?我不相信(没有)。要采取一种研究态度,对科学问题、学术问题要冷静、客观,要占有材料,不要采取轻率的态度,不要贴标签。胡耀邦理性对待心理学,观点鲜明,态度明确,与“文化大革命”以来全盘否定心理学的极左思潮,大相径庭,催人振奋。

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仅四个月,形势就有明显好转。由于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实际上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随着邓小平再度下台,胡耀邦也被停职反省,科学院的整顿夭折了。但人们在正反两方面的鲜明对比中思考,越来越多的人

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

心理学的大起大落,是“双百”方针在贯彻执行过程中曲折、反复的缩影。它表明,当高端政要正确地执行“双百”方针,心理学呈现一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当高端政要无视“双百”方针,肆意混淆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实行行政干涉,心理学便停滞、倒退,最后难逃被消灭的厄运。

(三)毛泽东曾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然而,向“双百”方针的基本性和长期性发起挑战的,恰恰是参与方针的酝酿、讨论甚至提出者,以及本该记取历史经验教训,模范贯彻方针的高端政要们。

“双百”方针的核心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可以自由讨论。这是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讲民主,是说要有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和充分的民主生活来保证两个自由。我国宪法虽然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但在轻法治重人治的年代,法制建设滞后,科学、文化事业同样面对的是有法不依又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宪法的规定没有落到实处,公民的合法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当法制体系不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非法律程序的人治是否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就完全取决于党政领导者个人的政治品质、

道德素质和认识水平。人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能取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但其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太大,难以避免重大失误。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端政要反复无常,他们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滥用权力造成的重大失误,也没有相应的问责机制,国家、社会、人民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是无法长期承受的。

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除了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健全的法制,还需要诚心敬畏科学发展规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有高度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高层管理者。不要以为掌有了权力就拥有真理,就可以搞一言堂,随意对科学问题作最终裁决,以长官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封建文化专制的残余、现代愚昧的表现。“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端政要中非理性地干涉科学的事件屡见不鲜。邓小平说:我们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是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贯彻执行,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同样呼唤国家体制和制度问题的政治改革。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第45页)名的地方武装势力,一为豫西十三县民团总指挥别廷芳,此人是个抱着“人不离土,枪不离手”的土霸王;另一个是老河口袁冲山区的陈别山,陈是拥有枪弹武器和“内三保”、“外三保”势力很强的帮伙。李宗仁委派原五路军参谋长张任民,参议刘汉川为代表,专程会见别廷芳,告诫他在国难当头应抗战保国安民;对陈别山也派人去晓以大义。在以后的豫南会战中,别廷芳动员民兵7000余人,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作战;陈别山也为抗日作过一些贡献。

抗战后期,蒋介石为了便于发动内战“剿共”,特别是便于进攻华中新四军的需要,同时也为使李宗仁不能“拥兵自重”,改任积极反共的刘峙为五战区司令长官,而任李宗仁为“位尊而无

实权”的汉中行营主任。

当1945年2月李宗仁离开老河口时,群众夹道簇拥相送,鞭炮声由司令部门前鸣响数里直至汉江河边。李宗仁下车步行走过浮桥,频频回首,与送行者依依惜别,离开了他曾驰骋数载,英勇抵抗日军侵略而铭记于心的鄂西北大地。老河口人为纪念他抗日的业绩,特地在第五战区司令部门前立下一块上书“李上将军德邻公驻节之地”的雕刻石碑。

李宗仁离开老河口距今60多年了,在中华民族遭受空前苦难的悲惨年月和老河口人共同度过六个年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李宗仁在那一段的表现,一定程度影响着历史。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李立三夫人李莎回首往事

● 孙维熙

李莎教授是俄罗斯人，出生于1914年3月20日。她是中国第一代革命老前辈李立三同志的遗孀。

李莎教授于50年代初在北京俄专教授俄语时，我曾经旁听过她老人家的讲课。1951年我曾陪同从事鲁迅研究的苏联汉学家柳芭·波兹德涅耶娃同李莎一家在青岛休养所共度过月余。所以，李莎教授是我俄语学习方面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和老前辈。2005年秋，我在瞿独伊（瞿秋白、杨之华同志的女儿）老大姐的陪同下前往探望李莎教授。见面后，大家相互拥抱，高兴异常。现今，92岁的李莎教授仍然精神焕发，思路敏捷，谈吐清晰，2006年夏在北戴河休养时老人还经常下海游泳。她跟我的多次谈话中，像讲故事一样的谈了她这一生中的愉悦、幸福、艰难和坎坷。笔者不揣浅陋，笔录了李莎教授的谈话。

—

1931年，正当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李莎积极响应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报名到远东去参加建设，到了与中国毗连的伯力。李莎被分配在远东出版社任技术编辑。因工作出色，很快就被批准加入了共青团，由于李莎出身于贵族，团组织给予她两年的候补期，以进行“考验”。在远东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中有不少中国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在那里她结识了几位中国朋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有刘长胜（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杨松（原名吴绍宣，党校教员，1938年回到延安后病逝。）、吴玉章（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李莎对这些中国革命者十分敬佩，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李莎从远东回到了莫斯科。深秋的

一天，她到刚从远东返回莫斯科的杨松夫妇家做客，巧遇李立三在场。杨松介绍说，“他是我的朋友李明（李立三的化名），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李莎说，在她面前端坐着的这一位满头黑发、一双明亮且富有智慧的眼睛，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多岁的中国青年吸引了她。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的偶遇使她与李立三，同时也使她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李莎并不知道李明就是中国大名鼎鼎的李立三。俩人的交往日益友好，日益密切。一年之后的深秋，李立三奉命到阿拉木图建立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国苏区的联系。李莎并不知道此事的底细。她心想，李明肯定是秘密回国。他们分别之后，李莎十分挂念，从此再也没有联系。

李立三离开莫斯科后，在一次从远东回来的友人的聚会上，一位中国朋友向她打听李立三的情况。李莎表示不认识李立三这个人，但是，她突然想到在远东工作时曾看到过一本正在印刷的书——《与李立三主义斗争》。李莎问这位朋友“李立三主义”是什么意思，对方回答说，李立三在中国党内是有名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大政治家，犯了大错误，受到批判。李莎心想，李立三肯定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于是她反问这个朋友，“你为什么向我打听李立三？”这位朋友告诉她，“听说你同李明很要好，李明就是李立三。”李莎惊呆了。她内心暗暗思忖，现在的李立三在哪里？恐怕再也见不到李立三了。她盼望着同李立三能再次重逢。直到1935年的盛夏，她正在准备大学考试，突然有电话找她，她终于听到了朝思暮想的李明的声音。

分别近一年的重逢，两人有说不完的话，自然是高兴异常。就在这次莫斯科河边的会面，李明就

是李立三的事实得到了肯定。李立三十分坦率地谈了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他在国内和国外的婚姻、家庭、子女的情况。李立三特别表示了他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总有一天他将服从党的调遣回国参加地下工作，到那时俩人总得分手，也可能是长期的永久的分手。通过相互间的接触和交谈，李莎对李立三的了解更加深刻了，她对李立三更加倾心，更加信任。

李莎幼年丧父，20年代初，正值苏维埃国家经济困难，灾荒伴随着饥饿之际，为求生存，李莎的母亲只好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富农家当牧童，带着六岁的女儿到莫斯科去谋生计。艰苦的童年生活，使李莎磨练得更加坚强。她14岁就读于半工半读的印刷技术学校；17岁就奔赴远东自谋生路；20多岁考进大学靠250个卢布的助学金养活全家。李立三对这样一位聪明活泼，吃苦耐劳，坚强而豁达、比她年轻十四五岁的俄罗斯姑娘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深深的疼爱之情。他们决定结为终生伴侣。按照党的规定，结婚前必须通过党组织的批准，于是李立三带着李莎到共产国际的招待所去见中共代表团领导人王明。李莎发现王明的态度十分冷淡，李立三对王明也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最终，王明对他们的结合总算未予否定。

李莎的亲友都对这桩婚姻担忧，提出了种种劝告，李莎毫不动摇。

1936年2月，22岁的李莎与36岁的李立三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居住的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结婚了。由于房间太小，婚礼就在隔壁康生住的30多平方米的房间举行。当时康生外出不在家。据李莎回忆，参加婚礼的有：陈云、杨之华携小女独伊、欧阳钦、曹轶欧（康生的妻子）等十多位在莫斯科的中国人。新婚宴席是大家动手做的中国菜。李莎说，“简朴的婚礼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和由衷的祝福，把我和李立三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开始了我们志同道合，风雨同舟的人生之路”。

二

李莎教授回忆说，“从1936年同立三结婚到1946年回国，在这十年当中，我同立三共同只度过了大约两年的平安生活，其余八年，都是在艰难困苦，惊恐忧患的灾难中度过的。”

1936年，斯大林掀起了一场“镇压反革命”和“肃清托洛茨基分子”的运动，当年苏联负责镇反的是克格勃的头头、杀人不眨眼的叶若夫。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也模仿苏联“镇反肃托”的做法。他们在会上宣布，“要把我们党内的奸细、叛徒、汉奸、坏人来一次彻底清理。”据李莎回忆，康生和王明在这次运动中给不少中国革命者，扣上“叛徒”、“特务”、“托派”帽子送交苏联的保安机关，这些同志大部分被流放或被处死。

据李思慎同志60年代曾任李立三同志的秘书）撰写的《李立三红色传奇》记载，王明对李立三从30年代初就积下怨仇。当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希望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当时，正是李立三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同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商量后，决定让王明到上海南洋烟厂担任支部书记工作。王明对此事耿耿于怀。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出席工联召开的一次会议时被捕。当年被捕的20多人被引渡到国民党的上海警察局。由于王明身着工人装，监狱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一个印度人巡捕对他说，“只要你想办法搞点钱来，买通关系就可以出去。”于是王明就给他的挚友潘文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写了一短函，让这个巡捕送到中央秘密机关。这种做法严重失密，致使一些机关被迫转移。1930年2月18日在党组织积极营救下，王明得以出狱。由于王明违犯党纪，中央决定给以党内警告处分，应当讲是很轻的了，他却怀恨在心。1937年的一天，李立三在公共车上丢失了提包，两天后从车站找了回来，并没有造成什么失密事件。王明和康生毫无根据地给李立三加以“泄露共产国际的重大机密”、“欺骗党组织”的罪名。是年秋，他们把诬陷李立三的材料送交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从此苏联内务部就李立三秘密监视。李立三多次要求回国，王明和康生以“对错误认识不深刻”为由不予批准。之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经过调查，认为对李立三“严重违反保密制度”的证据不足，需要重新调查再做结论。就在此时，李立三所负责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在出版共产国际七大文献时，排字工人在“七次大会”中将“大”字误排为“犬”字。李立三经过调查，是排字工人错把“犬”字补入“大”字铅字格中，是偶然弄错。王明和康生把此事提高到“阶级斗

争“新动向”、“反革命事件”的高度，立案追查李立三的责任。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在即将回国的前夕，密谋策划，由康生亲自密告苏联保安机关：“李立三是托派，他是一个危险人物。”

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同志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支持李立三回国，第三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也表示同意，预定于1938年2月25日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开会讨论决定。而苏联内务部却抢先于2月24日凌晨逮捕了李立三。给他加的罪名是“日本间谍”、“托洛茨基分子”、“恐怖集团首脑”等等。任务是刺杀斯大林，执行推翻社会主义苏联的使命。李立三被关进了牢狱。

李立三被带走之时对李莎说，“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我是清白无辜的。你去报告中共代表团。”

李立三被捕后李莎就作为“人民敌人的老婆”被赶出了招待所。李莎确信李立三是清白无辜的。她把李立三被捕前留的话报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临时负责人陈潭秋，陈述了李立三的冤屈。当她向自己工作的单位外国语学院团支部汇报时，团支书令她“好好反省！”外语学院团组织召开全院大会处理李莎的问题时，令她当机立断同李立三离婚，彻底划清界限……李莎眼含愤怒的泪水，低头不语。李莎回忆说，“我坚信李立三不是敌人，我决心帮助他，我一句话也不说了。”最后，大会主持人问李莎：“你是要你的‘特务’丈夫，还是共青团团证？”她说，“我热爱党，热爱团组织，我愿意进步，但是我确实没有发现李明有任何可疑的地方，我不能同李明离婚。”她走到主席台前再次说，“我相信党，也相信李明，在没有审查清楚问题之前，我的良心不容许我胡说。”她暗下决心“豁出去了！”她未做任何思考，把团证交给了大会的主持人。李莎被开除了团籍。

莫斯科的牢狱很多，李立三到底被关押在哪个牢狱？李莎回忆说，“那时候我还在学习，利用课余假日，我跑了若干个牢狱，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跑监狱寻亲人的很多，每到一个牢狱都要排队达数小时之久，到了窗口，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李明这个名字’。”李莎没有失望，继续寻找，跑了半年之久，终于在莫斯科远郊的塔岗卡监狱找到了李立三。由于是“政治犯”，不允许与家属见面。最后，争取到每月通过狱方可以转交50个卢布给

“犯人”。李莎每月从她仅有的维持家庭生活的250个卢布的助学金中挤出50个卢布送到监狱管理人员手中，以便转给李立三。后来，李立三被释放出狱后对李莎说，当他第一次收到她送的50卢布，他激动地大哭了一场。在狱中，吃不饱，又没有蔬菜，好在允许个人买东西，他才能活下来。李莎监狱寻亲人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李立三，使他感到无限的温暖，更加增强了他在狱中的斗志。

李立三充分意识到，他被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问题。因为在他被捕时所定的罪名中明文写着“以李立三为首的在莫斯科的中国人的反苏维埃的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李立三在狱中理直气壮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利用写交待材料的纸上书斯大林，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申诉。牢狱中的黑暗是可怕的，为了能证明李立三是“反苏分子”、“人民的敌人”，苏联内务部不惜派假囚犯企图引诱李立三上钩，这个假囚犯故意大骂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李立三却正言厉色地警告对方，“不许你对共产党和斯大林任意污辱！”李立三这种鲜明的立场感动了那个假囚犯，最后他握住李立三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同志！”1939年夏，肃反高潮已过，苏联内务部叶若夫被撤职枪决。历史就是如此地反复无常。

1939年11月14日，苏联内务部不得不在事实面前宣布结束对李立三的审查，“立即释放”。李莎说，这一天晚上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李立三站在门前，她惊喜万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她一生中最最高兴的时刻。

李立三是出狱了，但并没有恢复他的党籍，于是从牢狱出来的人，找工作艰难，四处碰壁，原在共产国际的宿舍已被占用，无家可归。只好在岳母家同李莎的哥哥、嫂子、侄儿住在一间房中，中间挂一幅布帘。每天的生活只能靠李莎250卢布的助学金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每月发给的一点卢布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最后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曼努尔斯基的帮助下，作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进入国际工人出版社工作。由于李立三是坐过牢的人，被当作“可疑分子”对待，不能参加重大节日的游行活动，不能到“红场”。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全国人民奋起抗敌，李立三积极要求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上前线，也

因“政治上不可靠”而被拒绝。他只好参加了修工事，挖战壕的民工大队。他从不计个人得失，从无半句怨言，整夜值勤。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李莎携老母从莫斯科撤到外地，李立三留莫斯科坚守岗位。一家人又是两地分居。直到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一家人才得以团圆。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人们连土豆都吃不上，只有黑面包是按人头供应。李立三每天清晨三四点钟就要到商店排队领取每人每天 800 克的面包。冬季莫斯科的气候冷的可怕，室内没有暖气，人们只好戴着皮帽、穿着皮衣方能睡觉。为了生存，苏维埃政府号召到郊区种土豆，李莎一家每周日都到郊外去种土豆，以解决充饥的问题。



李立三一家(摄于 1956 年北京)

三

1945 年的除夕，是李莎全家最为高兴的时刻。苏共中央联络部通知，李立三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通知，李立三可以无条件回国。李莎说，“这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年礼物。”李立三像孩子一样，激动地热泪横流。

1946 年 1 月 16 日，李立三一个人先启程回国了。李莎和小女英娜留在了莫斯科。在那个年代，很难获准带外国妻室返里。李莎担心这次的分别恐怕将同李立三永远难以团聚了。1946 年秋，罗荣桓同志去莫斯科治病，带去了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联系批准李莎可以到中国的文件。李莎说，“真是转运了，这又是一次出人意料。”在莫斯科的亲友听说李莎要带孩子去中国，纷纷劝阻，“不能带着孩子到战乱的中国”，“不能再去过那种艰苦、动荡的有生命危险的生活”等等。李莎回答亲友们，“我嫁给了我真心爱的、敬佩的李立三，我是中

国人的媳妇了，中国有句古语，‘嫁鸡随鸡飞，嫁狗随狗跑’。李莎的母亲却十分开明，同意自己的女儿去中国，以后，这位俄罗斯老母亲也到了中国。

1946 年 9 月李莎携女儿英娜在林利（林伯渠同志的女儿）、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的陪同下离开了莫斯科回国。李莎说，“我同林利和孙维世结下的友谊是因为音乐家冼星海。”1945 年冼星海病重落难莫斯科，走投无路之际，他到莫斯科国际工人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当即把他接到家中，在那 30 平方米的房间中，一半住有李莎的兄嫂，中间拉了一幅布帘，另一半就接纳了冼星海和他的犹太族夫人，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半边房中还有李莎的母亲、李莎夫妇和小女。李莎把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她和李立三、小女打铺睡在地上。当时莫斯科供应紧张，李莎夫妇不仅要为冼星海寻医治病，又要尽心尽力地为他们的生活奔波。李莎回忆说，在此期间，林利、孙维世等到李莎家看望冼星海时，看到李莎一家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接待冼星海夫妇，无不为之感动，从而解除了她们对李立三的偏见和误传。从此，李莎同林利、孙维世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冼星海在李立三多方奔波和帮助之下最后住进了医院，由于他身患血癌，于 1945 年 10 月 30 日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病故。

李莎同女儿英娜在林利和孙维世的陪同下

1946年10月6日乘火车到达了哈尔滨，路上走了整整12天。就在这一年秋天李莎的第二个女儿雅兰降生在这里。哈尔滨当时处在东北战场的最前沿，中共东北局作了紧急的战备动员，其中包括组织东北局干部家属进行紧急的救护训练。东北局领导人的家属，如林彪的妻子叶群，吕正操的妻子刘莎，高岗、王首道的夫人等都参加了救护训练。李莎积极地参加了集训，并以优异的成绩闻名于东北局机关。1947年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建校，李莎是这所学校的首批外籍教师，也是北京俄语专修学校成立后的第一批外籍俄语教师。直到1996年春，在课堂突发心脏病，才被迫终止了教学生涯。半个世纪来，她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的俄语人才，大多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几十年来，她不仅直接给学生讲课，而且为学院的教师开设辅导班，除此，还担任中央编译局和外文出版社的顾问，参加过俄文版《毛选》、《毛泽东论军事》的校订工作。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之后，李立三同李莎的关系也随之成了问题。1959年夏，康生借庐山会议之机，开始散布“李立三是里通外国分子”。后来，又有人给中央写诬告信，说李莎是苏修特务。李莎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30年代末因为李立三的问题，苏联的组织逼我同李立三离婚，其结果是不仅没离，我却到了中国。这一次是中国方面的组织劝李立三和我离婚，其结果又是没有离婚，我却真正成了中国人的媳妇。1964年李莎加入了中国国籍，继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从事教学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大的灾难临头了。李莎说，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竟成了以李立三为首的苏修特务集团的“上级”，这个集团包括杨尚昆、李维汉、张锡侯（原北京俄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赵洵（原哈尔滨俄语学院副院长）、林利、欧阳飞（烈士之后，在狱中患精神病）等等若干人。在此期间，身患重病的李立三在几天之内被造反派“批斗”、“审讯”达二三十次。1967年6月21日在中共华北局机关礼堂召开批斗由中央文革点名的“苏修特务”李立三、李莎的大会。不少人想看看这个“洋人特务”，因此大礼堂挤得满满的。李立三身体很不好，站在台前，面容憔悴，站立不稳，矢口否认他是特务。李莎被迫弯腰90度。她

说，“我的腰几乎要断了，衣裳也湿透了，看到李立三身体支撑不住几乎要倒在会场上，真是心疼如刀割，这是我们夫妻俩最后的一次会面，是在批斗会上……”会后，李莎被送回了家，李立三由造反派押送到三里河的一个关禁闭的地方。就在这一天李立三离世而去。7月4日造反派在华北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李立三畏罪服安眠药自杀，自绝于党。李莎说，在那种被关进牛棚的情况下，大量的安眠药是哪里来的？迄今还是个谜。

6月22日下午，几个造反派闯进李莎的家里，怒目相视地对李莎宣布：“你被逮捕了！”当天这一伙人把李莎押到北外教学楼住了一夜，次日，一位公安人员对李莎说，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同志让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就这样，李莎无奈地乘上公安部的囚车到昌平的秦城监狱。同日，李莎的两个女儿——英娜、雅兰也被关进了同一个监狱，但彼此不知下落，母女三人也都不知道他们的亲人李立三已离开人世。

李莎说，“被捕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进监牢比在外边挨批斗好！”从此，李莎就住在这六平米的囚室。李莎回忆说，这囚室很干净，没有臭味。只是空间狭小，小步走十几步，大步走五六步。囚徒统统换上黑衣服。“我穿的囚服是两膝带有补丁，后臀部也补有一块大补丁。我心想，这可真像一个穷困潦倒的农村老太婆了。”看守我的人要求我每天一定的时间正襟危坐于离地只有八寸高的木板床上，夜里睡觉开着电灯，那是真不好受。“我没有名字了，我的称呼是77号”。从1967年到1972年初，每天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一碗漂着小虫和碗底沉淀着泥沙的菜汤，李莎说，“我每天都挺饿，可是还饿不死”。在狱中的日子里，最初还不时地审判，让李莎承认李立三有罪，承认她是“苏修特务”，是“特务上级”，“由于我不认罪，他们恼羞成怒就命令我站着交待，连续三个礼拜，一般都是在夜里10时左右直到次日的三四点钟，轮番的审讯，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李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她说，“事实是不能伪造的”。

1972年初，毛泽东下了指示，第一，要让犯人吃饱；第二要让犯人睡足；第三，犯人生病期间不能审判。从此以后，停止了对犯人的虐待，伙食有了改善。李莎开玩笑说，“吃馒头了，还能喝上菜花汤，我心里想，在这里再住几年也没关系”。

在牢狱一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一种良好的心态,难以耐得住这种令人窒息的寂寞。好在“囚犯们”可以读到《毛选》和《人民日报》。李莎说,“我在狱里学了不少中国字。我的阅读能力大大提高了。”八年的牢狱生活没能使李莎灰心丧气,她日夜盼望的和思念的是她共过事的战友、她的学生和同甘苦共患难的丈夫及儿女。



左起:瞿独尹、李莎、孙维熙

1975年的5月22日,突然通知,要她离开秦城监狱,但并不是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山西运城去“养老”。李莎问陪同的一名女公安人员“李立三在哪里?”,对方回答说,到了运城再告诉你。李莎并没有多想,而是满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到运城后可以同自己的丈夫一起“养老了”。她回忆说,到了运城,把她送到运城地区的一个农科所,并不是牢狱。农科所为李莎腾出一间房,周围是农田。自从这个“政治犯”到达后,专款为之修筑了高高的砖墙,派有专人看管。李莎说,这可比秦城监狱自由多了,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看到蓝蓝的天,晒晒太阳,在小院内种花、养鸡,还可以去农贸市场去买菜,到商店去买生活日用品。李莎说,“一上大街,就热闹了,当地的群众惊奇地围上来,参观我这个从未见到过的蓝眼睛、大鼻子、白发苍苍的‘洋婆子’。有时要出动警察才能解围。”在农科所这块流放地,李莎表示很满意,冬天室内很冷,农科所的人教给她生炉子;她喜欢养鸡,农科所的人帮她搭起鸡窝。连负责监护她的人员都把“阶级斗争”这根线模糊了,常常到李莎的住房同她下跳棋。李莎回忆说,“农科所的工作人员和监护者对我都很好。我房间里有一台九寸黑白的电视机,是女儿给买的。每到晚上,房间里全是人,大家边看电视,边说笑,甚是欢乐。使我困惑的、担心的是,李立三到底在哪里?”直到1976年春节期间,她的两个女儿英娜、雅兰被获准去看望她时,才告诉她,李立三是她被捕前一天离开人世。她简直不敢

相信经受了千难万难的丈夫会自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也才知道,两个女儿受牵连,在秦城牢狱被关了两年,小女儿雅兰的病根是在牢中留下的。李莎在谈这些极其痛苦、凄惨的过去时,她一再说,这都是历史,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李立三的秘书李思慎同志因受李立三的牵连先在汉沽农场劳动改造,后被调到甘肃天水工作。1978年11月底到北京出差,来到李英娜家探望。当得知李莎仍流放山西运城时,李思慎同志百感交集,甚是难过。他得知李英娜给中央组织部写信一直没有回音,他建议,专门给胡耀邦同志写封信,“只提出一条要求,就说妈妈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山西无人照顾,要求把妈妈接回北京。可以晚上6时以后亲自送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去,千万不要邮寄。”12月4日晚英娜带着她的小孩像串门一样到了胡耀邦家里。耀邦同志没回家,是由儿媳安黎接待的。安黎一再嘱咐,“放心吧,一定交给爸爸。”12月5日胡耀邦就在信上批示:“先把人接回北京。”中央组织部及时向北京外语学院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并说,北京的手续不要办,把人接回来再说。已经通知山西省委组织部,你们派人到山西去就行了。那真是当机立断,雷厉风行!

1978年12月19日李莎从山西运城返回北京。

197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李立三、李莎“里通外国”、“苏修特务”(下转第80页)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 顾迈南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说起来，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日。一天，我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一次报告会，听当时科学院的负责人武衡在报告中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他没敢讲名字）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听到这里，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因为“文革”迫使许多科学家都中断了研究工作，现在听说有人竟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因此便立即询问坐在身旁的科学院的一位局长：“武衡指的这位年轻的数学工作者是谁？”

“咳，他叫陈景润，快死啦！他是个怪人！”

我听了心想，既然做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又快死了，此人一定非同寻常。于是，我决定访问这位怪人。

第二天，我便来到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所，说明来意后，接待我的那位“革委会”负责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慢吞吞地说道：“噢，你找陈景润啊，你找他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听武衡说，他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那人眯缝着眼睛，沉吟片刻，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而他至今还活着……”那位造反派苦笑了一下，又说：“反正他也不能去工厂、农村搞成果推广，他搞的那项基础研究也没啥用处，我们都懒得理睬他，这不，他来了！”

陈景润就这样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打量着这

位采访对象，不禁惊呆了。当时，正是暮春时节，而他还是“全副武装”——穿一身厚厚的棉裤棉袄，戴着蓝棉布的鸭舌帽。在场的人们大概看出了我的惊讶，解释说因为陈景润患结核病，长年发低烧，因而着装厚。

“陈景润，这位是新华社记者，你要老实谈问题！”大概习惯了被人斥责，陈景润听了造反派头头的训斥，并不介意。他那浓浓的黑眉毛下一双大眼睛依然充满了笑意，不停地边冲着我点头“谢谢，谢谢……”

在此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找陈景润本人和数学所业务处的负责人乔立风等人，作了几次访谈，过后，写了两篇内参，一篇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作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另一篇题目是《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

两篇稿件大概的内容是：19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大数学家欧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两个猜想，一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第二个猜想是：任何一个大于5的奇数，都是3个素数之和。欧拉给哥德巴赫回信说，他相信这两个猜想是对的，但是他说他不能证明。

稿中说：“18、19世纪的数学家都试探过，都没有能够作出证明，以致到了1900年，德国数学家布尔伯特在第二届国际数学会的著名演说中，把它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之一，留给了20世纪的数学家们解决。要证明这个猜想是那样艰难，以至于德国数学家朗道1921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国际数学会，无奈地说：‘用现今的数学方法，要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是力所不及的。’”

内参稿中还写道：“自从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前150年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些成果……”

陈景润兴奋地注视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在数学所他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1965年冬季的一天，陈景润交给王元（华罗庚的学生、当时数论组负责人）一篇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有5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宣布：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也提出证明还要进一步简化。因“文革”开始，在1966年5月的《科学通报》上，仅发表了1页纸的简报，从简报发表到全文发表的6年中，国外数学家都知道陈景润宣布的研究结果，但谁也不相信是真的。1972年《中国科学》复刊后，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一篇关于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题目是：《表大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有20多页。他把原来的证明作了大量的简化与改进。王元等人看了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在《助理研究员陈景润近况》的内参中，我写了陈景润原系厦门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1956年，他寄给华罗庚一篇题为《塔内问题》的论文，对华罗庚《堆垒素数论》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改，华罗庚看后，说：“他（指陈景润）真有想法！”随即把陈景润调到数学所。

内参还反映说，陈景润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3年困难时期，他把自己节省的数十斤粮票捐给了灾区……我还引用数学所科学家们的话说：“陈景润从事的这项基础数学研究工作，虽然一时还不能用在工农业生产上，但在国际上却是有影响的，因此，希望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他，给他治病，让他把哥德巴赫猜想继续研究下去……”

两篇内参稿件，及后来我采写的十几万字的关于陈景润的内参，都受到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内参组的张书忱等，看后都迅速编排成动态清样



陈景润在工作

送给了党中央的各位领导。内参送上去以后，很快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一天深夜要我陪有关领导（其中有迟群、武衡等人）去中关村看望陈景润。

1973年4月25日凌晨3时左右，我们乘坐几辆小汽车来到中关村数学所的宿舍，这天，陈景润和往常一样还没有睡觉。他把门打开以后，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震惊：这是一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的小屋，靠墙放着一张单人床，床前放着一张三屉桌，桌上床上到处堆着书籍、资料，窗台上，地上，放着破饭碗，药瓶子。碗里还有干了的酱油。一人说，为了节省，陈景润平时不吃菜，用酱油泡水喝……天都快亮了，床上的铺盖还没有摊开呢！

门打开以后，陈景润呆呆地站在床和桌子的夹缝里，惊恐不安地望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

武衡是位刚获得“解放”的“走资派”，他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那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月里，竟然还有这样奋不顾身地钻研学问的人。半晌，他说：“陈景润同志，跟我们走吧！”

陈景润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跟人们走了。在这之前，武衡对我说，“毛主席、周总理，还有江青等人都看了内参，批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要他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是奉命来带



陈景润(右)和华罗庚在一起切磋

陈景润治病的。这天深夜,他们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里,坐下来以后,对他传达了毛主席对他的批示。陈景润听了,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在场的内科专家张孝骞等人,给陈景润作了检查,说:“你需要做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你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 309 医院。

住医院是陈景润很不情愿的,这中间还有个故事。

送陈景润进医院的那天傍晚,我随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和中科院的负责人再次来到数学所的宿舍,见我们来了,陈景润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迟迟不肯动身,并明确表示不想住医院。研究所的负责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再来了运动,你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是修正主义苗子,住医院花国家的钱,还要受批判的。”

经过一番耐心劝说,他总算勉强同意跟人们走了。

不久,来到 309 医院,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因

此医院很重视接诊工作,各级医护人员都来了。护士拿来了病号服要陈景润换时,他死活不肯换。见这情形,迟群把在场的医护人员赶走以后,说:“陈景润,把存款单拿出来吧!”

陈景润无奈地从棉袄里掏出了一个塑料口袋,递给迟群,迟群随即递给了同去的数学所所长赵蔚山。

“这样吧,我念,你记!”

“你这包里共有多少钱?”

“不知道,现在我的脑子很乱!”陈景润说。

他被迫掏了一包又一包,最后算下来共有 6000 多块人民币,两块手表。

“这些存单请你们所长带回所里,放在保险柜里给你存着。你在这里安心养病,等病好了,回到研究所时再还你。”陈景润听了,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住院期间,他还是偷偷跑回所里,要回了存单,自己保存。)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情况通过内参向党中央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他从一次次无形中受到党中央和中科院领导的关怀中判断,我大概是他唯一可以讲真话、可以信赖的朋友。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人大代表,有一年,人代会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满面笑容,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对我诉苦说,有很多记者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夜里去敲他的门,使他无法工作。他问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

“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

“不过,你例外,顾大姐,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他笑着说。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对他说,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事,你不应该把半夜敲门的记者和小偷等同起来看待,并表示,以后我也不会随便地打扰你……

“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被第一批评为研究员,科学院还给他安排了宽敞的住房。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陈景润被安排

坐在了主席台上,并做报告。他在报告中,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只不过是攀上了科学的一座小山包,我的经历和千千万万个科学工作者的经历都说明,要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必须苦战!

他在报告中,还用整整一段的篇幅,讲述了新华社记者对他的帮助。

陈景润成名以后,成了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有些事越传越玄,以致以讹传讹,歪曲了事实的真相。一年以后,他被邀请到美国访问讲学,传说他不准备回国了。回国后,为了公开辟谣,编辑部又让我采访了他。

1979年6月里的一天,我再次来到陈景润的小屋门前(这时,他还不肯搬入新房),正要敲门,他从房里迎了出来,笑着邀请我屋里坐。这天,他情绪很好,除了人显得胖些外,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你还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呀?”见面后,我说。

“早就叫我搬家,我没搬。现在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足够了。”他说。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谈了访问美国的观感,并说,美国以及英、法、德等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都邀请他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陈景润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心来念书,不然,我就要落后了。”他说,他在出国访问期间收到了中外人士的上万封来信,他很想每封信都答复,可是实在没有时间啊!

我对陈景润的最后一次访问就这样结束了,离开了他的小屋。可是,脑子里无论如何也驱散不了对这间小屋的记忆。在这间6平方米的窗子上糊着破报纸的小小陋室里,陈景润十数年如一日,他每天早起晚睡,忍受着长年发低烧的病痛,有很长一段时间拿着80%的病假工资(改革开放以前,陈景润每月工资只有87元人民币,每月还要给他老父亲寄15元),日夜潜心研究高深的数学理论,共演算了6麻

袋稿纸,如今,他成名了,可是他还是他。

这次访问以后,我写了篇通讯,题目就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200多年的漫长岁月,有多少数学家绞尽脑汁,呕心沥血地钻研它,最后都失败了。因而陈景润的成功就格外引人注目。

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李希特合著的《筛法》一书,写完了10章,正准备出版时,“陈氏定理”忽然问世,作者决定推迟出版,又立即以《陈氏定理》为题,专门写了第11章。

1979年法国出版了古今一千多位大数学家的传记,陈景润也列在其中。那年,美国科学院副院长来华访问时,惊问陈景润:“是什么力量和毅力,使你大力推进了如此之难的哥德巴赫猜想呢?”

英国数学家赫晋黎,在写给陈景润的信中惊叹道:“啊,你移动了群山!”

人生苦短,如今,陈景润已经驾鹤西去。不久前,他留在人世间的遗物、手稿,已经被永久地陈列在了庄严雄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代的中国人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事迹,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能享受这种礼遇,是他生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责任编辑 杨 鄂)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媒 体 老 将 赵 超 构

● 张 循

在老《新民晚报》，无论总编、看门的、剃头的，无论当面、背后，都尊称社长赵超构（笔名林放）为“老将”。

老将告别人间，不觉十又五载。几乎年年，不止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他，梦醒时分，偶尔想写点什么，但转念又罢——大凡写名人者，或谬托知己，抬高自己；或忌于种种，为尊者讳。如今吾亦老矣……

我能读懂老将吗？

我从复旦毕业分配到《新闻日报》，又从《新闻日报》关门于1960年8月与冯英子等7人分配到晚报。当我踏进圆明园路50号那栋破大楼，坐在十几个记者挤于一室的办公桌前，当时的心态：此非久留之地也。

有缘忘年交

一天，老将在走廊的贴报栏前，不无自豪地笑呵呵说：我在马路的报栏前，有时看到读者用自来火一根根点火，读大千的长篇连载。言者无意，却安定了我那颗浮动的心。

作为记者，最大的安慰是自己的文章有人看。一次，我的一篇通讯刊在一版头条，并醒目地配了老将的一篇言论，一下子我似乎觉得老将与我这个新兵之间的距离缩短了。1961年我从记者调任编辑，自知古文基础差就到复旦旁听《楚辞》，每周两小时。每天看完大样后的一段空隙时间，老将总喜欢到编辑组来聊天，一则上午一篇言论脑子需要休息，再则与编辑们海阔天空，有时可捕捉题材。老将考我：“九歌有哪些篇？”我答不上，就反考他：“离骚能背几句？”“帝高阳之苗裔兮……哈哈”，背不下去，哈哈打住。老将对几位老编辑很尊重，常叹后继无人，他很欣赏陈亮的四版，如同“螺丝壳里做道场”，似苏州园林曲径通幽，小小版面，

能囊括当天的大小新闻。他鼓励我向老编辑好好学习。

1962年10月，全国第3次晚报会议在上海大厦举行，晚报是东道主，我担任会议记录，老将在会上作如何写小言论的专题发言。我记录速度快，还把插言者的话全记了。会后，老将请我把记录整理成文，并请编委曹仲英润色，曹老总仅改几字，就以原稿寄新华社办的《新闻业务》刊发，稿费被几位老编辑、老报人敲竹杠大吃一餐，我应邀参加。这是我第一次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流合席”。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寓哲理于心灵中，有时作些记录。一天我把《飞鸟集》中“你看不见你的真相，你看见的，只是你的影子。”划下浓浓的蓝笔时，老将在背后朗读了这句，作沉思状。也许晚报编记、新老之间有些疙瘩，他鼓励我把每天看到、听到、想到的有意义的事写下来。总编束纫秋也常来聊天，认为此举不错。于是我每天在做完手头工作之余，就在当天的大样背面，以夹叙夹议的形式写一篇《学艺手记——看到，听到，想到》，张贴在走廊的贴报栏上，天天不断，时达一年之久。

《手记》招来的矛盾和“杀身之祸”是几年后“文革”中才有所领悟，当时我是沾沾自喜的。每天早晨走廊里热闹非凡，记者们都知道，我议的都是社长、总编、老编辑当天对稿件的褒贬之见，一时间，赞同的，异意的，反对的，在《手记》上“跟贴”，百家争鸣。

我其实是“传声筒”，却自以为沟通了编记关系。

大约1963年秋，老将应约到复旦做报告（讲课），他请我一起去，为他记录。也许，反右的前车之鉴，让他感到有个记录备案，以应不时之需吧。没想到，某副总编（党组成员）当即找我说：“你不是他的私人秘书，他做报告，你去干什么。”我一时

没反应过来,心里颇委屈,转身找党组书记兼总编老束,老束稍迟疑说:“那就不去吧。”老将听说我突然不去,半晌不作声,说“这报告我不做了!”办公室主任周光楣感到很为难,她愿去为他记录,但老将终究还是推辞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百思不解——身为社长的一个小小的合理要求,为什么给某君轻易地否定了,身为总编看似十分尊重社长的党组书记为什么犹犹豫豫地支持了某君,平易近人的老将又为什么执拗了

我是1956年复旦入的党,时年二十。高中毕业后我分配到闸北区政府,全国第一次普选闸北区试点,我在办公室掌大印却没有选举权,区政府上上下下都称我为“小公民”。我到晚报编辑组后,老将也戏称我“小张循”,碰巧老将的次子与我的弟弟是交通大学同班同学,所以老将夫人生病我到瑞康里看望、吃饭,似乎工作关系之外加了点私情。一次豫剧《社长的女儿》在沪公演得好评,报社一些好事之徒不嫌附会,戏称我为“社长的女儿”。

老将长我二十六岁,我们谈话却很投缘。当时我对苏联变修、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三年自然灾害等诸多问题心里都有不少疑惑,有时问老将他常听而不答。他欣赏独立思考,但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哦,他戏昵地评道:“张循不驯”。有时我好管闲事,他描画我的个性随手在纸上写了四个字:“狗逮耗子”。老将教我秘诀:向老编辑学,要“偷”一手。我任文艺版编辑时看戏较多,谈起川剧变脸、京剧武功,老将很是兴致勃勃。当时青年话剧团演出《年青的一代》,我深受感动,老将也赞叹这样的好戏多多益善。晚报副刊登载董天野作画、陈振鹏赋词的《胆剑篇》长篇连载,我们几乎天天赞赏不已。老将赞赏记者冯小秀没日没夜泡在球场上的敬业精神,夸奖其体坛述评独具一格,他还夸奖记者毛绿嘉与越剧演员、京昆新秀交友,稿件写得生动。那时副食品紧缺,组织上对高干、高知有照顾,有时老将下午没事,招呼几个人到文艺会堂吃点心,戏称“鬼魂西行”[英国影片名],我也参与。

大约1964年秋,一天下午老将照例来编辑组坐坐,他刚在编辑组长的椅子上坐下,我问了他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问题:“老将,你采访过延安,毛

主席又接见过你多次。你为什么不入党呢?”老将一时语塞,稍作思考,似笑非笑地说:“我与你接触多些,有人批评我腐蚀青年党员,我,还能入党?”这句话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常自问:老将德高望重,人所公认,“向老报人学业务”,是老束说的,怎么变成“腐蚀”我呢。

1965年初,毛绿嘉被调到一所中学,她是两航起义人员,1956年由老将介绍进了晚报。其实中学并不需要教师,她坐了几个月冷板凳。老将为此默然。此前,另一位与老将谈得来的欧阳文彬在党内受批判,她的问题是“丧失立场,严重右倾,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后调离晚报。

老将似有所悟,再不有所说有所笑了。

1965年秋,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分配到金桥公社住入真正的牛棚,与农民同吃一锅,下乡七个月,思想、生活有了新的变化。

1966年4月,一天突然接到人事科长王玲电话,叫我回报社看大字报,参加运动。报社俱乐部、走廊贴满了揭发老将、老束、老报人的大字报,揭《学艺手记》点我名的大字报,辟成专栏,“名列前茅”。我看写者都是青年记者、党员,矛头通过《手记》指向老将。幸好我每天撕下《手记》原稿存放在抽屉里,那天晚上我把所有《手记》抱到人事科,交组织审查。也许是“四清”工作队员的经验,我每天早到、晚归,“看到、听到”之外,一言不发,看到老将彼此点头而已。我心里明白,老束已靠边,领导运动的是某君。我想:《手记》白纸黑字均在,何罪之有?

文革十年,一场浩劫。在这鬼哭狼嚎的年代,多少罪恶借革命之名以行,每一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作了表演。

上海是“四人帮”的根据地,而《新民晚报》又是王洪文与徐景贤殊死争夺的要地。晚报除靠边者外,几乎都参加造反派,一是“指挥部”,与工总司挂钩,一是“井岗山”,与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挂钩。“指”派以批“走资派”为主,“井”派以批牛鬼蛇神为主。两派与报社外的造反派都有联络,在夺权、出报、停刊,斗“反动学术权威”、斗“走资派”诸问题上,武斗不止,越演越烈。一批老报人朝不保

夕，画家董天野被批斗当场打掉门牙，后投江自尽；冯英子、乐小英被打得鼻青脸肿，苗进被梳子钢刺打得血流满面。批斗老束、老将更是两派的主课，相比之下，老束受苦更多；老将在群众中威望高，在密不通风的牛棚里，话不多，耳失聪，造反派有时明批暗保，较少找他麻烦。不过，在全市批斗会上，也免不了吃苦头。

在晚报的文革十年中，令许多人惊讶的是：1969年8月20日上海市体育馆（今卢湾区体育馆）五千人参加的新闻、出版系统大会上，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当场将我逮捕入狱，轰动一时。晚报编委张林岚十多年后对我说，他当时一身冷汗湿了衬衫，有趣的是由他执笔的晚报史对此一字不提。也许，人们真的以为我当初有“罪”？其实，就以文革时的标准我也没问题：当时宣布的罪名是在“毛主席万岁”上打××，而事实是我作为编辑删去大段口号，用的是编辑符号，“井”派一名校对偷原稿以造假；其他罪名，均系捕风捉影。我很清楚，一点也不屈服，高呼口号入狱。想起1968年12月23日“井”派头头某君（复旦同学）张贴了一张《把社长的女儿押上历史审判台》大字报，我在旁贴一小字报《奉陪到底》回敬，如今，真的在劫难逃了。

性格决定命运。我死不认罪的强硬态度令主审我的晚报三结合干部某君束手无策，某君共审我9次，诱供，逼供，每审都要我揭发“反动权威”。其间，我被反铐半个月，我不出卖任何人，关押14个月零4天后，于1970年10月16日以“敌性内处”释放，送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那天中午在食堂见到老将，他仅说了一句，令我难忘：“少吃点，不要太油”。这是关切，更是默契。一个月后，我的丈夫某空军干部专程来干校办理离婚手续，我泪流满面，无言以对。此刻，方体会到这冤案的分量！

老将在干校，人称“这干瘪老头，劳动拼命呵”，他已逾花甲，肺有病，挑水满担。老束的劳动活是最重的，我与乐小英常搭挡拉粪车。奉贤海滩边，晚饭后散步，看夕阳西下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1972年2月13日工军宣队宣布老将“解放”，事先要我在会上发言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其时我还戴着敌性内处的“反现”帽子。

不久，老将被安排到辞海编辑室；我于1973年10月也被安排到二十四史校对组；1976年2月公安局撤销对我“敌性内处”的判决，1978年彭

德怀平反，11月我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党纪处分也得以平反。

“四人帮”下台后老将情绪颇佳，他、张编委、毛绿嘉和我四人每隔一些日子聚餐，谈各种小道新闻，议四人帮种种罪行，彼此无所顾忌，老将开心地说：“我们也是四人帮！”他惋惜地对我说：“你的时间都在‘翻案’中度过，可惜了。”我说：“我不平反，死不瞑目。”

老将在十年动乱中，表面上不关他事，实际上对形势非常关注，当时他在车间劳动，对报社印制的各种讲话、材料都阅读不略，所以对文革的发展轨迹，江、王、张、姚的罪行心里都有一本账。一次聚餐说笑时，我说社会上议论“五人帮”呢，他正言道：“老人家有错误，但与他们不同嘛，他发动文革，也许是防修反修。”一次我们议论老报人为什么那么怕某君时，张编委说：“1965年姚文元著文批判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好几位老报人认为姚文元不说理，更不懂音乐，以势压人，议论纷纷。没想到文革中某君抛出一张张大字报，淋漓尽致，原来当时某君一边佯看大样，一边暗暗在抽屉铺底的纸里作记录。此事在牛棚里当作警世名例传颂。”老将说：“今后我决不与某君同坐一室，否则，天天胆战心惊，一定少活五年。”

碰撞与理解

大约1980年初，晚报有望复刊，当时我在《社会科学》杂志任编辑，与刚刚复出的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因稿件来往联系较多，他对我文革遭遇很同情，给我多次通信。一次老将要我陪他去看望陈部长，他想摸摸底由谁组班。我到辞海与老将一起乘15路电车到康平路100弄看望陈部长。陈从医院出来不久，躺在床上，见到老将很激动，欠身说：“应该我去看你，你长我几岁，我一直记挂着你呢。”彼此谈些文革遭遇后，老将问起晚报复刊的事，陈说此事由另一副部长分管。不过，你有什么想法，我也可过问。我们告别后，老将对复刊的事很少再议。

在晚报筹备复刊阶段，一次老将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回晚报，你斗不过他们，晚报的派性阴魂不散。”我很不以为然，心想平反后我曾特地到辞海编辑室找老束，向老领导报告我是冤案，老束

解释说,那时他靠边,不知情,他祝贺我得以平反,相信我今后会好好工作。所以我想:我在晚报定冤案,晚报复刊我理所当然该回晚报!如果老束、老将复职不请我回去,我决不找上门去,说不定《社会科学》总编钦本立还不放呢。

令我生气的是1982年元旦晚报复刊,某君如愿以偿从电台调回晚报,且是老将提的名,真刺心!

我不回晚报原本没意见,八十年代初,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思潮盛行,社科院的黄逸峰院长、《社会科学》的钦本立总编都是党内受过打击的有水平的领导者,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我写了不少批判左倾思潮的杂文、文学评论。不过,老将干嘛提名某君。

其实,好长一段时间老将的心情颇为落寞。一次我到他家,他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说,这是程十发新画的,原先的《钟馗捉鬼》抄家没了。他望着书架说:“这些书一本本买来,也算老朋友了,但今后我不会再看;东戡学电、刘芭学水利,他们也不会看,你喜欢什么自己拿,多多益善。”真的?我疑惑,于是,他帮我挑。我把最爱读的陀司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取下,接着挑选《战争与和平》、《简爱》等当时尚未开放的名著,由东戡捆扎成两大捆,我如获至宝拎回家。

我为提名之事很生气,翻着老将的赠书,心里不是滋味。终于,我向他爆发了!

1983年9月13日下午,我事先让刘芭约定,老将已坐候在沙发上,他身穿圆领汗衫、短裤、拖鞋。我上楼,向他45度鞠躬,他问候老母好,我坐定就开门见山:“我今天来向你通通气,免得将来又做糊涂事——我实在对你不大信任了。”老将哈哈大笑说:“我不要你的信任。”



1964年初大雪稍停,老将雅兴与文艺组部分记者、编辑在外滩公园合影。右起:张林岚、王潜芬、张循、毛绿嘉、赵超构(老将)、武瑾、鲁正华、欧冠云

当我说到时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对我的冤案十分重视,又告知考察办两位同志向我了解某君,要求我写材料时,老将听得很认真,很兴奋。我说:“希望你不要像两年前那样,当我向陈其五反映问题时,你却提名某君回晚报,幸好我的冤案人所共知,陈部长不怀疑我。所以,你的做法实际上是出卖张循,讨好某君。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讲糊涂话了。”“我不接受你的意见——我是为你好,你到晚报肯定第二次被整。”“我不回晚报,并不等于要你推荐某君啊”,老将默然。我说:“我听你讲过三次以上,见到某君胆战心惊,可如今每次回家,某君没上车你不开车——不知究竟是你改变了看法,还是一个两面派,背后说坏,当面捧场?”老将被我问得面红耳赤。

我又说:“还有一事,你是十分错误的。你为什么给某君的爱人写序,他是反右先锋,王中老师挨整他带头,他写过许多吹捧‘四人帮’的文章,你为这样的风派人物写杂文集序,是否想到要对读者负责?”老将解释说:“他还是系主任嘛。”我说:“是的,说不定,他的系主任正是你的序为他铺了台阶!你不明白你在人们心目中地位,希望你,一言一行要对人民负责!”我又说:“我这两条意见你不接受,我也不期望你会接受,不过,我相信,深夜独自沉思时,你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像我这样对你讲话尖锐的人找不到第二个了。我将永远不收回我的意见,假如你感到刺

耳、难受，我可以向你表示歉意，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老将用手抚着胸口说：“假如三天之内，我心肌梗塞了，你将负全部责任啊！”我哈哈大笑说：“我这些话，归根到底你听了是舒服的。世界上任何人谁不犯错，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今天仍然是信任你的，否则我就不来了。”老将连连说：“我不要你的信任，不要你的谅解。”

停了一会，老将说：“你的话，站在你的立场上看问题，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你为我想一想，我的处世哲学是无德有才取其才，既然他们都要些这种人，还叫我怎么说呢。”说着，他激动起来：“你们共产党内，出了那么多的坏蛋，你叫我一个党外民主人士如何抵挡得住？他们这伙人上下结成一堆，上面还有后台——你可知道，晚报的筹备组，有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让这些人筹备，还能怎样？总编辑名单中，当初还没有张林岚。你叫我怎么说，他们根本就没我这个人。我说过当西哈努克亲王，又不让我当，再三动员，我是没有办法啊！提名某君，还不是晚报老束、某副部长一再暗示，与其他人不好意思提，不如我来提，免得讲我不容人嘛！”，他又说：“你想，我能不考虑考虑自己么？我每月260元，有儿有女，这么一套房子，我只求保全不求伸手，他们宣传我风格高，不要新房子，其实，什么时候给过我合适的房子？”我见他激动，又讲了心里话，赶紧说：“我的话讲过头了，你不要计较啊。”

过了片刻，讲到戒酒戒烟，他笑笑说：“我如今不抽烟也不喝酒了，而是天天打太极拳。”他到书架前拿出一本《太极拳术》给我翻阅，说：“我不仅天天学打”——他做出手舞的招式——“而且，我在生活中也在打太极拳，你打的是少林拳，咱们拳术不同。”最后，谈到某君问题，他表示不要过早乐观，“我比你阅历深，我现在要看看，对这样的人如何处理？”

他送我下楼时，太陡的楼梯连我都怕，我表示向市里反映一下，老将说：“我的事不要你管，狗逮耗子！”他拖着鞋送我出门后，站立良久。

这次谈话我们都动了真情，次日，我作了追记，内心颇歉疚。我感到，老将的为人历来是责己严对人宽，以德报怨是他的特点，我是否太过偏激？后听毛绿嘉说，老将向她提过这次谈话，老将说：“她有她的道理，我有我的难处。”1984年1月

初，市委宣传部考察办经过大量调查，对某君文革中所犯严重错误，报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会议由副部长龚心瀚主持，论定某君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处以“严重警告”，令其办理离休手续，结论由副部长孙刚向其宣布。某君在接受处理的同时，要求给以正高职称。晚报许多老人奔走相告。此后我们不再提旧事。

晚报复刊十年中，老将倾心投入工作。我们不多见面。

1984年秋，一天他与张林岚、陈念云、徐鞠如来我家晚餐，祝贺我与某校长结婚，他为我高兴，真心地希望文革阴影在我身上磨灭，破例喝了点酒。

1989年5月底，我患中耳炎住院手术，他为我庆幸，后来他说：“你如不住院，很可能上街游行了。”我重返《新闻报》工作后，面临种种矛盾、困难，《新闻报》在夹缝里求生存，我个性强，所以不主动去看老将。

长期来我对文革苦难紧锁心底，90年代初，改革开放推动了人们思维模式的转变，我与少数友人忆及文革时已能平静，自如。一次，老将听我说曾被反铐，他很吃惊，问：“那吃饭，睡觉怎么办？”我没具体描述，仅给他看手腕，说：“我骨骼小，当时比较瘦，还能对付，反铐半个月后开铐，手腕血肉模糊，腕上青痕一年后才消。”老将听了，摇头又点头：“难为你了，换了我，恐怕铐一天就要去见上帝了。”

1991年7月1日下午，我没去上班，又不甘在家枯坐，先看望张伏年，他鼓励说《新闻报》办得比过去好，有味道。转身我去看望赵清阁，她是我的作者，晚年与保姆相伴，我常去陪她聊天。她多次说想去拜望赵老，我看她这天气色很好，劝她去，她起身想走却又说走不动，于是我径直走到相邻的大楼看望久违的老将。老将坐在藤椅上，猛然见我，高兴得双手鼓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顿时我内心自责那么久没去看望他。老将随手赠我两册杂文集，翻开扉页问写什么，先生乎？女士乎？我脱口说：“老友嘛！”老将想了想说：“我同你相识三十一年，称得上是老友了。”当即写上“张循老友留念”，我高兴得拍手称好。他又拿了昨天一篇谈文

字的杂文叫我评论,随后表示最怕得老年痴呆症,现在自己是全部“组合件”(指安装起搏机)了,临走他要我三个月看他一次,至少去看赵清阁时别忘了顺道看看他。老将的话让我感到淡淡的哀愁,我望着他,突然感到他老啦。

1992年春节,听说老将生病,我与刘芭约定一起去看她爸。大年初九,2月12日下午两点多,我们轻声进病房,见老将鼻子插管吸氧,平躺着,我心里有点难过。他见了我们就半身坐起,说不要紧,能坐。刘芭觉得老爸脸色比昨天好些,我们安慰他几句要他睡下。他睡了一会儿说,还是坐着舒服,他要我和他说话。我说:“好,你不要说话,让我给你讲讲新闻。”他从枕下取出助听器自己塞了耳塞。这时刘芭有点事想出去一会儿,老将点点头。我把椅子搬到他床边。老将说:“强强的材料我已交给了法章了。”我点头道谢,心想老将病重还念及我侄儿进晚报的事,而他最爱的小女刘芭想进晚报,他从不张口。我有点鼻酸,就想讲些让他高兴的事。于是,我告诉他《新闻报》已电脑排版,并有自己的电脑房,我国将发行股票,我买了认购证,我采访朱镕基他没时间,我急中生智向他提意见,朱市长当即让会议室的贵宾稍等,转身到办公室接受我近20分钟的采访,老将听得很有兴趣。我怕他累了,要他睡下,他觉得冷还是坐着舒服,于是我坐到床上与他并靠着,用我的手捂他的双手,不说话,静静地坐着。不一会儿,刘芭回来了,已是晚饭时刻,我拿出保暖瓶中的鸡汤,老将喝了汤,还吃了半碗粥。大约5点多,东戡来换刘芭。我们看他睡下,就各自回家。没想到,晚上9点不到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老将不行了,我心如火燎赶到医院,正看到东戡给老将穿袜子,老将穿一身蓝卡叽中山装,旧的,他的脸很安详,如同睡眠。东戡、刘芭和我默默地跟随着,直到把他送进太平间。我们返回时,我看到束纫秋、丁法章坐在会议室,大家沉浸在悲痛中,我没与他们说话,与东戡、刘芭告别后独自回家了。

追悼会上,我请社科院陈燮君写的挽联:“想老百姓心头事,做普通人代言人”挂在墙角,我默立墙边,泪不自禁。我突然想起:1981年5月底老将生病住院我去看望,电视播放宋庆龄逝世并于临终入党的新闻,我问老将:“你有没有考虑过入

党啊?”老将回答说:“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在党外要比入党起的作用大。”我想:老将不愧为我们党的诤友,他与巴金呐喊着讲真话,意在帮助党消除些消极因素,他有时未能讲真话,是不愿与某些党的干部相对立。

也许,我至今尚未读懂老将,但确实,难以忘怀。

(作者自白:我与老将1983年那次对话,始终挥之不去,它不仅于次日记入笔记,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我对他有一股无名的气,后来渐渐明白,在左的思潮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讲真话何其难啊!

我慢慢懂得,这是执政者的政策问题,制度使然。)(责任编辑 吴思)



2007年第7期目录

书屋讲坛 《日本真相》(选载之一)——汪精卫出走之后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关于《日本真相》的撰写及出版 高 昕

这“缺德”非那“缺德” 程 麻

其人其事 诗人王小波 蔡禹僧

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

——“十一世纪的中国”史话之二 雷池月

灯下随笔 我们的那个春天 王耀文

中国式的忧郁 周 拓

往哪里去?!——《于丹 论语 心得》的心得 李木生

化尘俗而归自然——中国散文中的人生境界 国 风

法制经纬 拆迁,不得不说的话 王 攀

思史佚篇 英国光荣革命琐谈 袁传旭

诗化革命 陈清茹

书林折枝 “体系”之外的黑格尔 邵丽英

阿伦特与卢森堡 孙传钊

走向道德和走向信仰的救赎 远 人

史海钩沉 江南文科及薛己在明清的文化潜影 费振钟

流年碎影 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各类学习班 孙光萱

书屋品茗 说“剽窃” 聂永华

代际价值观的断裂与传承——读廖小平教授《分化与

整合——转型期价值观代际变迁研究》 刘铁芳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拿破仑的失败与专制之痛

——法兰西的悲情时代

● 施京吾

“大革命结束了！”

1799年12月15日，拿破仑当选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临时执政府首席执行官，他在宣布新宪法时说：“大革命是按发动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确定的，现在革命结束了。”大革命真的结束了吗？或者说，发动革命时的那些原则真的得到确定了吗？

顾准在《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中却问到：“罗伯斯庇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看来，无关重要。”

显然，拿破仑比罗伯斯庇尔走的更远，他不仅称帝，而且建立了一个世袭皇朝；不仅成为法兰西的一个时代，也成为欧洲的一个时代——由此，我们不得不再问一次：大革命真的结束了吗？

对于任何一个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识，而不考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的深度。”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勒在其上下卷《拿破仑时代》这部史学界公认的史学名著里，所要揭示的正是这个问题。

拿破仑作为法国大革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面对全欧洲封建势力的围剿和法国国内保皇分子仇视这样的社会环境，他捍卫了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大革命的成就，而他本人也野心勃勃、私欲膨胀，这是他的气质。正是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追随者的气质，使大革命最终为共和国缔造了一个皇帝：拿破仑·波拿巴。他出现，使大革命的历史变得极其复杂和富有内涵。如果我们试图对法国大革命做出全面而深刻的思考，就不能仅局限于大革命本身，更在于它的继承。

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诞生于法属科西嘉岛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性格顽劣、争强好胜、沉默寡言，10岁时便被父亲送往法国东部布里埃纳的军校，以期得到管教，可他在学校里继续发挥着凶悍的性格，既打败了比他大的同学又使他更加冷漠和孤独。5年后，拿破仑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巴黎军校深造，不久却因父亲病故中断学业而入伍从戎。1785年10月，他成为一名炮兵少尉。

1785年到1789年7月，正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夜，年轻而无所事事的拿破仑孤守青灯，彻夜长读，“正是在这一时期，拿破仑开始接触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并成为启蒙运动的信徒，可他对启蒙运动先驱们的信仰又显得非常异类，1800年8月，他在卢梭墓前说：“未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没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是的，“拿破仑”这个名字注定了世界不得安宁。

在1793年12月的土伦战役中拿破仑一举成名，很快被提升为炮兵准将。不过，还没等到拿破仑大显身手，却因雅各宾派身份受到罗伯斯庇尔的连累，被排斥在法国政权的主流之外。

革命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王党分子也从来没有甘心过失败，在王党分子的反攻倒算面前，曾经严厉制裁过罗伯斯庇尔的热月党人显得手忙脚乱。历史的奇特在于，从大革命的方向上看，雅各宾派与热月党人都是“革命阵营”里的“革命战友”，可罗伯斯庇尔在剪除异己的时候没有丝毫的心慈手软，热月党在清算罗伯斯庇尔时也同样毫不留情，当面对大革命的真正敌人，却显得那样无所适从、惊慌失措。

然而，法兰西毕竟还有个比罗伯斯庇尔更加罗伯斯庇尔的拿破仑！革命遭遇危难之际，热月党想起了被冷落多时的拿破仑，并向他发出邀请。此

时,拯救大革命的成果,成为共和国、也成为拿破仑的头等大事。年仅26岁的炮兵准将出手果然不凡,很快用他擅长的大炮平定了“葡月事件”,也轰开了他的辉煌历程。此后,拿破仑以卓越的军事天才为自己赢得了巨大声誉,也维系了孱弱的督政府,他在法兰西的地位扶摇直上,声望如日中天。



拿破仑

1799年夏末,眼看无能的督政府就要丢失了意大利,正在远征埃及的拿破仑得到这个消息,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的时机,决定立刻返回法国。

军人出身的拿破仑与律师出身的罗伯斯庇尔就是不一样,当他发现这个督政府已经不能担当领导法国的重任、也没有能力继承大革命遗产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拯救法国的使命,在回到巴黎不久,便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雾月政变”,这一天是1799年的11月9日,法兰西纪元的雾月十八日。他在五百人院门口架起的枪炮迫使共和国的议员们屈服了。于是,他成立了一个临时执政府,并攫取了法兰西第一执政的地位。

说到“雾月政变”就不能不提西哀耶斯。正是这位法国大革命元老怂恿拿破仑政变并竭力推荐他为第一执政,西哀耶斯实指望控制拿破仑,未曾想,却反被拿破仑拿捏得俯首帖耳。西哀耶斯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他以《论特权》、《第三等级是什么?》等四本薄薄的、被尊称为第三等级“教材”的小册子,便鼓动起了第三等级的革命热情。他鼓动了法国大革命又策划了革命的结束。

“雾月政变”一个月后,拿破仑正式就任法国临时执政府第一执政,并宣告法国大革命结束了。

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自由与平等已成为人民手中的公器,也不意味着法兰西从此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是意味着拿破仑专制的刚刚开始。拿破仑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新宪法,以便为非法的政变手段寻找合法的根据:“这部共和八年宪法,仓促拼凑在一起的有九十五条,除了

夜间不得搜查民宅以外,并无一处提到公民权利。”人们从全部宪法中所能看到的,就是个波拿巴”。在拿破仑看来,宪法的重要性只在于必须体现拿破仑意志并由拿破仑来颁布。那位竭力鼓动拿破仑造反的西哀耶斯呢?尽管他是《网球场宣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起草人,也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拟订,可宣布时已被拿破仑修改的面目全非,所有关于平等和制衡的原则都成为拿破仑专权的附属产物,西哀耶斯不仅被排除在三个执政以外,拿破仑还把他赶进了元老院。面对拿破仑,不仅西

哀耶斯,整个法国都束手无策了。后来的历史又狠狠地恶心了西哀耶斯一回,当皇帝拿破仑为贵族颁发联合勋章时,贵族的队伍里竟然站着六十多岁的、曾经严厉反对贵族政治的西哀耶斯。“以毒攻毒”的药方拿破仑使用的得心应手。

新宪法以3011107赞成票对1562反对票的绝对高票得到通过。投票只是个过场,重要的只是权力。法国大革命的果实出现了逆转。

法国历史学家米涅说:“推翻了旧政府并彻底摧毁了旧社会的法国革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一个是自由的政体,一个是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但我们没有看见自由的政体,更没有看见比较完善的社会制度,我们所看见的只有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大革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拿破仑毕竟继承的是大革命的遗产而不是波旁王朝的遗产,他是以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面目出现的,他上台以后进行了有利于和平的宗教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他亲自参与了《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因此又被称为《拿破仑法典》。“他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回忆到:‘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可是,资产阶级

法权正是建立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波旁王朝的教训拿破仑压根没有吸取,否则,他就没有滑铁卢!

拿破仑以强有力的专制手段推动着法兰西的前进,并随着他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全面加速了自己的独裁统治。

1802年5月,他利用自己的声望要求法国举行全体公民投票,同意自己为终身执政。8月,法国人便热情地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在共和体制下出现了一位独裁者,这昭示了共和的失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名存实亡了。

大革命开始以后的法国人突然地变得健忘起来。恐怖时期,他们就忘记了曾经所许愿的人道主义精神,现在,他们连大革命的动机也忘的一干二净。接着,当拿破仑以“法国人民的安宁与幸福”的名义再次提出建立波拿巴世袭王朝的时候,整个法兰西沉默了,法国人民被彻底驯服了。

1804年12月2日是个极富历史性和戏剧性的日子。在巴黎圣母院,拿破仑迎来了自己加冕的时刻。当年事已高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颤巍巍地准备把皇冠戴到拿破仑头上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拿破仑一把夺过教皇手中的皇冠给自己戴上,并且宣誓要忠于自由和平等。自由?平等?真不知道谁见过专制体制下自由和平等的。

一夜之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

一位美国学者说拿破仑有一种专横暴力的人格:“他贪得无厌地追求同胞们对他的自我做出尊崇的姿态,他对自然界的客观变化过程或美的环境都没有持久的兴趣。”确实,拿破仑从来都自诩为不一般的人,礼仪和道德对他都不适用,他用自己的惊人之举向全体法国人表明,这个皇冠不是法国人民的赋予,也不是什么神授,是他凭自己对法国的贡献得到的。他把全体法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对法兰西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绑架到个人意志的战车上。帝国扩张、专制统治和贵族政治卷土重来。自此,拿破仑已不再为法兰西而战,他个人的事业与法兰西的事业已经截然分开,拿破仑依然是拿破仑,但法兰西却不再是共和国。短短15年的时间,法国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正如1801年7月15日在教务专约签订仪式后,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叫戴尔马的将军所指出的一样:“这是一次无

聊的宣教仪式;只不过少了一百万人参加,这一百万牺牲性命去推翻的,就是您今天所恢复的东西。”而他登基时另一位叫奥热罗的军官说的更绝:“典礼盛况空前,万事俱备,唯缺五十万人拼死将这一切结束!”

一百万人性命的牺牲,换来的是一个新的帝制,然后再打算用五十万人的生命去推翻它,这就是拿破仑为大革命带来的后果。浪漫法国人,在拿破仑时代却怀着浓重的英雄悲情。

《拿破仑时代》这部煌煌巨著在一开始就写到:“受到各方面攻击的法国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处于‘奴隶’地位的外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情来激发自豪感和自利心;然而,这种感情同时也就开始背离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拿破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大革命的胜利制造了法兰西的狂妄,也制造了拿破仑的专制。法国人忘乎所以了。

必须承认,大革命后的法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很恶劣的,反法联盟的长期存在、王党分子内外勾结的疯狂反扑、各政治派别的明争暗斗,都需要有一个像拿破仑这样的政治强人来捍卫大革命的成果,在保卫法兰西的利益上他居功至伟,无论如何形容他的伟大并不过分。问题在于,在巨大的民族利益面前是否就一定可以同时掺杂着巨大的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超出民族利益的时候,对民族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不论是如何的政治强人或民族英雄,都不能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更不能以民族利益为借口来要挟这个民族。如果真的视自己为“民族英雄”,那么就请把人民从自己的战车上释放。恰恰,这是所有专制统治者都不愿意面对的。拿破仑称帝之后,其个人野心膨胀到了极点,对整个法兰西不再是种福祉而是一种祸害了。

当拿破仑取得1805年12月2日“三皇会战”的胜利、1807年末粉碎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之后,他的权力、声望连同他的帝国都鼎盛到了极点,他不仅是法兰西帝国的皇帝,几乎是整个欧洲的皇帝了——他的悲剧帷幕也由此拉开。在他的专制统治下,拿破仑越来越像“路易们”了,从野心上他

很像强权的路易十四,走上了帝国式的道路;而统治术上则更像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在他的专制政府里,二流人物和旧制度下的官吏愈来愈多地充斥了各个职位;贵族的地位也逐渐恢复到了波旁王朝时期;拿破仑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贵族,不仅开始使用“圣名”,还休掉了皇后约瑟芬,娶了奥地利公主为妻,这位公主不是别人,正是路易十六王后的侄女,于是,他就成了死去的路易十六的“侄女婿”;他甚至想制订一份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统计资料”以控制法兰西的思想;疯人院里关押着诗人德索盖斯和医生富尔,因为诗人“赞美”了拿破仑是一条伟大的变色龙,而医生则在拿破仑登基时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秘密警察在各种公共场合鬼鬼祟祟地探听着什么;拿破仑对法律的态度是“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舌头割下来”;早在1800年,拿破仑就把全法国的报纸由当时的73家压缩为9家,但拿破仑仍然不满意,他叫嚣希望那些诉诸舆论的印刷品“必须印刷的很少”;而且还要“越少越好”……在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所有专制帝王的共同恶习,不论这种专制来自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其他什么主义,任何人、任何政权只要染上了专制病,其症状大抵是一样的。

直接导致拿破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陆封锁政策的失败和战场上的失利,在这两点上都集中地体现了专制体制的僵化和专制统治者的刚愎自用。

大陆封锁政策是一个几乎遭到所有经济学家反对的政策,却在拿破仑的幻想中化为现实。他“没有充分估计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牢固基础,也不了解它的现代化结构”,却企图将此作为战争的机器。英国一个叫伊韦尔努瓦的御用政论家在《大陆封锁的效果》一书中写道:“你们的封锁顶不了什么事!你们的巧安排真是了不起,你们一心要把人家饿死,人家却吃得胀破了肚皮。”虽然文字读起来十分粗俗和轻佻,听起来也十分滑稽,但却道出了实情。本来大陆封锁主要针对的是英国,英国却得到了多得多的意外好处。而法国不仅没有从这一政策中得到决定性的利益,反而把欧洲诸国拖的疲惫不堪,激起各个被占领国的强烈反抗。从1808年5月开始,连绵6年不绝的西班牙人起义,是拿破仑的专制统治开始动摇的标志。

作为一个杰出的、伟大的军事家的拿破仑,对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战争、将如何进行战争、进行怎样的战争准备,他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可是,专制却会使人迷失心智、使人能够在所有的问题上变得极其颀预和昏聩。穷兵黩武的拿破仑这时什么都忘记了,将战争、不断地战争作为维持其帝国统治的法宝,许许多多法兰西优秀青年的血流淌在帝国扩张的沙场上。当他于1812年发动俄罗斯战役的时候,注定了他崩溃的到来。俄罗斯战役没有取得预想的胜利,反使第六次反法同盟顺利建立,随后于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中拿破仑再度战败,战火终于烧向了法国本土。已经被无休止的战争拖的筋疲力尽的法国人,终于对拿破仑感到了厌烦,1814年4月1日,他们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3日,元老院和立法院联名宣布废黜拿破仑;6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宣布退位。他苦心经营的法兰西帝国大厦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轰然倒塌了。帝国的灭亡,不比罗伯斯庇尔的上断头台的速度慢多少,在这一点上,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尽管其后“百日王朝”的回光返照、滑铁卢之战留下了英雄的悲壮,却已经是落日的挽歌。拿破仑的失败是他自己的选择。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法国大革命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乔治·勒费弗尔在《拿破仑时代》中体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法国革命转向建立起独裁统治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一种内在需要驱使它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这场革命终于导致一名将军的独裁统治,这也不是个偶然事件。”与英国哲学家培根建立的经验主义哲学不同的是,法国的笛卡尔建立了唯理主义的哲学体系,而“必然性”正是唯理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映照着法兰西的历史和生活。

真正使拿破仑感到英雄气短的是他退位后,接替他登上王位的是一个封号叫普罗旺斯伯爵的人。这个人早在“雾月政变”后不久就两次写信给拿破仑,建议两人联手恢复波旁王朝,并许以许多利诱,直到快一年后的1800年9月7日,拿破仑才给他回信。信中拿破仑写到:“您不应再抱回到法国的希望,您如回来,必须踩过十万具尸骸。请为法国的幸福和安宁着想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历史会给您记上这一笔账。”现在,登上拿破仑王位的正是这个普罗旺斯伯爵——他就是路易十六的

弟弟——路易·斯塔尼斯拉·格扎维尔,他自称“路易十八”。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继承的是拿破仑而不是路易十六的王位,但,当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波旁王朝”时,同样也不得不回忆起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得不回想起拿破仑那掷地有声的回答——而现在,一切都显得是那样可悲。

路易十八没有给法国“幸福和安宁”,拿破仑也没有。

拿破仑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继承人,他的称帝对大革命无疑是莫大讽刺,然而历史更加无情,波旁王朝的复辟给了拿破仑一记响亮的耳光。专制,给法国大革命、给拿破仑留下了永久的痛。

一切企图将人类命运、社会命运、国家命运及个人命运寄托于专制的人,都请站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并且摸摸自己的脸!

(责任编辑 杜晋)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红墙见证录 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 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定西孤儿院记事	杨显惠	25.00	6.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	李海文	25.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罗平汉	32.00	7.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刘太医谈养生	刘弘章	35.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秘 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鹰	26.00	6.00
西北军演义 上下)	骏声	68.00	8.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江	16.00	5.00
斗室中的天下	资中筠	30.00	6.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6.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钟庆	28.00	6.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	23.8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西北军演义》此书系《桂系演义》、《少帅传奇》之后,又一部介绍国民党非中央系武装力量的历史小说。作者根据自己家世、拜访众多的西北军后人,在查阅、考证了大量海内外出版的军事、历史、人物传记基础上,以中国近代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翔实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西北军”整整20年的战斗历程,填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一段空白。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斯大林时代的苏俄史学界

• 金 雁

一、以党性原则为准绳的史学观的确立

从 20 年代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确立了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后，既要为自己的领袖地位提供历史根据，也需要反驳流亡在海外的托洛茨基与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起初，斯大林组建了几套班子，但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所预想的效果。斯大林意识到整个史学领域是个统一体，仅仅要求党史这一块孤军深入，很难拿下整个阵地。要扭转史学界“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为标准的传统，就必须全面控制史学阵地。为此，首先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写出令人放心的历史。这第一步是要下大力气改造史学队伍，把他们训练成“坚持党性原则”的史家。

首先是《真理报》上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强调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传统，而对史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不矛盾的，“党中央是最高裁判员”（葛罗米柯语）^{注 1}。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苏共中央宣传部门不断告诫历史学家，你们“写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政治作战史，我们的历史是无产阶级革命壮大和创造性的世界历史”，“我们必须在一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

忆录虽然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但是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实录直书”的历史记述方法是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的“伪善说法”是与党性原则相对立的。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党性原则”。学术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路线。党的历史是“党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学。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现在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效力。作为党的宣传员，不仅要消除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要抵制那种认为“历史应当真实可信、不讲情面”的傲慢想法。应当明白：苏联的历史研究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不是从确定某个历史现象出发，而只能服从唯一的原则——党性原则。^{注 2}

这个时期，联共（布）中央除了谴责“资产阶级史学”，还批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作品中许多“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统一口径的。

1917 年前的布尔什维克几乎是个政治侨民党，包括列宁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长期流亡国外，几个国内的中委又多在偏远的流放地。施略普尼科夫是沙皇垮台前在俄国政治中心坚持斗争、并参与了二月革命的唯一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同时他作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主席，也是该党很少几个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老革命家。1923 年出版了他根据亲身经历和第一手资料写的《1917 年》一书，反响很大。但是此时这



斯大林

本书被指责为竟然“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史料——《俄国晨报》，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施略普尼科夫对这种指责很气愤，回应说：什么叫“无产阶级的史料”？你们有吗？^{注3}

今天人们都知道《俄国晨报》是孟什维克报纸，而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两大派。与主要在国外流亡者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孟什维克的活动主要在国内，尤其在大城市的工会中影响远远超过布尔什维克。因此沙皇倒台后发展迅速的几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如全俄铁总），乃至二月革命后早期的工人代表苏维埃都由孟什维克控制。俄国国内工人阶级的声音主要也是通过《晨报》这类孟什维克出版物发出的。施略普尼科夫作为布尔什维克工会活动家并不认同孟什维克的派别立场，并且在与孟什维克争夺对工人影响力方面贡献巨大。但是不仅在反对沙皇时期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乃至比较激进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是盟友，就是在1917年2月到10月之间，布、社、孟这三个当时社会上习称的“社会主义党派”与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派别的对立也常常是主要的政治分野。建立排斥后者而包括前三者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曾经一度是布尔什维克也赞同的口号。只是在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才被镇压并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帽子。

可见施略普尼科夫在讨论二月革命时引用《晨报》是很自然的。慢说该报并非“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传媒，引用其资料也不等于认同其观点。然而奉命批判者认为：施略普尼科夫的书引用了《晨报》，而且“引用的党的文献比其它书少”，还“竟然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这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置于何地？^{注4}这就足以对施略普尼科夫的书进行封杀了。

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所谓的布尔什维克“新史学”。在它看来，白俄史学家号称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说什么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托洛茨基之流的疯狂叫嚣。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要与境外的“白俄侨民史料对着干”；要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学”，把他们那种所谓“公开、透明”的真实历史彻底驳倒。

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

20年代末意识形态的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论战前危机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德国社会民主政策》。斯卢茨基在文章中谈到，“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列宁对第二国际的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列宁对德国社民党内存在的危险估计不足。这篇文章本来是站在比列宁还“左”的立场上论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参与国际共运中派别斗争的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并不认可斯卢茨基的观点，但这样“左”的观点无论如何扯不上“资产阶级的”，当时的尺度下完全可以存在。更重要的是，文中讲的事实本来平淡无奇：作为马恩的嫡传弟子考茨基当时在第二国际各党中享有极高的理论权威，作为“中派”领袖他又是左右都要争取的人望，今天打

开那一时期的文献,列宁对考茨基的尊敬和盛褒比比皆是。即便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与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键问题上最终决裂后,他也仍然承认考茨基在许多问题(如土地-农业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地位。因此本着学术争鸣原则,发表斯卢茨基的一家之言,在当时并不是很出格的现象。

但这篇文章成为斯大林拿史学界开刀的导火线,令斯大林恼火的并不是斯卢茨基比列宁还左或者还右,而是决不能允许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评判作为“正义化身的领袖”。如果此例一开那不是很多党内的历史旧账都可以翻腾出来随意讨论、谁都可以对已经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历史指手画脚了吗?因此,斯大林需要借斯卢茨基杀一儆百。1931年10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盛气凌人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指责他把“早有定论”的“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拿出来讨论,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给这种“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伪造者”提供讲坛,刊登这种“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等于给反革命开辟论坛。斯大林以“政治正确”的权威大加指责斯卢茨基掌握一点文献资料就敢对无产阶级领袖评头论足,骂他是“啃档案的老鼠”。斯大林宣称:党中央已有定论的东西不是随便什么学者就可以质疑的,占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凭证和历史研究的基础——难道原始资料就没有阶级属性吗?白俄文人使用的档案史料还少吗?斯大林质问道:以这种方式“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注5} 尽管谁都知道恰恰是档案中埋藏着大量与公开“宣言”有异的“行动”,但在斯大林这只“猫”的盛怒之下,史学界“啃档案的老鼠”们销声匿迹,人们只能把社论当“行动”了!

然而斯大林借这件事决不仅仅是要刹住历史学家“啃档案”的风气,他还要借此开展一场大清洗。以《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为契机,苏联开始了30年代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

运动”;当时“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所有报刊的通栏大标题,由此拉开了史学领域整肃的帷幕。所有的史学机构都按斯大林《信》的精神进行自查,各史学部门、出版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清查和整顿,首先从组织上改组史学战线,一大批史学家被进行组织和行政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又把他们说成“托洛茨基私货的贩卖者”、“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予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斯大林给该编辑部的定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地。

193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我所为了执行斯大林同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进行了以下工作: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和不能完成对历史科学当前提出的任务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研究当代史的工作小组”。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工作总结中说,根据斯大林的《信》中的指示,“我们在历史战线上开展了广泛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领域中的揭露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反革命匪帮”。^{注6} 接下来整个史学界都成为重灾区,被点名批判的人延伸到所有的史学学科,1932年有一份报告中说:“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注7}

这场运动过后史学界元气大伤,尤其党史学界几乎全军覆灭。顽固分子从肉体上消灭,20年代出版过党史著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史学家布勃诺夫、涅夫斯基、梁赞诺夫、科诺林等相继被捕遇害,对20年代最有名的党史研究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大加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把普列汉诺夫、布哈林、苏汉诺夫、波格丹诺夫等理论家著作都被“彻底翻腾一遍”,要把他们的理论观点清扫一空。其他人则“重新改造”成与领导保持一致只会机械地按照《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公式写作的传声筒。在党中央定调“官方解释权”的“遵命史学”以后,史学研究方法千篇一律,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填充史料,众口一词,不允许有个人风格

的独创精神、不允许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借口而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学术争论和理论探索完全停止，很少有人敢说真话，编辑们大都畏畏缩缩，只关心一件事，“可别犯错误”，“可别出什么事”。^{注8}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对历史研究采取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从此统治了历史研究。

三、搬倒波克洛夫斯基及其“学派”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受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洛夫斯基学派”。波克洛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权威，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而且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部门，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波克洛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学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苏维埃“自己的学者”。1929年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遍布整个史学界和理论界，几乎可以说苏联所有第一代“红色历史学家”都和波克洛夫斯基有或多或少的师承关系，战前的大多数史学家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听过波克洛夫斯基授课，在他生前死后他以及他的学生编写过多部历史教科书和苏联通史，波克洛夫斯基因此被称为“苏联史学之父”。

毫无疑问，波克洛夫斯基也是个“为革命而研究”的人，作为俄国传统史学的终结者和“红色教授之父”，实证主义史学界并不看好他的贡献。但是波克洛夫斯基作为革命前已经成名的左派学者毕竟还遵守正常的学术规范，并不是个存心杜撰“历史”的人。他的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极左”的，但却未必是“斯大林主义”的。其中许多内容并不符合斯大林时代的需要。例如作为从西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派学者，他对旧俄斯拉夫主义传统否定多，而对“伟大帝国”肯定少，同时对西方乃至蒙古等外部

因素推动俄国发展的作用评价较高（典型的是：在古罗斯国家起源这个老问题上他倾向于西方流行的“诺曼起源说”，而不赞成罗蒙诺索夫倡导并得到沙皇支持的斯拉夫起源说），这与斯大林时代借助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进行统治的需要相矛盾。作为革命前反对沙俄的激进学者，波克洛夫斯基热衷于批判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激烈抨击沙俄历代“暴君”，这让内心崇拜伊凡雷帝的斯大林也很不舒服。

更重要的是，波克洛夫斯基革命资格老，与列宁都以朋友相待，不是那种俯首称臣接受斯大林耳提面命的人。他属于思想虽左但为人比较正派的老一代，在史学界“德高望重”，对下属也相对宽容。实际上在20年代苏联史学界并不存在以波克洛夫斯基为中心的流派或者体系，在学术界还保持相对正常的争论氛围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并不赞成波克洛夫斯基的看法，他们撰写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反映的是个人的观点。其中不少人在波克洛夫斯基基本人生前就对他进行过学术观点的商榷和质疑。总之，波氏之所以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他资历深，被列宁所欣赏，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又培养了众多的史学家。但以他来命名的“史学体系”主要是后来为了大清洗的需要而附会的。

20世纪20年代末，波克洛夫斯基已经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史学净化运动”中多次检查，并长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批判波氏而整肃整个史学界，所以并没有因波克洛夫斯基自我批判而善罢甘休。1932年波克洛夫斯基去世，对他的批判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骤然升级了。1934年基洛夫遭暗杀，史学界首先成为大规模镇压浪潮的重灾区。当年列宁格勒史学单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换，据1937年新成立的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历史研究所所长讲，该系统内揭露出来的“破坏分子”在科学院系统名列第一，光是列宁格勒分所20人当中就有14人被捕。^{注9}1935年镇压的势头扩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历史所、莫斯科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国立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单位负责人相继落网，很少有人幸免于难。各加盟共和国历史所以

及大专院校历史系人员,只要曾经在波氏任教的地方有学习经历的统统成为“污点”,被无休止地上纲上线,成为政治迫害的理由。

1936年1月26日联共(布)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某些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这些错误首先是“紧跟波克洛夫斯基学派。”^{注10}随着这一决议发表,对波克洛夫斯基的批判规模越发扩大,给他的学生们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营”,当时的一篇很有来头的文章中说:“内务部揭露出来的波氏学派是人民敌人”,是“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这场史学领域的运动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随后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1937—19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全部被摧毁,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注11}

四、斯大林钦定“教科书”

1934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中指出:需要统一编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苏联史、殖民地国家近代史五套教科书,并普及推广。“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教科书和教学本身都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不是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注12}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从史实入手改进历史教学的决定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来图解、简化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确是当时的大弊。但实际上《决定》的言外之意并不在此,它指责历史学过于“抽象”,主要用意是要“具体”地突出个别历史人物,尤其是加强对斯大林的宣传,形成个人崇拜。

然而,由于决议的措辞表达得模棱两可,史学家们不得要领,在对俄国历史作了系统的编排以后,新教材仍然不得过关,几易其稿后仍大受

指责。这令史学家们苦恼,他们不理解重新编写的教科书无法通过的症结所在。后来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现代史部分”,特别指出教科书把历史叙述截止在1923年,而没有将历史写到1934年以来,即没有写到斯大林时期,这被认为是个“大错误”。^{注13}

1934年8月,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联名对历史教科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特别是讲述俄共(布)“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1937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强调在党史教材中要突出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历次反党集团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胜利就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斯大林强调说:“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注14}后来斯大林经常绕开教育人民委员(当时政府的部长都称“人民委员”),直接钦定教科书,或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的情况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例如《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的情况下做出的。

当时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该委员会还规定:不能把1789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1917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该标准化地称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对于历史上乌克兰、格鲁吉亚、中亚等地并入俄罗斯帝国的过程不能写成征服,而必须强调“自愿归并”于俄罗斯大家庭。对于党内的争论应该怎样写,规定尤其严格,对列宁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如此等等。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30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

有人就因为提到“30年代的饥荒”这几个字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与审定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部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的大作就是按照“加强党对党史编写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联共(布)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的文件精神撰写的“新党史的样板”。同年11月中央下发的有关宣传《简明教程》的文件中说,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问题中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注15}后来苏共中央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未经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领袖人物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一直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简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渐被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史》取代。

五、小说家主编的官修“正史”

更为荒唐的是:30年代苏联史学界还出现了“小说家挂帅编历史”的怪现象。当时的许多专业史学家尽管已经绝对驯服,但是职业习惯仍然使他们不适应于“创作”历史。他们可以听话地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闭口不谈,视而不见,但要把历史上根本没影的事“创作”出来,还是显得功力不足。于是斯大林想到了小说家高尔基。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维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列宁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普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注16}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并因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

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注17}

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在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而在历史问题上,这位文学家更常常言那些受“事实”束缚的职业史学家所不敢言。加上他多年旅居海外,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力。因此斯大林想到了让他来领衔修“史”。于是文学家高尔基俨然坐上了苏联史学界第一把交椅,成为为斯大林塑造“新史学”的带头人。他从意大利回国以后不久,就领导一批人写作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颂扬奴隶劳动的可耻书籍”(索尔任尼琴语)《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史》。这部“史诗”把那个“古拉格群岛”式的劳改工程描绘为充满“理想”“色彩”的“共产主义工程”。当年的“人道主义者”这样赞美斯大林的集中营:“对人这种原材料的加工,比对木材进行加工不知要困难多少倍”。^{注18}

《白波运河史》的“成功”,进一步体现了高尔基的“史学”才能。选中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内战史》,便十分顺理成章了。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内战,不仅以高达数百万的死亡而成为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国内战争,而且是布尔什维克历史上树敌最多的一场冲突。它对外与14国“干涉”者冲突,对内处决了沙皇全家,不用说是旧俄势力的死敌;镇压了立宪民主党,成为自由派(推翻沙皇后二月共和体制的主导者)的冤家;驱散普选议会,又与民主派决裂;取缔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中的主导力量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又得罪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指第二国际阵营中的所有左派党);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得罪了“爱国主义”势力,而击溃各地分离势力又与各种非俄民族主义结仇。在阶层方面,没收土地与工厂固然得罪

了地主与资本家,实行“仇智主义”和取消言论自由得罪了知识界,余粮征集制与严惩“背小口袋者”又得罪了农民,禁止罢工和取缔全俄铁总等革命时最重要的几个大工会,又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推到了对立面,最后对喀琅斯塔得水兵的严厉镇压,又使曾是十月之夜攻打冬宫主力的波罗的海水兵也从布尔什维克最有力的支持者变成了造反者。

所有这些各种“主义”各个阶层的反布尔什维克人士大量流亡海外,他们中有不少史学家,带走了许多资料与档案。到1920年代末,就1917年以后的这段历史他们已经写出多种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左中右倾向不一,往往彼此辩驳,但共同点是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它们在世界上、尤其在知识界影响广泛,自然对苏联体制的道义合法性构成威胁。然而,布尔什维克方面的历史学对此的回应却十分无力:由于“啃档案的老鼠”大量被清洗,敢于“创作”历史的能人尚未大量产生,余下的只有把历史变成干巴巴几条“规律”的理论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正如前述关于历史教材的《决定》所言:“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这种“左派小册子”在国际学术界根本无法回击那些卷帙浩繁、资料丰富的反布尔什维克史学著作。

于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他既不是“啃档案的老鼠”,也不是理论家。他的文学天赋无疑可以使斯大林式史学著作变得“内容丰富”起来,于是让这位小说家挂帅,组织一大批史学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写作班子,开始编纂《苏联国内战争史》。^{注19}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这部书的重点并非叙述战争过程本身,而是要从战争与革命的前因后果来全面展示和解释20世纪以来的俄国历史。这部大部头史书的编写工程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60年,第一卷于1938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而第5卷问世时已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代,苏联又一次面临“史学革命”,“上面的精神”变了,于是这部大书尽管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界投入最大的工程,却在出齐时就受到冷落和非议。

然而这部晚年高尔基为之呕心沥血的大作已成为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的斯大

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内战史》第一卷与《简明教程》几乎同时出版:《简明教程》是官修党史,《内战史》是官修国史,前者主要对党员解释党内斗争,因而篇幅不大,更像一本政治理论著作。而后者要在国际学术界争夺话语权,因而当时被誉为“资料最完备”。但高尔基对“资料”的认识当然不同于“啃档案的老鼠”。他在谈到该书的编纂方针时说,“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指南,它的国际意义是无容置疑的,必须认识到在这种背景下过滤杂音和分歧是时代要求的,比如党内的某些倾向就不能在历史学中表现出来。”他明确提出:不能承认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土地纲领是借用的社会革命党的(尽管列宁著作中明确提到这一点),不能承认新经济政策是由孟什维克提出来的(尽管今天俄国史学界都承认这个事实,而当时这也不是秘密),对谈论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以后的国内战争年代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争论,必须“摆正立场加以叙述”,^{注20}——这意味着把民粹派(社会革命党)当年激烈谴责“资本主义”而鼓吹集体经济、抨击“虚伪民主”而鼓吹“人民专制”的话,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形成“文字同盟”批判民粹派时强调资本主义进步、西方民主优越的话全部消除,以显示社会革命党这个“资产阶级——富农”党、“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斗争是多么一以贯之。这也意味着仿佛“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从来就是两个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同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两个派别。这还意味着1917年2—10月间俄国似乎只有一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个“无产阶级”的苏维埃,而不是有五届(一届比一届更左)的临时政府和“流水席”式的苏维埃,而且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就是前苏维埃的领导人……

受到这种“小说家编写历史”的“经验”启发,苏联当局又想让高尔基除《内战史》外再主编《工厂史》、《农村史》乃至《地铁史》等等,几乎把他扶立为苏俄全方位的“历史总管”了。尽管大包大揽的高尔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实际上没有完成这几部“官书”中的任何一部,但是他关于编写这类书籍的许多言论足以获得这样的评价:高尔基在回国后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布尔什维克话

语下“只存在革命与反革命二维图像的历史学科的奠基工程”。(转自《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8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注1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45页。

注2 Л·А·Сидорова, Оттепел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первого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М., 1997, с.176.

注3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06页。

注4 《Правда》12.25.1930 г.

注5 斯大林:就布尔什维克历史的若干问题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86页。

注6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注7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年)》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733页。

注8 《俄罗斯苏维埃新闻期刊史纲(1933-1945)》,莫斯科1968年,62页,转引自马龙闪:《苏联剧变的文化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201页。

注9 安·尼·阿尔季佐夫:《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史学家的命运》见《历史问题》,1994年第7期,译文见中央编译局《斯大林研究》1995年,第5期,250-274页。

注10 《Правда》3.28.1937 г. 又见《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译文集,三联书店1962年,第6页。

注11 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人民出版社1983(上接第57页)分子”等明确宣布纯属冤案,予以平反昭雪。

1980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李英娜等因受株连被关押审查实属冤案,应予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李立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公开为李立三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1984年11月18日是李立三诞辰85周年,中央批准李立三在湖南醴陵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胡耀邦同志题写了匾额。

李莎恢复工作之后,于1979年被评为教授职

年版,上册,357页。

注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87页。

注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61年,295页。

注14 刘彦章:《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445-470页。

注15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КП(б) М., 1947. с.365-381.

注16 参见金雁:《火凤凰与猫头鹰》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113-119页:《读不懂的高尔基》,

注17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疑问。所谓的“曲折方式”恰恰意味着:回国后他对当时的苏联也许有自己的想法,但形成的文字、包括解密档案中的文字足以说明他在行动上是完全驯服的。所谓斯大林谋害他的说法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

注18 《Правда》11.15.1930 г.

注19 过去对《内战史》的缘起有过种种说法。有人说编写该书并非斯大林的意愿,而是高尔基为了曲折地表现对农民的同情,而主动争取撰写的。根据如今公布的解密档案,可以说这种猜测完全不可信。

注20 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卷,525页。

称;1980年被批准享受专家待遇;1983年起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李莎谈到对胡耀邦同志的深切怀念时,老人眼中汪着泪水。1986年7月12日她亲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得到您和中国党组织的周到关怀,我知道这是党和人民对立三同志的怀念,也是对我的鼓舞。”我知道中国有“草环相报”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以报您和中国党对我的关怀和照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欢迎订阅2007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一九九二年一次不平凡的随行采访

李宗仁在老河口

我亲历公审布哈林和苏联六十年变迁

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 —— 电信市场

拿破仑的失败与专制之痛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